

彭真在社教运动中

● 章学新

草拟“五反”指示

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通过城市“五反”、农村“四清”逐步推进的。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彭真遵照中央指示，主持起草开展城市“五反”运动的文件。这时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工矿企业中生产秩序混乱，劳动纪律松弛，浪费严重；集贸市场开放后，有人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彭真首先深入到北京石景山、门头沟等工矿企业进行调查；11月底后，他多次召集国家计委、经委，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同商议。他慎重地说，全国万元以上的经济案件25万起，虽然已处理了5.8万起，因为没有发动群众，震动不大。我们10年没有搞“五反”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比拿定息的老资产阶级分子还多。中央考虑要开展一次运动，但又担心会分散领导精力，影响生产。是否先搞一段增产节约，然后转入“五反”。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意见。

1963年1月中，邓小平审阅《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草案）后，认为“大体可以，但需提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2月12日，彭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着重说明三点：一是开展“五反”运动的必要性。他指出，三年困难时期，工矿企业中有的干部对“三面红旗”发生动摇，有人甚至利用权力，破坏制度，搞特殊化，发“困难财”。据中组部估计，1600多万干部中，大约有400万要在运动中“过关”；认为“五反”实际上是“经济上的反修防修”。二是运动的目的是整风，人民内部矛盾

要加强教育，解决思想问题，集中力量打击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分子。三是有没有顾虑？他坦率地说，我和小平同志就有，一怕耽误生产，二怕打击面宽，事后又得甄别平反。

“五反”指示文件反映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这场运动的谨慎态度。尽管文件把运动定性为“又一次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斗争”，把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由于生产下降，物资匮乏所造成的经济生活中的混乱现象和其他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但在实际做法上，文件吸取了50年代“五反”运动和反右倾运动的教训，强调从增产节约入手，自始至终抓住生产这个环节；运动的范围限于县（团）以上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合作社营企事业和物资管理部门以及文教部门；在反贪污盗窃时，“不要主观地规定指标”，“一般不采取群众大会斗争的方式”；对人的处理“不要急于作结论”等等。

稳妥地指导贯彻《前十条》

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没有讨论农村“四清”问题，但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警示，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这是从上一代孕育的，斯大林有功劳，有错误，赫鲁晓夫利用了斯大林的错误。我们现在怀的什么胎？他向会议推荐了湖南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河北农村整风整社的“两个好文件”，之后，陆续批发了山西昔阳干部参加劳动、河北保定农村“四清”（清库、清账、清财务、清工分）、华北农村建立贫下中农协会等典型材料，以及宋任穷建议向农民及青年进行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教育的报告。这表明，为

了从母胎里铲除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毛泽东决心在农村发动一场“不比土地改革简单”的革命运动。4月底,他通知彭真和各大区第一书记集中到杭州,参加小型工作会议,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

如何把毛泽东酝酿已久的这场革命运动的构想形成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呢?彭真缺乏精神准备。但是大家还是希望有一个纲领性的中央文件。

5月7日,毛泽东看了彭真主持起草的第一稿后,开始在会上讲话,到12日为止,共讲了4次。

毛泽东指出:文稿不够严肃,不够尖锐。没有抓住要点,没有提到理论高度;要点就是阶级斗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依靠贫下中农。接着他批评各地领导,十中全会后,三级干部会开了,文件泛泛地传达,方法不对。第一书记没有下去抓试点,所以问题看不到,抓不住,牛鬼蛇神抓不出来。关于阶级斗争,毛泽东说,八届十中全会后,他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和河北的同志,滔滔不绝地讲阶级斗争。其他的人不讲。他援引《红楼梦》中冷子兴揭示贾府的话说,“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农村十年来未搞阶级斗争,土改时搞过,但有的地方是和平土改,“三反”、“五反”是在城里搞,人民公社六十条又没有讲阶级斗争。斯大林1936年宣布消灭阶级,他吃了亏,不该动阶级基础。他是依靠法律制裁,不依靠群众制裁。关于依靠贫下中农,毛泽东说,贫下中农大体上占50%—70%,如果组织起来成为中心,可以带动起来。关于干部参加劳动,他说,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和旧社会的保长差不多,修正主义就有了基础。

这以后,毛泽东把修改文件的任务交给了陈伯达。经毛泽东反复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稿)》(简称《前十条》)于12日晨完成。文件宣称:“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而许多同志“并没有认真考察,认真思索,甚至熟视无睹,放任自流”。毛在前言中写了一段人的正确思想来源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哲理,告诫全党,若不搞阶级斗争,“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

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言重意切,耳提面命,把中国农村的问题估计得非常严重。

会后,彭真表示:自己的思想总是跟不上,一方面跟不上毛主席,一方面跟不上群众的先进经验。为了加深对农村形势的了解,从5月17日开始,彭真起程先后到河北、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八省,和西南局、西北局、省、地、县各级包括在基层“蹲点”的干部,开座谈会,直接听取他们对农村情况的反映。7月4日,他将沿途调查所得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题为《有关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问题的报告》,从实际出发,坦诚上报:

第一,对于阶级斗争的状况,他据实写道:阶级敌人“明目张胆的反动活动毕竟是少数”,利用隐蔽手段,篡夺或操纵、影响的社队,各地估计不同,“有的地方说百分之十左右,有的说大约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也有的地方原来估计有百分之十五,现在估计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因为运动尚在初步开展,“确切情况还没有摸清楚”。彭真认为,当前斗争的复杂情况是“阶级斗争延伸到党内和人民内部”,“敌我矛盾、人民内部一般性错误和两条道路纠缠在一起”,而有些干部“认识不清,估计不足”,摸了试点,“兜了敌情”后,“没有准备好甚至根本没有准备就想大干”。因此,他向中央建议“要防止急躁情绪”。他曾对湖南省委领导说:“毛主席的结论,阶级斗争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纲,也包括预见,现在他下了决心,但搞的时候要稳当。”又对广西的领导人说:“不要冒冒失失,一着急,帽子也戴了,结论也作了,但没有解决问题。”

第二,“防止三个方面发生偏差”。即正确对待中农,正确对待工作人员中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子女和犯错误的干部,如不注意引导,“在运动高潮中很容易打击面过宽而又打不准敌人,甚至把阵线搞乱”。

对上中农,彭真明确地写道:“上中农虽然有两面性,但这个阶层是我们的朋友,决不是我

们的敌人”，在好的和比较好的社队中，他们“绝大多数是拥护公社集体经济的，表现是好的”，即使他们有缺点错误，“也不能像对待地富、反革命一样斗争他们，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但有的地方“已经提出打击‘单干头’、打击‘暴发户’的口号，分了‘暴发户’多余的粮食”。在向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干部作报告时，他说：仅仅因为单干，不应打击上中农，“因为我们的法律没有规定单干非法，只能同他们竞赛”。

对基层干部，彭真说犯错误的比例“相当不小”，但错误的轻重大小不同，“现在有些地方在动员、建立贫下中农组织时，不是把主要目的放在对付阶级敌人、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方面，而是放在对付干部方面，因此造成干部同贫下中农的对立情绪。”至于地富和资本家的子女，彭真在调查中发现，他（她）们通过婚嫁，已逐渐改变了阶级地位，运动中不应“厌恶和仇视”他们，应根据他们的表现，“分别进行斗争或团结教育工作。”他对广西的干部说：“现在的地富是土改时划定的，十多年来不能说都没有改造好。他们的子女难道比地富本人还难改造吗？主要看本人表现。”

第三，“派工作组下去和依靠原有组织问题”。彭真肯定，农村的基层干部“总的方面说，绝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是可以教育好的”，这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基础”，因此，一般情况下“应该领导、教育并且基本依靠原来基层的组织和干部进行此次运动，并在运动和斗争中，改造、提高他们，加强、健全基层组织的领导。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党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

在一场被毛泽东视为“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已经揭开帷幕时，彭真敢于从实际出发，

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 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 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 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

目前国内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情况，都是好的。为了保证一九六三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的完满实现，争取经济情况进一步的全面的好转，使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为了健全制度，改进思想作风，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侵蚀，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一次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

彭真主持起草的“五反”指示，1963年3月1日由中共中央发布

坦诚上书，是难能可贵的。这份报告，彭真7月5日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李富春，并建议送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阅。20天后，中央办公厅以《中央收文》印发。因为《前十条》有些规定不具体，9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由谭震林主持起草，11月14日刘少奇批准下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

与既定方针的差异

1964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有两大担忧：一是援越抗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危险；二是中国出修正主义。对于前者，中央决定建设三线工程，加强战备；对于后者，毛泽东说：我看我们的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93页）。刘少奇在会上作反修报告，强调要在全中国范围经常开展“五反”、“四清”运动，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他批转了甘肃白银厂夺取领导权的报告（1979年已平反）。会议还介绍了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地区农村夺权的“经验”。刘少奇后来对人说：现在党内右倾相当普

遍,我过去怕讲右倾,有顾虑,向毛主席汇报后,他说不要怕“左”,半年总结一次(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99页)。在这种情况下,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向“左”推进:一是8月初,中央成立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统一指挥;二是城市“五反”、农村“四清”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新部署,点面结合,加快进度;三是由刘少奇负责修改一年前由他主持通过的《后十条》规定。为加强文化领域的斗争,中央成立五人小组,彭真任组长。

8月16日,在广州修改文件的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把省委和县委派出的工作队,统一集中到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即所谓大兵团“打歼灭战”(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99页)。19日,刘又致函毛泽东,建议转发王光美主持搞的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的《桃园经验》,要点是由工作队领导运动,先搞扎根串联;基层组织和干部“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四清”内容扩大为清政治、经济、思想、组织等(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00页)。对刘少奇的这些主张,毛泽东是支持的,只是在大兵团作战搞人海战术这一点,不完全同意。因此,他立即通知刘少奇回京,召开大区书记会议,研究刘主持的《后十条》修改稿,“越快越好”。

8月29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大区书记会议,会议只开了4天,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稿)》,讨论了《桃园经验》,部署了今冬明春的“大会战”。《后十条》修正草稿虽然也规定了一些政策界限,但文件明确告诫工作队员:“决不要把这些必要的、正确的规定,变成妨碍发动群众、束缚自己手脚的清规戒律。”

彭真对抛开原有的基层组织和干部,不加区别地强调在工作队领导下夺权的做法是不赞成的。9月1日,会议最后一天,彭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一)说农村基层组织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是大概的估计,具体情况要分析:一是和平土改地区,补民主革命的课是必要的,有的干部有缺点、错误,但没有蜕化,经过

教育和帮助,仍然可以发挥作用,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是少数。(二)工作基础好、干部和党一条心的基层组织,运动中工作队一定要经过他们;只有被坏分子掌了权,问题很严重的组织,才可以把原有干部甩在一边。我们总要估计好人是多数。(三)工作要细,打击面窄一点好;一不要打人,二对犯错误干部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处分的人多了,急了,对工作不利。(四)阶级异己分子要清洗(邓小平插话:就是对阶级异己分子,也有个政策问题。逃亡地主,混入党内的要清洗;如入厂矿当工人,搞了十多年,表现也不坏,可不可以保留工职!?)。(五)生产要有所提高,不能下降。

彭真的意见,虽然和会议的既定方针有差异,但在党的会议上,他光明磊落,履行党员的政治权利,尽到了党员的政治责任。这是党性的表现。

9月18日,反映“新的经验”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下达,全国农村大兵团打歼灭战的社教试点开始。

努力纠正通县会战的错误做法

10月5日,北京市郊通县地区社教大会战打响,两万多工作队员络绎进村。这支队伍,包括北京市委从各机关部门抽调的干部、中央机关下乡“蹲点”的干部,以及北京各高等院校学生。工作队分布在通县地区42个公社,平均每个队员联系5家农户。

通县地区1963年按《前十条》经过“四清”后,排队、分类,工作好的和比较好的生产队占84%,三类队仅占16%,而593个三类队中,领导班子不纯的仅占1.7%,涉及64人。集体经济是巩固的,从1961年起,连续3年丰产,1962年产量已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彭真认为这时农村最迫切的问题是落实政策,用政策教育干部群众,总结经验,把生产搞上去。

通县会战开始后,10月15日,彭真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通县地区工作队人数太多,势必发生包办代替,要防止发生(地表)径流。工作团总团部即抽调一部分工作队员,到顺义、朝阳和通县城关的136个企事业单位,开辟新的社教试

点区。经过“疏散”，在农村的工作人员每人联系的农户由五户调整为八九户。

同时，总团部根据北京市委指示，提出工作步骤是从宣讲中央文件入手，发动群众，调查研究，对于工作基础好和比较好的一、二类生产队，应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三级干部会，教育、动员干部“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和贫下中农一道团结对敌。问题突出的生产队，则由工作队领导，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这种做法是从通县实际情况出发的，但显然有悖于《后十条》修正草案所提倡的对原有的基层干部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由工作队领导夺权的做法。两种做法，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分歧。翟里和高各庄生产队的工作队，在陈伯达的指导下，搬用天津小站夺权的经验，抛开原有组织，“在斗争中发动群众”，“树上有枣没枣打三竿看”。事情反映到彭真那里，他说：“一切从生产队的实际出发，总团不要给框框。”

新的文件下达后，全国有110万干部参加试点地区的工作队。为了强化由工作队领导下打歼灭战的做法，10月24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11月13日，经毛泽东、刘少奇等同意，中央又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一时各地试点单位夺权成风，乱斗干部，破坏政策，使群情不安。

北京城乡的试点单位，同样出现混乱局面，最突出的是翟里和高各庄的工作队，他们对通县劳动模范、县人民委员会委员、高各庄生产队长窦子祥进行残酷斗争。工作队不顾县委对窦的政治历史已有的审查结论，给他扣上“假党员”、“新恶霸”等帽子。组织游斗，捆绑体罚，隔离审查，查封家产，组织展览。陈伯达还特地来到通县翟里大队，充分肯定高各庄的做法，要工作队“互相学习”。此后，乱斗干部之风蔓延，对窦子祥的斗争则进一步升级。12月26日，高各庄大队召开斗争会，把县委书记刘拓作为窦子祥在“县上的根子”，拉来陪斗。斗争会后，窦被公安部门拘留审查。总团部虽不同意这样做，但工作队打着陈伯达支持的旗号，有恃无恐。影响所及，通县地区44个分团中，有35个出现打人、罚跪、捆绑、熬鹰和家属陪斗等违法行为，有70人被迫自杀，死50人。在北京市区同样如此，北京大学

集中了260多名工作人员，抛开学校党委，正副书记7人有5人挨了斗，总支书记20人有18人挨了斗，“罪名”多是政治历史、思想观点和生活方式问题。工矿企业中，因工作作风、男女关系被斗自杀者，不断发生。

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小型工作会议，各大区书记在汇报中，纷纷反映“情况越摸越严重”竟无人指出“左”的错误，毛泽东因此说：“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工作会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么！”（《杨尚昆日记》下册，第464页）

2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会议纪要不满，批评说：一是政治上“右倾”，把社教运动定性为解决“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忘记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二是方法上一系列的“左”倾错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由邓小平、彭真及陈伯达参加进行修改，内容由17条增加到23条，于1965年1月14日下发，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

实事求是，化解矛盾，促进团结

在贯彻《二十三条》过程中，为统一认识，纠正偏向，化解工作队与干部、群众之间，被错斗的干部和斗人的干部之间的矛盾，彭真积极而审慎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1月20日晨，彭真致信毛泽东，要求当面请示：一是以《二十三条》精神总结经验教训，把“目前已经冒头和正在蔓延的浮动乱斗情绪，导入正路，或先把它停下来”，不追究责任。毛泽东说：就怕有人（把文件）装在兜里，不给人看。按毛的指示，彭真立即电话通知各大区，在群众中宣读文件，连夜印成大字布告，公开张贴。二是纠正社队、厂、校的工作队把原有干部“扔在一边的做法”，“比较自然地转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三是对工矿中的工段主任、班组长，建议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说服教育他们主动改正缺点、错误，不使打击面过宽。四是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四清”，要抓大是大非，成分、出身、历史问题“不能作为主题”，重在表现。五是

城乡划阶级,彭真建议,农村只划两头,地富和贫下中农,中间不划。毛泽东说:把敌人划出去。要把多数地富反坏改造成新人,表现好的你还开除吗?!把好人坏人都划,是繁琐哲学。知识分子中不划阶级,看表现。表现从工作队进校时算起!查三代,过去就否定了。毛泽东和彭真面谈时,刘少奇、周恩来等常委在座。

1月21日、23日,彭真分别向中央机关副部级以上、国家机关党组副书记以上干部和出席北京市委扩大会议的干部,传达《二十三条》和毛泽东的指示,其中有的干部是在北京通县地区“蹲点”的领导。他告诫大家要以《二十三条》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的偏向。他说:据李先念提供,全国已经完成征购粮食750亿斤,棉花2800万担,进度比哪年都快。事实证明,我们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这个事实“不仅是理论上而且作为方针也是有根据的”,可是,通县地区的工作队,不调查,不顾三大纪律,乱斗基层干部,施行体罚,甚至未经检察机关批准关押、抄家,“这不是表现我们能力强,而是无能”。从井冈山时代起,毛主席就反对打人,而“我们的高级干部竟以为打人就是革命”。他一面批评工作队,一面公道地说:“不论哪个工作队的问题,我们领导都有责任”,“因为我们没有领导好,或者有些规定不完全妥当”。他诚恳地说,对原有的干部,从县委到生产队,凡是错斗的,“我代表所有的工作队赔不是。你们可以转达,我们负责。”至于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基层干部,他们应当到一定范围的群众中去检讨。他现身说法地说:欠了账是要还的。在延安整风时,他在“抢救运动”中也犯过扩大化的错误,几经检讨还有人不同意。他敦促工作队员要站得高一些,不要“顶牛”,而要主动检讨,促进团结。

1月25日,彭真在通县地区有11.3万人参加的广播大会上发表讲话。参加会议的是社教试点地区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县、社、队干部和工作队员,中农代表和少数地富子女,以及干部家属和有关的职工,浩浩荡荡,设有61个分会场,把党的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

广播大会后,市委决定趁热打铁,将试点地区的两万多名县、区、社、队干部集中到通县,在不斗、不追、不逼的情况下,自觉交代问题,放包

袱。三天后,召开大会,对坦白较好或有立功表现的贪污、盗窃分子,宽大处理,有的不戴帽子,有的免于刑事处分,有的建议当地群众在退赔上予以减、缓、免,体现了政策。4天之内,共有12000多人交待了大小问题,包括贪污、盗窃的粮食54万斤,现金22万多元,为解放大多数,实现团结95%以上的干部创造了条件。

彭真又和中央各部门“蹲点”的领导人和工作队分团以上干部座谈。他说:春打六九头,过几天地化冻后,该动手生产了。工作队回村,一要把已经交待了问题的干部解放出来,该作结论的作结论,该退赔的定出计划;小事小非,由他们自己向群众赔不是,总之一要化解矛盾。个别顽固的,留待以后处理。二要整顿组织,抓生产队和党支部的领导核心。新班子,要政治好,又要懂生产。三是再次叮嘱工作队,他说:我在大会上肯定工作队的成绩是应该的,因为《后十条》修正草案是中央文件,工作出偏差,责任不在工作队,但是两个十条都没有说可以打人,所以工作队不要持形而上学一贯正确论,该检讨的要检讨。

经过近两个月紧张工作,通县地区的干部群众,在《二十三条》基础上,团结起来了。3月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北京通县转得比较自然,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第二天,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通县试点地区四清运动的报告》,同时,把彭真在通县四清广播大会上的录音报告批发全国各地。龚子祥的问题,5月初,市政法部门和总团部宣布:“假党员”、“新恶霸”均不能成立,应予释放。1965年,北京全郊区农业粮食总产达到11.9亿公斤,比1964年增产2.2亿公斤。

彭真坚持实事求是,依据《二十三条》扭转了通县四清的混乱局面,纠正了“左”的偏向。耐人寻味的是,《二十三条》在政治上提出了更加“左”的内容,这就是“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文革”前夕,彭真敢于在毛泽东面前,一再坚持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成为他“翻身落马”的近因,以至身陷囹圄,蒙冤12年。他虽然无力回天,但他的实事求是精神,益发显现光彩。

(责任编辑 洛松)

袁文才的功过是非

● 晓 农

袁文才原是绿林头领,在共产党的感召下,毅然投身革命。在秋收起义遭到失利的危急关头,他深明大义,洞开山门,迎接毛泽东及其部队上山,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立下了不可低估的、别人无可取代的功勋,本人成为湘赣边界党、政、军领导人之一。其后,由于党内外的诸多复杂因素,袁文才成为党内最早(1930年2月)被错杀的人物。对于他的评说,不尽一致,褒贬各有。而纵观其一生,究竟功有多大?错在何处?



袁文才

袁文才早年读过中学,不堪忍受官府豪绅的欺凌,被迫上山投靠绿林“马刀队”。由于他胸富韬略,颇晓世故,很快在“马刀队”崭露头角,成为首领之一。1926年夏,共产党人龙超清、刘辉霄等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宁冈领导群众斗争,以响应北伐革命。这些党员们于实际斗争中意识到:要推翻代表北洋军阀利益的县公署,没有掌握一定的武力是不行的。他们几经计议,鼓动北洋县长对“马刀队”实行招安,然后利用刘辉霄、刘克犹等与袁文才的同学关系,多次进行劝说,晓以利害,终于使他率部下山,编为保卫团。不久,北伐军由湘入赣,猛攻南昌,北洋军赣西驻军抽调参战。党支部趁此机会,动员袁文才率部起义,消灭了反动地主武装清乡局,推翻了北洋县政府。从此宁冈的革命斗争局面大开,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袁文才的队伍

改编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及“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湘赣边界,袁文才率部退守茅坪,抵御住了国民党军队和豪绅武装的进犯,保存了80多支枪。宁冈的党组织也得助于袁部未受到损失,不少党员以茅坪为藏匿地坚持斗争。是年的7月,永新的右派力量收买土匪武装袭夺县城,将县委、县农协的80多名党员干部抓起来投入监狱。袁文才接到这些党员从狱中传出的求救信,连夜联络好友王

佐,一同率部奋力攻陷永新县城,救出了这些同志。随后,永新县委带领百余人随袁文才来到茅坪暂避一时。

如果说,争取袁文才带领绿林队伍投在革命一边,为湘赣边界的工农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话,那么,在秋收暴动遭到失利的紧急关头,袁文才毅然打开山门迎接毛部上山,从而开创了我党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其功勋更是不可低估。

毛泽东是在秋收起义连连受挫,军力由起义时的6000余人锐减为1500人的严峻情势下,决定放弃原定的战略计划,按照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的指示而转兵井冈山的。他耐心地说服了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俊等人,率领部队从莲花县城向永新进发。军至三湾,毛泽东让部队停驻下来,一方面写了信派人送往宁冈茅坪,另一方

面下大力气整顿部队,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的原则。

当时的工农革命军只有一千余人,且“困难甚多,光是伤病兵方面,正弄得‘救死扶伤不暇’”,毛泽东深知在没有取得袁文才的同意之前,是不能贸然进驻井冈山的。袁文才如果是一个心胸狭隘、毫无卓见的草莽英雄,一口将毛部拒于山外,工农革命军也是无法可施的。倘若井冈山不可立足,一定转往他地,这样,也就没有其后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了。

袁文才深明大义,听说党的中央委员毛泽东,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率部而来,思想上大为兴奋,表示支持毛泽东在井冈山实行武装割据,并通过派去接头的代表陈慕平表达了这一立场。毛泽东见半个月来为之担忧、为之殚精竭虑的部队落脚点问题有了着落,心头如释重负,第二天就率部开到宁冈的古城。毛泽东在古城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确定了“不去湘南,割据井冈”的方略,把个人的意愿变为党的决议。会议结束的翌日,毛泽东来到大仓村,与袁文才见面晤谈,落实了安家茅坪的事宜。袁文才答应包揽毛部的粮饷供应,帮助设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当场赠以银洋1000元。

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下家来,袁文才予以了最大程度的帮助。首先是保证军粮及其他生活物资的供给,将宁冈全县的公产、神产、族产的租谷集中到茅坪,每天十几个农民为之苍谷筛米。接着,派人协助工农革命军建起了医院、留守处、修械所、被服厂等后方机关,使之有了一个简单而又不可缺少的家。袁文才毫不犹豫的大度之举,无疑对争取王佐队伍创造了有利条件。向来对袁言听计从的王佐,原先那种固有的戒备心理迅速消除,转为诚恳地接受共产党、红军的领导。

在军事上,袁文才及其部队为打破敌人的频繁进剿,巩固红色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袁文才率领的已成朱毛红军主力之一的三十二团,官兵们都是本地人,谙熟地形民情,惯于爬山,枪法准确,常常在战斗中独挡一面,甚至出奇制胜。以1928年6月23日的关系到根据地存亡的七溪岭战斗为例。战前,袁文才率领所部潜伏于敌前沿指挥部白口村的后山,待战斗最为激烈时,突然从山上杀下,捣毁了敌指挥部,又赶到老七溪

岭,在敌军背后发起袭击。敌军顿失指挥,又腹背受击,在二十八团的反击下败退下去。接着,袁部与二十八团又增援新七溪岭,配合二十九团打垮敌人。此次战斗的战局异常危急,几次将为敌所败。战后,敌师长杨如轩说:“匪势将溃退,忽有匪军一股绕袭我军后方,致使后方部队突被冲破,而行退却;前线部队旋受牵动,卒归败退。”由此可见,袁文才率部袭夺白口,的确在关键时刻扭转了战局。

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洗礼,使得袁文才政治上更趋成熟。他服从前委、特委的领导,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竭尽忠智,贡献卓著。基于这一点,袁文才受到了器重和信赖,历任前委委员、特委委员、红四军三十二团团长的职务。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将他家列为“我们的永久通讯处”。

毛泽东、朱德诸人在井冈山营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从理论和实践上为革命辟建了一条正确的新路。而袁文才在当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不可否认和不可低估的。诚如一些老同志所言:“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只有两营多人,没有袁文才答应在茅坪安置伤病员,没有袁文才联合王佐支持我们,我们是不容易进去的,就是进去了也难站住脚。”(熊寿祺1963年语)陈伯钧也于1960年谈到:“那时是革命低潮时期,不靠袁文才、王佐,我们就没有办法支持武装斗争,没有井冈山就无法生存。在井冈山一年多渡过了革命的难关。”同样地,国民党反动派和湘赣边界的豪绅阶级,对袁文才是恨之入骨的。他们在给江西省政府要求进剿的报告中写到:“湘赣不靖也,推原始无袁文才不能勾引毛泽东,无毛泽东焉能结合朱德?”³⁸名土豪的联名信中写道:“朱毛所以在地邑数年,以宁冈为策源地,欲发展其共产政策,以有袁文才、龙超清诸匪为主导也。”1929年1月湘赣两省第三次“会剿”井冈山,在城乡四处张贴的“共党渠魁悬赏令”当中,袁文才的名字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平列在一起,其“花红”是同样的“三千银洋”。

袁文才有无过失?当然有之。而过去留下来的一些历史材料,过分地夸大或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他的错误、缺陷,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后人对他

的看法。以几则材料为例。红军刊物《红旗》1930年5月刊文：“该二匪（指袁文才、王佐，笔者）对于建立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实行土地革命，反对盲动主义等，一概反对。在外仍然恣意大烧、大杀、大抢。”红五军军委在1930年3月的一份给中央的报告中，则这样写到：“袁王公然离间红军与工农的感情，派其党羽来红军拖枪投诚……任意屠杀工农分子或同志，公然在湘赣边界五次大会上，手持卜子枪叫独立等。事后并发现勾结茶陵等县的土豪劣绅，想另找出路。仇视外地赤卫队的兵士，自过起花天酒地的山大王生活，不但三妻六妾，可以说井冈山上的美色女子，没有一个不受其奸淫，其罪恶实不可胜数。”

以上所述，实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殊不知，毛泽东对袁王曾作出充分肯定：“他们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国民革命以来，现在愿意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时期，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即使毛泽东与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袁王仍然同以前一样，是忠心于革命的。问题在于当时湘赣边界特委的领导人，不但不能像毛泽东、朱德那样正确对待他们，反而把他们当成敌人。邓乾元在《湘赣边界工作报告》中写道：“足以危害边界政权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政权。”

袁文才的错误、过失体现在哪些方面？依据现有的史料，能作以下几点判断。

首先是从赣南私下逃跑回家，即开小差。1929年1月中旬，调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随四军主力出发赣南，行至广昌县的苦竹坪，他不向毛泽东等人打招呼，只把一张条子放于军部桌上，便带着心腹谢楼标、刘天林等6人离开营地逃跑。此举无疑属于临阵脱逃，是极大的错误。产生这一错误的原因，除了袁文才对于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最主要的是在前委秘书刘辉霄处看到“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府组织问题决议案》，心中震撼不已。因为决议案讲到：对于土匪的关系，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袁文才在思想上激烈斗争了几天后，那种害怕共产党政策变化的心理占了上风，于是私下逃回井冈山。

不能正确对待土客籍争端，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亦为袁文才一生中的失误之一。边界各县历来分为土客两籍，历史上的怨仇甚深，互相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就是毛泽东在的时期，也形成过“土籍的党，客籍的枪”这种界限分明、争权夺利的情状。作为客籍民众领袖的袁文才（也包括土籍的领袖人物龙超清、王怀、朱亦岳等人），不能正确地对待问题，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着维护本籍的利益，卷入在党内、民众之间的争斗中，为一些事情伤和气、伤感情，严重影响到双方的团结。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在分配土地、确定打土豪对象、进行政策决定、党政职务任命等等，袁文才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还有一个处理罗克韶事件欠妥的问题。罗是湘赣边界三县的反动民团头领，拥有数百支枪，并有一个小型的兵工厂。袁文才早就有这样的打算，即把罗克韶抓到手，先以礼待之，把罗的兵工厂掌握过来，为红军造枪、造子弹，到时候视其表现再决定是杀还是放。这时候，袁文才与边界特委的负责人龙超清、谢希安等人业已交恶，关系变坏，便没有将自己的打算向特委报告，更不用说取得批准，就擅自行动，将罗克韶抓来后在新城为其置酒压惊，予以优待。这一做法引起了特委的怀疑，使得豪绅阶级乘时造谣，说袁文才勾结罗克韶反水。正是对这一问题处置不当，成了袁文才被杀的导火线。因为特委认为不诛除袁王，就要被“反水”的袁王所消灭，只有以军事阴谋抢先下手。

末后一点是袁文才遗有一些绿林习气。这不仅表现在生活上的散漫，更主要的是指个人的意气方面，包括那种天下老子第一的脾性，对不顺心的人不加团结，直露一种即使错了也宁愿错到底的蛮性。这些对于搞好党内团结妨碍甚大。

由于年代和环境不同，袁文才与许多的历史人物一样，不可避免地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过失。对于这样一个从绿林头领成长为红军将领的人，后人既不可苛求于他，也不能为之偏袒，应做实事求是的分析。总的来说，袁文才的一生，革命功绩远远大于过失。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张经武之死

● 王锡堂 谢协农

张经武一生 ,夺关斩将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立下过赫赫战功 ,却惨死在“文革”关隘 ,至今连骨灰也未找到。

支持一派 ,落下东躲西藏

1966年初夏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 ,刚从“世界屋脊”西藏回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不到一年的张经武 ,出自对伟大领袖的忠诚 ,决心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当年盛夏 ,他在中央统战部接见前来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家乡炎陵县红卫兵时 ,还谆谆地对他们说 :“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 ,关心国家大事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然而 ,运动的发展并非他所理解的那样简单。中央统战部内很快出现了三派群众组织。他们都打着“革命造反派”的旗帜 ,称自己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派。在一段时间里 ,张经武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哪一派。

不久 ,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社论 ,要求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 ,和红卫兵小将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张经武感到彷徨不安 ,他终究到统战部不久 ,情况不了解 ,仍然不能随便表态支持哪一派。

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分管统战工作的领导同志表态支持其中的一派。按照过去思考问题的方



张经武

式 ,张经武认为这不会再有错 ,当即也作了支持的表态。谁知这一表态 ,便铸成了大错。

支持一派 ,就必然要得罪另几派。一个夜晚 ,他们闯进了张经武家 ,想把张经武抓起来。但被支持的一派事前得到信 ,早已把张经武藏了起来。

先躲在颐和园介寿堂 ,最后到了保定。同去的还有张经武妻子杨岗的侄子杨汉生。这中间曾想到四川去找张国华 ,去山东找杨得志 ,又怕路远万一总理找 ,一时赶不回来。

住在颐和园介寿堂的那天 ,是9月4日。那天 ,张经武同几个造反派进行交谈。交谈中 ,必然议论“文革”的形势 ,确实也涉及到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尽管群众组织的几个头头说得多 ,张经武很少插话 ,但事后不久 ,“文革”领导小组知道了 ,把这次介寿堂谈话定性为“黑会”。张经武是“黑后台” ,这成了张经武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罪状”。

9月21日凌晨2点 ,周恩来接见统战部几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谈及张经武的近况 ,对于他支持一派群众组织 ,并同他们的头头躲起来的事 ,自然有批评和责备。但从话语中 ,使张经武感到更多的是关心、照顾。

事后他从保定回到了北京。随即给总理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处境,并谈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这封信通过杨岗的侄儿杨汉生送到了中南海。不久,周恩来把张经武接进了中南海。

在中南海的日子是比较平静的,每天除了看报、听广播,张经武并没有事情可做。他那一颗难以平静的心,总惦记着统战部工作和运动进展情况。

知夫莫如妻。杨岗知道张经武在想什么,因而时常把有关情况写成纸条,藏进给张经武送去的饭盒里、面包中。谁知,这事很快被人发现,并报告了江青。

在中央的一次碰头会上,江青突然责问周恩来:“张经武是你保护起来的吗?”

周恩来还没有作任何回答,江青又接着说:“张经武在中南海很不老实,他老婆经常给他传递秘密情报,专与文化大革命对抗,这样的人就该到运动中去烧烧。”

江青发难,统战部的另几派群众组织更是火上浇油,要求张经武回统战部参加运动,接受批判,总理最后也只好同意。

张经武离开中南海时,周恩来有过明确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只许在小范围内批判,不许开大的斗争会,同时要保证张经武的生命安全,管好他的生活。然而,在当时中央政治局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又有几个人会听总理的?

张经武回到统战部,一直受人密切监视,尽管他小心翼翼,却动辄得咎。

一天张经武正在统战部大院看大字报,忽然听到有人叫他“舅舅”,他回头一看,是自己的外甥叶知秋。二人难免互相问候几句,最后张经武对外甥说:“告诉家里人,不要担心,毛主席是会说话的。”

就这样一件事,被人说成是秘密串联,订立攻守同盟,批斗随之升级,常常打骂、罚跪。不久,张经武被送到西郊半壁店监视起来,继而又被关进安定门外交部干校改造成的临时监狱。

“罪状”三条,均为“莫须有”

“文化大革命”中办案,常常讲“上挂下

联”。张经武与贺龙共事八年之久,并曾是他的得力助手,林彪、江青等要打倒贺龙,张经武自然逃脱不了被打倒的命运。从1967年开始,张经武便身负“三大罪状”,被“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立案审查。

“罪状”之一,抢档案事件的黑后台。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传到北京,1月14日晚,全国政协机关的一派群众组织夺了“全国政协”领导的权,消息传到统战部,张经武表态支持的一派,派人去政协支持另一派反对夺取,并于当晚将政协的档案转移。第二天(即1月15日)凌晨,他们又以保护档案、不让对立面“抢走”为名,将统战部的档案接管并转移。为此,两派组织发生了激烈争吵。

事后,越传越玄。如说统战部领导有人指示冲档案室,抢走了27箱档案材料;更有甚者说,有一批绝密文件,是海外重要统战人士、特工所写的信件,已落到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手中,结果使一些我党在台湾的高层人士被杀害等等。

“张经武专案组”在审查“抢档案”事件中,尽管多数当事人实话实说,说张经武根本不知道此事,却没有人相信。他们只听信这里面的一个人为开脱自己责任而编造的得到张经武支持的口供。

“专案组”对张经武进行了两天两夜的车轮式审讯,要他交代支持抢档案的“罪行”,并从审讯笔录中东挑一段西摘一段,编写了一份“张经武自供”,叫张经武签字。

张经武看后,拒不签字。他说:“我干了这么多年的领导工作,还在军委办公厅、主席办公厅工作过,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机密吗?难道还会支持他们抢走党的机密?”

审讯者申斥张经武:“抢档案的一派组织是你支持的,你和他们穿的是一条裤子,不是你支持他们抢走档案的是谁?”

张经武继续和他们讲理:“毛主席说过,革命干部要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我是表态支持过他们的组织,但我没有支持过他们抢档案。”

张经武由始至终,没有在这份“自供”上签字,专案组也只得不了了之。

“罪状”之二,历史不清的假党员。

在审查过程中,张经武于1968年3月3日

向专案组写了一个《自述》,其中谈到入党问题这样写道:“1930年4月由河南沪案后援建国军军官学校军需姚日蒸(上进),江西上饶人,政治教官管梓材介绍入党,并由三人组成校委会,我任委员。”

这与他较早时候所写的材料不同。1940年填写的《履历表》和12月张经武撰写的《自传》中都说:“1930年4月于河南许昌经姚上进(日蒸)、刘同德两人介绍入党,候补期三个月。”两者主要的不同是,前者介绍人之一为刘同德,后者介绍人之一为管梓材。

专案组没有查到张经武1940年12月写的《自传》,便按照他写的《自述》到南京档案馆和南京监狱查阅档案,找到了管梓材一封给张经武未发出的信,得知姚日蒸已经去世,管梓材还活着。他们找到了管梓材,管梓材说:“那时我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介绍他入党呢?”

张经武这一记忆上的错误,使专案组的人如获至宝。他们认为抓住了重要突破口,随即对张经武进行突审,逼他承认是假党员。

张经武当然不会就范。他辩解说,几十年前的事,具体人、具体的情节,可能记忆有误。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千真万确的。

“罪状”之三,“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在西藏的忠实执行人。专案组在抓张经武现实问题(档案事件)、历史问题(入党介绍人)的同时,视线一直盯在所谓黑线人物问题上。专案组多次审讯,要他交代在西藏执行“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张经武十分明确地回答:“去西藏,是毛主席派我去的,是中共中央决定的。去西藏前,毛主席还找我谈了两三个小时。西藏工作的大政方针,也是毛主席定的,是西藏和中央双方谈判定下来的,我执行的都是毛主席的路线。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毛主席。”

专案组审不出结果,又以“打态度”为名,体罚张经武,逼他写出“交代”。几个晚上过去了,专案组给他的稿纸上,他一个字也没有写。张经武成了抗拒“文化大革命”的典型。

一天,专案组的人气势汹汹地闯进关押张经武的房子,大声吼道:“张经武,你老实交代想当总理的阴谋!”

张经武为这突如其来的责问,开始一愣。随

即冷笑了一声,几分幽默地说:“你们不觉得这种说法太荒唐吗?我张经武还不敢有这种野心呐!”

来人拍拍公文包说:“这是我们掌握的材料,你还不老实交代?”

张经武苦思冥想:他们手中有什么材料说我想当总理呢?无非是说我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最大罪名就是反对周总理,反对周总理就是想当总理吗?

张经武根本想不到,专案组掌握的“材料”,竟来自他的夫人杨岗。

原来在张经武被抓的同时,杨岗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专案组的刑讯逼供,使本来身体就很虚弱的杨岗精神失常。她哭,她叫,可专案组并没有因此而放过她。他们采用诱供、逼供的办法,迫使她根据专案组的需要,写了一份张经武的材料。材料中说,张经武参与了贺龙搞的“二月兵变”,兵变成功后,贺龙当主席,张经武当总理。

张经武渐渐悟出了真相:专案组诱逼精神失常的杨岗写出假材料,再拿假材料来诬陷张经武。张经武不禁冷笑着说:“说我想当总理你们太抬举我了,我参加革命以来,还从未有过这种想法。这只能说明,伪造材料的,是一伙卑鄙无耻的小人。”

刚强不屈,蒙冤逝世狱中

“文革”以来的所见所闻,监狱生活的心感身受,使张经武有了越来越多的思考。“文革”开始一直“紧跟”、生怕掉队的张经武,开始怀疑这场运动的目的和性质。这难道是毛主席说的反修防修的大革命吗?越来越感到自己在被人愚弄、陷害,他开始用沉默来表示抗争,凡是专案组要他交代问题,他都不再理睬。

越是这样,江青、林彪一伙越认为他不老实,回答他的是越来越多的严刑拷打。在那时的恶劣环境中,张经武想见毛主席、周总理是根本不可能的。连他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每一封信,都被专案组扣下不准上送。

张经武感到绝望,一天,他趁看守不注意,一头朝暖气管上撞去,顿时,鲜血直流……

幸亏没有造成更严重后果。但是张经武与看

守员的关系更紧张了。张经武埋怨扣压他写给毛主席、周总理的信。看守骂他是“老反革命”，没有资格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

张经武说：“告诉你，我干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你们残害老干部，才是反革命！”看守说：“你这个老反革命还敢骂人？”

双方由对骂发展到对打。已是年过花甲的张经武，哪能打得过年轻力壮的看守？他一只胳膊脱臼，另一只被打得骨折。

抗争没有用处，性格刚强的张经武采取另一种斗争方式——绝食。炊食员每天送来饭菜，他都喊：“你们查不出我什么问题，就放我出去；你们不放我，我就绝不吃你们送来的饭菜。”

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张经武一直坚持了一个星期。在这期间，专案组一直不向上面如实汇报张经武的情况。直至第八天，即1971年10月27日，张经武出现心力衰竭和休克现象，专案组才把他送三里屯附近卫戍区警卫二师医院。抬进医院时，张经武的呼吸和心跳几乎全没有了，血管也已干瘪得难以输血抢救。半个小时过后，张经武呼吸和心跳完全停止。

张经武死后，医院留下的病历上写道：“患者56号，企图自杀，自撞墙自杀未成，将右臂撞伤，左肘关节脱臼。5月1日送积水潭医院……”

为掩人耳目，推卸责任，给中央统战部发的死亡通知书上则写道：“张经武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于10月27日去世。”

平反昭雪，不见骨灰

1978年冬，全国人民在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胜利之后，再次欢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张经武的夫人杨岗从秦城监狱被释放出来不久，便带着子女为查清张经武的真正死因、为还张经武历史的清白，四处奔走，寻访调查。

卫戍区警卫二师医院当时的副院长和内科、外科的负责同志，都对张经武病死的真实情况，作了一些介绍。邓小平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元帅，以及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李井泉，都十分关心张经武的问题，积极呼吁为张经武平反。

那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对

张经武的平反也十分关切。当他得知有些受“文革”影响很深的同志仍说张经武在“文革”受审期间态度恶劣时，他说：“张经武的这种态度，足以说明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如果我们的老同志在‘文革’中被关押期间都低头认罪，让交代什么就交代什么，那还不知道要制造出多少冤假错案！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有这种刚直不阿的气节，宁死不屈。谁说这是罪状，不能平反，那就是颠倒黑白！中央开会，我一定要为张经武说话。”

在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张经武终于得到了平反。可是，他的骨灰早在8年前就被弄丢了，至今尚未找到。

197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全国政协礼堂为张经武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大会。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张经武的一生。悼词说：“张经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张经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责任编辑 洛松）

科技汇合 情理交融 图文并茂 雅俗共赏

《科技文萃》月刊

这是一本 16 开 192 页的大型科普月刊，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浩瀚的报刊中，选精拔萃汇集而成。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可读性强，信息量大，一册在手，全局在胸。省时省钱，便于收藏。

科学性
思想性
知识性
趣味性
资料性

欢迎订阅 2004 年《科技文萃》

每期定价 10 元，全年 120 元，国内邮费在内
邮发代号：82-93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也可直接向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订阅，随时收订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七棵樹北京纺织仓库内
邮编：100016 电话：(010)84313380 联系人：陈秀文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朝阳八里庄分理处(20114-04)
银行账号：02000038090661059-72

我在延安被“抢救”

——回忆六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 方 实

60年前,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事前没有任何一点迹象,莫名其妙地,我突遭边区政府保安处逮捕、关押,最终被“抢救”成特务,在监狱里度过了两年又十个月蒙冤含垢的生活,迄今也不能忘怀。事情已经过去整整60年了,我已是86岁的老人,但去见马克思之前,我还是想把这件奇闻记录下来,目的是反思历史,警示后人,类似这样的怪事不能再重演了。

延安的整风运动始于1942年春的整顿“三风”,目的在于整顿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肃清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达到革命队伍内部的认识统一,进而团结全党,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这本是一场普遍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然而,形势并未循着这个正确方向发展,领导者的整风战略很快产生极大偏差,由思想上的整顿转向夸大敌情、发动一场肃反运动、大搞逼供信、施行残酷的组织清理,推行了一条极左的审干和肃反路线。

1943年初,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整风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紧接着中共中央在4月3日发布的第二个“四·三”决定(即《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整风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时指出延安党政机关和学校内部“特务如麻”,强调整风和肃奸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并拟定了相应的战略。整风、审干、肃反、抢救、甄别,是整风运动的几个阶段。事实上,从时间、涉及面的深与广、历史影响等方面来看,整风都要逊于后几个阶段。尤其是肃反、“抢救”以来,冲破国民党重重封锁线,奔赴延安的革命知识分子,多数被“抢救”成“特

务”,其他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清理。抢救运动的成果是延安清出“特务”1500余人,延属各县共抓“特务”2400余人。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在“抢救”高潮时有80%以上的同志被打成“特务”。那时,逼、供、信大行其道,荒诞不经,导致诬陷罗织罪名肆虐泛滥,使很多好同志、好青年成为异己,受尽精神和肉体折磨甚至化为冤魂。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宗派主义的情绪、非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非但没有得到整顿,反而变本加厉地铺陈开来,造成革命队伍内部人人自危的大混战局面,真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运动。

我是1939年底从第二战区阎锡山部队转移到延安来的。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武装进攻山西新军决死队和八路军,这是抗战期间爆发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那时,我在阎锡山总部太原绥靖公署政治部做地下工作。事变发生后,第二战区政治形势恶化,在阎锡山总部工作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面临着被捕的危险。阎锡山总部地下党总支决定党员干部分批撤离。我是和我刚结婚的妻子白天、凌云(解放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安全部部长)等四人一起出走的。到延安后我即被分配到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2月,晋西北地区八路军和决死队将阎锡山部队全部赶走,建立了民主政权,创建了一个新的抗日根据地,急需抽调大批干部前往工作。因我和妻子白天曾在阎锡山部队工作过,我们是第一批从延安调去的人员。在这个地区工作了将近两年,白天因患重病,在晋西北得不到很好的治疗,1941年7月,晋西北区党委决定将她送往延安医

治。

1942年初,中央组织部将我从晋西北调回延安,暂住中组部招待所,一边照顾妻子的病,一边等待分配工作。5、6月间,一个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到延安来,因我在晋西工作过,故临时调我到边区政府交际处接待他们。参观团返回晋西北后,我被正式调入交际处。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来访延安的人很多,既有爱国的民主人士,也有国民党方面的官员,甚至还有特务。这些人来后都住在交际处。由于接触的人员身份、关系复杂,我有几个哥哥在国统区工作,为了他们的安全,我将本名叶笃成改为方实。那一年我26岁。

金城任交际处处长,是我的直接领导,他长我十来岁,工作作风和待人接物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到交际处时,整风运动已全面展开,全处分为四五个整风小组,我担任其中一个组的组长,足见金城对我是比较信任和器重的。

9、10月间,整风转向审干,延安各机关学校的气氛十分紧张,但我个人丝毫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自信参加革命以来,由一个爱国进步青年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无二,没有做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

只是有一件事情,我认为此时应向党组织说清楚。1935年,我在天津南开中学高中三年级读书时,受我的几个哥哥和同学的影响,开始接触进步书籍,同时对参加读书会十分积极。9、10月间的一天,返校时,我坐在电车上专心致志地看一本华岗所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由于阅读十分专注,加之那时政治上又很幼稚,竟连身旁坐着一个身穿宪兵制服的人也未察觉,他偷视了我所看的书,下车后,便紧跟上来强行把我带到宪兵队,继而转送到宪兵司令部,由一个40多岁的宪兵军官来审讯。他问我什么是 cp、cy,书的来源,与哪些人来往等问题时,我与之应付周旋,面对他的“训导”,则以“无知”回应。后盘问我的家庭,得知我父亲是曾做过清末直隶巡警道的道台(相当于现在的省公安厅厅长)叶崇质时,他竟同意对我取保释放。原来,父亲曾在保定办过一所警官学校,自任校长,此人正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在早已去世的父亲荫庇下,一个便衣宪兵随我取保后于当晚释放了我。回校后,我立即向学生会主席、南开中学进步学生领



本文作者(1992年摄于延安宝塔山)

袖吴祖贻(吴后来在鄂豫边区任区党委任民运部长,1946年中原突围时光荣牺牲。1936年我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先队”,他是我的介绍人)汇报了白天刚发生的事。

关于在天津曾被宪兵队拘捕过这件事,我在1939年入党时,本应向党组织交代清楚,但因在阎锡山军队里的党组织的工作处于地下状态,入党无须填表和写出书面材料,所以当时没有交代过。整风开始后,要审查个人历史,于是我如实地写出书面材料,向交际处党组织交代了这件事。材料交上去后,党组织没有人找我谈过,也没有任何人向我问起过这件事,我以为这一页对党毫无愧怍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了。

1943年初,审干形势更趋紧张,我依旧坦然,因为我自觉历史清白,没有任何让我紧张起来的因素。然而,做梦也没想到,厄运正在向我袭来。

4月3日上午,处长金城对我说:晋西北区委给中央组织部打来电报,调你重回晋西北工作。我问:什么时候走?他答:今天就走,下午正好有一批人要回晋西北,也好作伴。你赶快回去收拾行李,一会儿有人接你到组织部招待所与他们会合。我想这是组织决定,必须服从。回到住处向

重病尚未痊愈,还需拄着双拐才能行走的妻子白天告别。我们都没有想到,厄运也在等着她。

下午,一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马来接我,交际处在延安南门外,去中组部招待所须经过保安处。到保安处门口时,警卫员说:“马还没有喂,咱们到保安处里喂点儿料,你先到办公室里休息一会儿,时间来不及。我想也没想就进了办公室。一进屋,一个坐着的人一脸凶煞之气兜头指着我说:‘你叫方实吧!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你对人民犯了罪,必须老实交待。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的第一反应是笑了,我说:‘你们弄错了,我是到组织部与人会合到晋西北工作的,只是路过这里,休息一会儿就走。我这里有中组部转来的晋西北区党委发来的电报。但他仍坚持说:‘不对,说的就是你。’在我一再解释下,他同意打电话找组织部核实,我松了一口气。一会儿,他回来了,对我高声说:‘问过组织部了,根本没有你说的那回事,有严重问题的人就是你。不容我作任何辩解,不由分说给我戴上了手铐,押往保安处后面山崖旁的看守所。我被告知:到牢屋里对同屋的犯人不许说你的名字,你叫×××号,不许说你的案情,不许说自己的任何事情,这是严格规定。’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令我震惊、惶惑,转瞬间我就成了人民的敌人,成了共产党的囚徒。对此,我毫无精神准备。

我被推入一间窑洞,适应光线后看到一位50多岁的老者,胡子拉茬,脸色煞白,衣衫褴褛,一动不动坐在干草铺就的地铺上,看样子,已经关了很长时间了。还有几个人坐在地上都不说话。孤独、无助、委屈一下涌上心头,好像掉进无底深渊。

保安处的监狱有若干排窑洞,每排十几间,每间关押四五个人,大约有二三百名犯人。各间窑洞没有窗户,只在门上开一个伸不出脑袋的方洞,平时开着,放风时关上,这方洞供外面的人巡视、送饭、送水,给洞内的人透气、采光。在窑洞的墙角处有一只大尿桶,供排尿之用,如有人拉稀泻肚,也只能用这只桶。一个紧关房门的小窑洞,一个没有盖儿的大屎尿桶,空气的污秽可想而知。每天上、下午各送一顿饭,各放风一次。所谓放风,就是解手,不能走来走去,而且是各窑洞

分别放风,这时门上的方洞即被关闭,所以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周围关押的是什么人。白天提审时,被审者头上被蒙上一件大棉袄,谁也看不到他的真面目。隔壁窑洞放风时,我总是听到一个脚上戴镣的犯人走路时哗啦哗啦的声音。我想,这人一定犯有重罪,不然不会在窑洞里还戴着脚镣。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犯名叫魏伯,因跳崖自杀未遂,被戴上脚镣。魏伯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

在这间窑洞里关了一两个月,也没有人提审我,我更坚信是组织上搞错了,因为抓进来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组织对我产生了怀疑。进来的第三天,也就是4月5日,延安下了一场大雪,我在心里把它称为“六月雪”,心想老天爷在证明我的无辜。

大约6月的一天,看守从门洞扔进一份材料让我们看,是任弼时在一个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其中特别令人怵目惊心的是这样几句话:“最近,延安地区逮捕了一批证据确凿的、罪大恶极的、死不悔改的四种人——叛徒、特务、汉奸、托派……”看到这几句话我大吃一惊,我是这四种人中的哪一种人呢!?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困惑。循着我走过的道路,我开始冥思苦索……

在保安处昏暗的窑洞里,几天几夜,我反复回顾自己的历史。我自认对党、对革命、对抗战救亡大业一片赤诚,每一时期都可以找到证明人,怎么会是“四种人”呢?我又苦苦思索会不会有被组织误会的细节没有交代过。把所有的事情都过了筛,只有一件事,可能会被误会。

那是1943年1月,我收到一封寄自昆明西南联大我哥哥叶笃正(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任中科院副院长)的信。信磨损得很厉害,显然被别人拆开看过了。当时我想,信走了两三个月,还能不磨损,没有在意。我曾在给哥哥的信中述及我的妻子白天的病情。他复信道:“弟妹如此身体,在延安是不行的,是否出来,到大后方条件好些的医院治疗。他在信中向我介绍了他在清华大学时的同学,让我到西安找他,他可以介绍有关的人安排白天治疗。”

除了这封信和在天津被宪兵队抓过一天的经历,我绞尽脑汁,再也想不出可能被怀疑的依据了。

充满疑惧的囚禁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这些整风审干后抓进来的“新号”和在此之前被捕进来的“老号”渐渐熟悉,开始悄悄说话了。那个衣衫褴褛的老者对我说:“抓到保安处就不要想出去了,我是1938年进来的,把我关到保安处之后,还没见有一个犯人放出去。”从交谈中了解到他曾为第三国际做情报员,在东北工作过。他叮嘱我:你把棉裤屁股后面的棉花垫厚实些,审讯时有时会让你坐在地上,不招供,会让你坐上十天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旁边有警卫看着,你困极了,刚一闭眼打瞌睡,警卫立即用力推你,对你展开车轮战,有时还会动刑。

两个月后,终于提审我了,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因此头上不用盖上大棉袄了,但出窑洞时要被扣上手铐,由看守押到审讯室。我一共被审讯过两三次。很幸运,既没有让我坐在地上,也没有动手打我。审讯我的是一男一女,男的是陕北当地人,女的是李克农之女李宁,还有一次师哲也在场,他是延安审干运动中临时调到保安处工作的。审讯内容主要是交待自己的历史,我毫无遗漏地如实讲了。有一次问一件事,我感到很奇怪。他们问:你是否看过一本重庆出版的名叫《中苏友好》的杂志。我回答:看过。又问:你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吗?答:没有。以后细思忖,这恐怕是在车轮战或刑讯中有人被逼不过抖出的“线索”,由此推之,似这种无头无绪的虚妄“线索”在当时还不知有多少。

在保安处的三个月,越来越感到抓“特务”氛围的浓烈。迅猛而来的运动如洪水滔滔,似山火汹汹。水火无情,个人的抗辩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1943年7月15日,中央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指出,目前边区形势非常紧张,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边区周围布下重兵,极有可能向边区发动进攻,大战一触即发。处在这种军事非常时期,而我们内部特务如麻,如果不把这些特务清查出来,我们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他接着说,两个月来,延安已查出450名特务。我们现在是在抢救政治上的“失足者”。你们这些“失足者”不能再犹豫等待了,要赶快坦白交待,“失掉这个最宝

贵的时机,将永远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你们坚持反动立场,拒不交待自己的罪行,你们将面临着最为严重的后果。

康生在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保安处很快向全体犯人作了传达,并且透露,有两个罪行极其严重、态度非常恶劣的罪犯(一为蔡子伟,全国解放后曾任农业部副部长;一为钱惟人,是边区政府的公路局长)将在几天后执行枪决。这个消息一公布,引起在押犯人的极大恐惧。

一浪紧似一浪的“抢救”铺开,到八、九月时,保安处关押犯人的窑洞的门不再紧锁,白天不关门,晚上上锁,只要一坦白,就放出窑洞到比较宽松的环境里,饭菜也好些,尽管仍在保安处的管辖范围。这期间,不断有从外面来的已交待的“典型”作规劝报告,其中就有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最著名的“坦白从宽者”张克勤。保安处内交待了问题得到宽大处理的人也组成“规劝组”,到窑洞里来“规劝”我们这些没有坦白交待的“失足者”。这时,我真地有些相信延安有很多渗透进来的特务、奸细、汉奸,因为不少人在大会、小会上确实交待了自己犯罪的事实,说得有鼻子有眼,让你不得不相信。可我自信我绝不是特务,坦白什么呢?我有什么事情应在“坦白”之列?时间一天天过去,交待问题的人越来越多,被关押的人越来越少,加上看到交待了问题的人马上得到了宽大,这不能说不是一种诱惑。我精神上压力很大,思想上碰撞更是激烈,但还是没有下决心“坦白”,因为我不知道坦白什么。规劝组的人开始还以自己是如何“失足”的,如何“交待”的,党的政策对此如何来启发、诱导别人,后来,也渐渐谈些别的内容了。

一天,规劝组有人悄悄对我说:我就不是特务、汉奸。不管你是不是,只要你交待了,就行了。你写什么都可以,四顶帽子随便给自己戴上一顶就行。但是,要把你如何当上特务的、上级领导是谁、带了什么任务、如何混入边区、又发展了谁等等讲清楚……这也好写,可以随意编造事实,只要交待了自己是“敌人”,马上就会得到宽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后,于1944年初,我也终于“坦白交待”了——1935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因看进步书籍被捕,在

宪兵司令部受刑不过,当了特务。我的哥哥叶笃正在“一二·九”运动中游行时被捕,后来也当了特务。我到延安来是受叶笃正的派遣,他是我的特务上级,我将在延安获取的情报秘送给他……

交待以后,果真宽大了,立即从窑洞里放出,享受了比较宽松的待遇。当时我想,反正叶笃正也不是党员,又在大后方,我说的事情难以查证,任我“坦白”。虽然被“宽大”了,待遇也比较“自由”了,但是当时我内心却极为痛苦。过去我没有说过假话,更没有在政治性质的问题上造过谣。现在为了这点“自由”、“宽大”,竟然栽赃自己是“特务”,诬陷我的亲兄弟是我的“特务上级”,这还算是人吗!?还有没有一点做人的道德和尊严?!如果现在再发生类似延安“抢救运动”一类的事件,即使置我于死地,我也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绝不再做这样的丑事、蠢事、傻事了。

这一时期,延安和边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各机关单位、各学校的工作基本停滞,批判会、斗争会、大会、小会连续不断,互相检举,互相揭发,闹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当时延安有两处拘押犯人的机关,一是边区政府保安处,一是党中央社会部看守所,凡是“证据确凿、罪大恶极、死不悔改”的“要犯”都送到这两处专政机关关押审查。另外,还临时成立了两处专门审查“重大嫌疑分子”的“学校”,一是边区行政学院,一是西北公学。以上各处加在一起,大约有上千名“犯人”和“嫌疑分子”,这还不算在各单位、学校在“抢救”中“坦白交待”了问题的人。我的妻子白天就在行政学院接受审查。在那里,她和魏伯的妻子叶黎编在一个小组。叶黎是高度近视,一到晚间几乎完全失明。白天到行政学院时还架着双拐,在山坡上行走,非常不便。一块儿接受审查的同志开她们的玩笑说“白天不会走,夜里(叶黎)看不见”。

在全边区,对于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普遍性的严酷整肃,不少人持有异议。中央的周恩来等同志及时向毛主席建议应制止事态的继续恶性发展,毛主席对此也有所察觉。1943年8月,在毛主席亲自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正式制订了应贯彻的“九条方针”,反对逼、供、信,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蔡子

伟、钱惟人二人得以保全性命。在社会部看守所被关押审查的王实味是1947年从延安撤退到山西兴县时才被处决的。毛泽东进北京后才知道王实味已被处死,大为不满,提出“还我王实味!”)。一场人为的“抢救”混战终于从巅峰状态逐步趋于平缓,但运动并未就此结束,很多人仍被关押或限制自由,审干运动在延安以外共产党领导的一些抗日根据地仍然盛行。到1943年底,甄别工作在延安开始了。

从1944年上半年我坦白交代、得到宽大之后到1946年2月,我仍住在保安处,接受审查甄别,但行动相对自由,每星期放假一天,可以外出,但晚上一定要返回保安处。这一时期为了甄别工作的需要,保安处临时成立了一个材料小组,保安处的领导叫我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从国内公开发行的各种报纸、杂志、图书中搜集整理国民党地区各种政治组织(包括特务组织)的情况,如国民党、三青团、复兴社、军统、中统、同志会、敌工团……摸清这些组织什么时候成立的、领导人是谁、什么性质、工作任务等等,整理成书面材料,供甄别工作之用。参加这项工作的约20人左右,都是保安处里的“新号”和“老号”。现在能记起名字的有金树望(金城之弟、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全国解放后曾任国务院人事局局长)、周建南(解放后曾任一机部部长)、吴波(解放后曾任财政部部长)、何定华(解放后曾任武汉大学校长)、陈元方(解放后曾任陕西省委书记)等人。

1946年2月,终于等到了组织对我的政治问题的甄别结论:1.整风时交代的1935年被捕一事相信本人交待;2.比利菲说方实是特务,经查,不可信;3.叶笃正给方实写信引发的事情,经查,不可信。

至此我才明白关押我的主要依据来自比利菲的检举揭发。比利菲(女)与其夫崔英(朝鲜族人,建国后是朝鲜驻华使馆第一任文化参赞)是我1940年在晋西抗战学院一起工作的同志。至于她为何诬我为特务,我想,在那个非常时期和非常环境,面对外部的强大压力,在逼、供、信下,为了过关,乱咬别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不也是在高压之下,诬说我的哥哥叶笃正是我的“特务上级”,派我到延安来“搜集情报”吗!?

我们这批“新号”基本上是1946年做出结论后重新分配工作的,只有极个别的人放出来得早,如,李锐(解放后曾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由于工作需要,是由周恩来亲自点名放出来的。我在甄别结论上签字后,分配到新华社工作,终于离开了禁锢身心近三年的保安处。

保安处的几十个“老号”也与我们同时开释。他们受“惠”于“抢救”的疾风暴雨,否则,可能真的像那位曾做过第三国际情报员的老同志所说,“抓到保安处,就别想放出来。”如,和我一起分配到新华社工作的蒋齐生,1938年因被人咬住是“托派”被抓,1940年问题就查清了,处长周兴做出“无罪释放”的结论,但被康生压住。又如,王遵 1937年参加“民先队”,1938年经“民先队”介绍到冀中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战工作,1939年到延安,因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侄女,一到延安即被抓,在威逼之下承认自己是“汉奸”,“用织毛衣编花的办法,寄到北平给王克敏送情报”。她一直被关押到1946年。再如,金城之弟金树望1939年被抓,1940年中央组织部即下令释放,但保安处一直监禁不放。他(她)们每人都有一个极度委屈、难以释怀的故事。

全国解放后,我仍在新华社工作。195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与我的老上级金城同班,虽然经常见面,但未深谈过什么。此后,几乎没见过面。1992年间的一天,金城突然打来电话,说自己病得很厉害,很想见我。他是我的老首长,我一直很尊重他。他那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文革中也受到冲击。我很快去看望他,他已病得不能起床,声音微弱、低沉。他说:我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延安整风时是我把你送进了保安处,让你受了很多委屈,希望你能谅解……不久,金城就去世了。

金城临终的话,声音微弱,语速缓慢,但他终于说出了我想是折磨了他几十年的话,使我感慨良多,我完全谅解他。当年,交际处送保安处的只有我一人。1943年4月初,胡宗南的秘书要来延安,住到交际处,我的“特务”问题恰在此时被“揭露”出来,我想,可能是金城难以判断真伪,又怕我真是特务,会出问题,所以只能送我去保安处。

“抢救”运动无疑是在极左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发动的一场革命队伍内部的大混战。虽然甄别工作开始后到1945年的“七大”,毛泽东在一系列公开场合为此多次脱帽赔礼致歉,说是当时本意只是想给大家“洗个澡”,不料“灰锰氧放多了,实在对不起”。但是,对于这场运动产生的思想根源是什么,错在哪里,危害影响几何,有哪些教训可以吸取……在当时和以后都没有做过符合客观实际的深入研究和反省。因此,运动虽止,影响犹存,以至建国后以整知识分子为重点的政治运动连续不断: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受牵连者达2000余人;1955年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受牵连者有百余人;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就有55万余人;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把对国家、对党有贡献的大批领导干部打入另册;1962年北戴河会议,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在党的一切工作上正式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1964年全国农村大搞“四清运动”,提出全国基层政权“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中”,第一次提出“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直至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发展到巅峰,给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的创伤和难以估量的损失。

历史是真实的存在,既厚重、又鲜活。这里有数不尽的足以令全民族骄傲的辉煌,也有不少让人难以释怀的曲折、坎坷和磨难。反思历史之路,决定取舍扬弃,是非常重要的。中外古哲有几句名言——“一个不能从灾难中总结并吸取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易于淡忘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凡是忘掉过去灾难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我们应该深深记取这些刻骨铭心的教诲。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以60年前不堪回首的所历、所闻为这段历史做一个真实、形象的注脚,是我的愿望和责任。现在,我们党强调宪法权威,倡导依法治国,要加强党的民主建设;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巡讲话中特别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这些都是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

我想,我的这段回忆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

(责任编辑 于 羚)

中共“一大”代表 刘仁静建国后的遭遇

● 张惠卿

1987年8月5日清晨5点多钟,在北京,一辆从北太平庄开出的22路头班公共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南驶来,马路上薄雾未散,行人稀少,司机一时大意,没有注意到一位老人低着头,正从东往西穿越马路向北京师范大学走去,等到发现前面有人已来不及刹车,车前杠把老人撞出7米开外,当场昏死过去。

这位老人是当时唯一活着的中共“一大”代表、85岁的刘仁静。他的家就在马路东边,他是每天这个时候去北师大操场晨练的。他的老伴正站在窗口看着他过马路,震惊地发现了他被撞倒,等全家人赶到出事地点时,老人已被送进附近的北京军区262医院抢救,但因颅骨碎裂,大量出血,医生虽采取了一些措施,已回天乏术了。

刘仁静刚在上一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他的行政关系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作为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我闻讯赶到医院时,他已被送进太平间了,他儿子刘威立向我叙述了出事经过,我去太平间看了刘仁静老人,他脸色惨白,双目紧闭,走得实在太突然了,我心中怆然。不久,参事室也派人到医院来了。在商议后事时,刘威立向参事室的同志提出一个请求,希望组织上给他父亲的一生经历写一个结论。但最后得到的回答是:不写了吧,不写比写好。

就这样,刘仁静默默地结束了自己复杂而又坎坷的一生。

刘是1952年1月由组织上安排到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以后他虽被列为编外人员,“文革”期间又被关进秦城监狱多年,但他的关系始终在人民出版社,从1952年到1987年整整35年,他这个特殊人物的后半生,和人民出版社结下了不解

之缘。

但是,作为托洛茨基的忠实信徒、中国托派最早的组织者之一的刘仁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愿意通过认错,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可是他的认识和党的认识差距太大太远,他不能见于新社会,他的后半生过得相当艰难。

因工作关系,我和刘接触的机会较多,30多年除他被关押在监狱的十一二年外,几乎没有间断过。他这些年的经历和遭遇我都比较清楚,对他的历史和思想状况,也逐步有所了解。深入观察和探究这位历史人物复杂而多变的一生轨迹,令人感慨良多。

刘仁静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活跃分子。他1902年出生在湖北应城一个教书先生家中,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20年加入由李大钊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即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他因努力研读并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有“小马克思”之誉,后又积极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他和张国焘一起被选为北京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只有19岁,是13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

“一大”选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央委员,组成党的中央局。说来十分凑巧的是,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李达创办了党的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而正是刘仁静,担任了李在人民出版社的主要助手。李和刘一起,制订了包括《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和共产主义丛书等庞大的出版计划。但在出版了一部分图书后,却因故被迫停止了活动。

1922年,刘与邓中夏共同创办并主编党的

《先驱》杂志,这个杂志后来成为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下半年和陈独秀一起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聆听了列宁的报告,并代表中共发言。1923年回国后,即赴广州参加党的“三大”,不久又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团的“二大”,并被选为团中央书记。1926年,陈独秀派他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即国际高级党校学习,其间,刘又列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因共产国际指导中的错误,指责斯大林,引发了联共(布)党内的一场激烈争论。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倾向托洛茨基的观点,刘仁静经过仔细比较和分析后,也赞同托洛茨基,他还研读并收集了托的不少论著,从此成了托的信徒。

1927年底,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用组织手段清除出党,并被流放,1929年初又被驱逐出国,居住在土耳其的太子群岛上。刘仁静于1929年春在列宁学院结业绕道欧洲回国时,出于对托的狂热崇拜,背着党去土耳其拜见了托洛茨基。托十分高兴,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中国信徒,和他促膝长谈,留他住了十几天,并起草了一份名为《中国政治状况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的提纲,要刘带回国内,认为这个文件可以作为中国托派的纲领。刘和托深谈后,对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以后好几年一直与托保持着密切联系,托曾不断地给他写信、寄书、寄材料。因此刘是中国托派中唯一谒见过托洛茨基本人并得到托亲自指点的人。他在回国后就开始对党产生了离心离德的思想,自以为得了托洛茨基的“真传”,把托的提纲视为挽救中国革命的灵丹妙药,一心要充当救国救民的救世主。他一面著文鼓吹托洛茨基的主张,宣扬托洛茨基主义,一面同已回国的一些托派分子联系,着手组织反对派,与党直接对抗。当时陈独秀也正结束多年沉默向中央路线提出意见,并倾向托派的观点,党内出现

了严重分歧。1929年10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党内机会主义指陈独秀等人,托洛茨基反对派则是指刘仁静等人),接着11月又通过了开除陈独秀等人出党的决定,刘仁静则在回国后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党一直未接他的关系,后被视为分裂党的罪魁祸首将其除名。

1930年起,刘仁静周旋于一些托派分子和陈独秀之间。当时中国托派内部思想混乱,分歧很大,共成立有四个小组织,刘和王文元(王凡西)等人组成的“十月社”是其中之一。由于刘自视甚高,狂傲自大,总认为自己是托的唯一代言人、托派的正宗代表,就听不进不同意见,而常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别人,即使对陈独秀也是如此,因此使托派组织无法容忍,最终把他抛弃,“十月社”开除了他,他想和陈独秀合作,又遭陈拒绝。这样,他竟成了托派中一个游离于各派组织以外的孤家寡人。

1935年,他在北京被国民党宪兵三团逮捕,被当作共产党的重要干部递解南京,关押在苏州反省院,直到抗战爆发才获释。

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在武汉,后去西安,在几家国民党机构供职。据他的家属回忆:刘有心参加抗日事业,但内心仍坚持托派思想,不愿找共产党认错,又不容于托派,陈独秀不理他,他又不想跟张国焘走,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下,他认为在国统区也能实现自己的抗日要求,同时为了



50年代的刘仁静夫妇

养家糊口，就作出了去国民党机构工作的选择。但他为自己立了一条守则，即只抗日不反共。因此当他在西安战干团任教官时，战干团领导要他写出反共文章，他坚决不写，后关入禁闭室一个星期，并被解职，后去陕西教育厅任编审，直到抗战胜利。

1946年刘回到上海，给几家报刊写文章。这时与外敌的民族矛盾因抗战结束而消失了，原来被掩盖着的国共矛盾又显现出来。刘仁静顽固的托派思想重新抬头，他深信共产党的武装斗争路线不如自己发动城市工人斗争路线正确，回到了先经济复兴再革命的老路上，他竟认为中国可以依靠美援发展工业，振兴经济，从而当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并召开伪国大时，他却认为共产党应当放下武器。他根本不相信解放战争能取得胜利，当1948年人民解放军已从防御转入进攻，国民党政权面临土崩瓦解之际，他还应陶希圣之邀赴南京，陶要刘帮他搞反共宣传，刘写了一些文章，但因不符合陶的要求，没有再继续下去，而把他挂名安置在国防部领干薪，直到南京解放。

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刘在上海，他与大多数托派分子坚决不肯或不愿承认这巨大的革命现实不同，他无法否认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的铁的事实，他发现自己真的错了，开始了认真的反省，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思想斗争，几经犹豫，最后决定赴京向党认错。

刘当时的主观愿望是，他自以为与张国焘不同，也与彭述之等人不同，他虽也批判过党的路线，但都是清谈空论，没有具体行动，有错无罪，只要自己主动认错，真诚回归，应该可以见容于党，得到党的谅解，下半生还能做点工作。

1950年8月，刘到北京找了中央组织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中组部要他写出书面材料。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早在1937年斯大林已对托派定性为：“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和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并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要各国党都按此定性对待本国的托派，中国共产党就一直以此为标准，把中国托派分子包括陈独秀视为十恶不赦的死敌，是一伙汉奸、特务、反革命，“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这个认识

始终未变，这当然也是针对刘仁静的。因此对刘的来归，即使不认为他是死敌，也会认为他是心怀叵测的缴械投降之敌。

刘到北京后，想找一些熟人联系都碰了壁。据刘自己回忆：董必武明说不见；李立三辞以不在家；吴玉章稀里糊涂接见了，谈话不久，秘书就进来提醒吴，说此人不可接触；写信给廖承志，廖不答复。刘当然不敢去打扰毛主席和周总理，但一次他去参加谭平山的追悼会和周总理不期而遇，只见周迎着来宾队列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临到刘时却看也不看一眼越过他和下一个握手，使刘十分难堪。刘回想起在莫斯科最后一次和周见面时，周还亲切地和他开玩笑，而现在自己却落到如此地步，感慨不已。只有许德珩仍把他当作老同学、老朋友接待了。那时中央指定安子文和他联系，并帮他解决了一些困难。最后刘少奇出面和他谈了一次话，态度、口气之严峻，也是他没有料到的。他只记得中心意思是：你刘仁静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只能饿饭。这次谈话后，他用了刘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师。

1950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仁静的认错检讨，但加了一个措词严厉的“编者按”。该“编者按”首先全文引用了斯大林对托派的定性，同时指出：“托洛茨基——陈独秀叛徒集团既然完全堕入这种反革命立场，就不能不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被人民唾弃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残余分子在中国人民胜利以后虽然销声匿迹，但是对于他们继续进行破坏和暗害行动的可能性，仍然应当提高警惕。”接着介绍了刘仁静：“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即叛变革命，1929年还到土耳其去拜访已经叛变革命而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国后即进行托派组织活动”。并指出：“虽然他自称在1937年已被托派开除，但从那时起直到1949年他都在国民党反动组织中进行反革命活动……而他的检讨却竭力不提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把它轻描淡写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无论他说得怎样，是否确实有悔悟，仍然有待于他的行动证明。”

刘仁静当然不能同意这样的“判决”，因为

他不相信托洛茨基集团是一伙特务、间谍、杀人匪帮的断言,也不认为自己从事过反革命罪恶活动。他去找安子文争辩,但毫无结果。因为这个“编者按”显然是经过党中央认可的,它和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上对托洛茨基分子所加的注释如出一辙就可说明一切。而这也正是党对中国托派和刘仁静作出的不许辩驳的结论。刘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学会在这个结论的重压下去适应今后严酷的现实。

北师大的学生首先作出强烈反应,他们看了《人民日报》后,很快就了解到这个如此反动而又不知悔改的刘仁静正是他们的教师刘亦宇,立即群起抗议,校方不得不撤销了刘的教学任务,让他改任苏联专家的翻译。但群众同样不能容忍,实际上刘已无法再在北师大呆下去。组织部只好重做安排,先让他去淮北参加土改,回京后通过人事部安排到人民出版社工作。

刘来出版社报到时仍用刘亦宇的名字,除个别领导外,谁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知道来头不小,有人传言说,他是刘少奇、安子文介绍来的。根据他懂外语和理论的特长,分配在第三编辑室即哲学编辑室任外国哲学方面的编辑。因他年龄较大(那年他50岁),又有较丰富的学识,大家对他都很尊重,相安无事。

1952年中,三反运动开始,这本来涉及不到他。但后来社方接到上级通知,说要触动触动他。于是在部分群众骨干中公布了刘的身份,印发了有关材料,主要是那个长达一千多字的“编者按”,让大家心中有底。开始以小组会的形式对他进行“帮助”,结果一共三天开了四次会,一次比一次升级。第一次是他自己作交代,群众听后发现,他的交代及认识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相差十万八千里,于是和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刘既不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也不认同斯大林对托派的指控,

还说托派“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是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一个派别,不是反革命组织。至于后来是否发展为杀人犯、间谍匪帮,我不知道”。群众当然深信斯大林包括《联共(布)党史》和我党对托派的定性,还有《人民日报》“编者按”作出的结论,认为这些都是绝对真理,理直气壮地批驳他的“谬论”,而刘则顽固抗争,毫不退让,双方僵持不下。

第三次会议之前,社领导找他个别谈话,规劝他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进一步提高认识,说明大家无非是要你正视托派的严重罪行,承认自己确实有罪,答案本是现成的。但无论怎么启发和帮助,他就是听不进去,他坚持自己的认识,不愿顺杆爬作违心检查而得以过关。到开会时仍是我行我素,一味和大家争辩,坚不认罪。他本来不擅言辞,一生气就更讲不出话来,群众则是振振有词,逼得他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在寡不敌众的情势下,他竟站起身来,退出会场,全场为之哗然。最后一次会已从批判会升级为批斗会,参加的人数也增加了,会场气氛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群众义愤填膺,慷慨激昂,一定要他回答在托匪组织和国民党反动组织中从事过什么样的反革命罪恶活动,他则咬定自己只是写写文章而已,没有任何反革命活动,甚至说:“我回答不了,我的脑筋就是这样顽固,你们枪毙我好了!”群众

气愤之极,在一片声讨声中,刘头脑昏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竟使劲摔碎茶杯,躺倒在地大喊大叫,最后晕厥过去,会议就此中断。

刘的这种严重对抗群众运动、抗拒改造的反常行为,理所当然地激起全社人员的公愤,认为一个反动分子,气焰如此嚣张,实属罕见。人民出版社立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此事当然上报到了中央。我只听说上面好像在意料之中,传话下来说刘这个花岗岩脑袋是改不了的,随他去吧!但为



指责托洛茨基从事恐怖活动的漫画

了平息众怒,出版社最后召开了一个全社职工大会,历数刘抗拒改造的恶劣行径,然后一致通过开除他的工会会籍。这就是说,把刘清除出了工人阶级队伍,此事就这样戏剧性地收场。

第二年社方又把刘改为编外的特约翻译,也不再作为出版社的正式职工,在家译书,不用上班,工资100元数额不减,每月以预支稿费的方式付给。

刘原和他夫人两人住在出版社的东总布胡同宿舍里,我后来也正好住在这个宿舍,和他家只隔着一间房。我每天晚上都见他一个人在院子里跳绳,锻炼身体,一次要跳好几十下,这是一种相当激烈的运动,他坚持不懈,从不间断,一般像他这样年龄的人是做不到的。我很佩服他的坚毅和耐力,当时他跳绳的身影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他被改为编外人员不久,出版社又在附近居民区的遂安胡同给他找了一所住房,让他搬出了原来的宿舍,大家就很少见到他了。刘每月除按时到出版社领钱和交稿外,也很少外出,似乎在社会上已经消失,人们也逐渐把他忘却了,他有幸躲过了“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

他的唯一工作是在家里埋头译书,出版社主要让他从俄文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普氏的著作理论性强,译起来难度较大,但按他的能力完全可以胜任。开始几年,他译稿的质量较好,完成的数量也较多,后来发现他不太专心,译文质量明显下降,出版前往往要经过别人仔细加工才能达到要求,也不如期交稿,进度缓慢。社领导王子野派我去向他传话,要他改正,并顺便了解一下他的思想状况。在交谈中,我发现他有时精神恍惚、心不在焉的样子,弄不清是什么原因。他还曾一度精神失常,被送去精神病医院治疗过。现在回想,他的这种变化明显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开始的,斯大林的盖子被揭开后,他显然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思想状况极为复杂,是高兴,是怨恨,是痛心,还是无法解开的“冤苦”情结,我们无从知晓,他也从不表露,不过慢慢地他又恢复了正常。

他的译稿曾用“刘若水”的笔名出过几个单行本,后来多数收入五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他还译过法共领导人加罗蒂等人的著作,也出过单行本。

60年代上半叶,中苏大论战激烈展开。中央宣传部要求人民出版社负责组织出版一批供研究批判用的参考资料,亦即包括托洛茨基著作在内的各种有代表性的政治理论方面的反面材料。这些书即人民出版社后来用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数十种内部发行的“灰皮书”。人民出版社成立了一个国际政治编辑室专司其职,由我负责。我们同中央编译局和中央联络部等有关单位共同规划,收集资料,组织翻译,以配合党中央对苏共这场不同寻常论战的需要。在这期间,刘仁静来过社内多次,向我了解出书情况,显得相当活跃。最后他告诉我,他有托洛茨基俄文版文集,愿意提供给组织上使用。我听后大喜过望,因为我们和中央编译局正发愁找不到托氏的原著,只收集到过去公安部门在全国肃托时从一些托派分子家中查抄到的部分托著的中译本,都是解放前的老版本,还有一些英译本和法译本,从未见到过托的俄文文集,因为即使在苏联也早已找不到托的原著了。

十分可惜的是,刘交给我的托的俄文版文集已经不全了,只剩下七卷还是八卷,我记不清了。全套原来共有十多卷,但这已是十分难得了。因为这些书是托氏本人寄赠给刘仁静的,刘把它珍藏至今,经过30多年的风风雨雨,有的被人借走或拿走了,有的不知怎么丢失了,保留着的他都无偿地奉献出来,即使不全,也同样十分珍贵,这些文集使用后至今仍在中央编译局保存着。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刘仁静当然在劫难逃,革命群众决不会放过这个“大人物”。批斗、挨打、抄家成了家常便饭,把他折腾得很厉害。不过造反派认为他早已是只“死老虎”,无足轻重,对他兴趣不大,所以他人身还是自由的。1967年5、6月间,他去街上看大字报,顺手从墙上揭下了一张大字报,想带回家中仔细研究,被红卫兵发现,立即被揪到人民出版社,人社的造反派一面在院子里召开批斗大会,一面打电话告知公安部门要求将他收审。

批斗会尚未结束,市公安局就派人当场把他带走了,先押他回家拿了些东西,就把他关进了北郊的秦城监狱,一关就是六年多。最后向他宣布的罪名是两条:一是去土耳其拜访托洛茨基,二是回国后组织托派组织,宣传托派思想。刘心

中不服,认为这都不能构成被关押的理由,只是无可奈何。

1973年党的“十大”以后,据说周总理宣布了一条释放全部在押托派的最高指示。市公安局的一位领导专程去监狱找刘谈了一次话,态度十分和气,条件也很简单,只要他写一份认罪书即可出狱。刘口头答应,经过思考后又“变了卦”。据刘自己说,他最后写了一个“不及格”的东西,辜负了这位首长的一番好意,只好把他继续关押。

不过条件有所改善,转到了团河农场,给了一个小院,有生活费,还把他在上海的夫人接来同住照顾他,但他本人只能在院子里活动,不能出大门。后来又转到少年管教所,住进一个专建的院落。据说这原是认罪较好的托派分子杜畏之释放后留下来的房子,显然是为了向刘提示党的早认罪早释放的政策。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初才通知人民出版社把他接了出来,恢复了自由。就是因为不肯承认自己有罪,又被关押了五年多,一共将近12年,这时他已77岁,显得有点老态龙钟了。

刘回社以后,仍按特约翻译对待,但不必再译书。根据中组部的意见,从各方面改善了你的生活待遇,一是他的生活费从100元提高到200元;二是把他的儿子刘威立从外地调入北京,到人民出版社工作;以后又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新街口外大街给他一套四居室的新居。

以后几年,因为自包惠僧去世后,他是硕果仅存的唯一的一位中共“一大”代表,很多党史工作者和有关部门及个人都来登门拜访,向他求援,请他提供材料,写回忆录等等,纷至沓来,令他有点应接不暇,不过内心却是比较愉快的。尽管经过十年浩劫,他的智力严重衰退,思想也开始比较迟钝,但在回忆过程中,他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革命年代,昔日的峥嵘岁月又历历在目,他常常处于一种兴奋和激动的情绪中,因此他对



刘仁静去世前的最后一张全家合影

来访者都竭诚欢迎,尽自己的记忆据实相告和回答问题,对自己的经历、历史和所犯错误,也从回避,并作了一定的反思。他儿子刘威立在帮助他父亲整理资料,接待来访者,并和众多的党史工作者接触交谈的过程中,逐渐对他父亲一生的经历和思想脉络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曾把他写的有关他父亲的文章给我看过,我觉得他的认识有一定的深度,也很赞同他对他父亲整个思想发展过程的分析。他后来为中央党史研究室郑惠等同志主编的《中共“一大”代表丛书》写了30多万字的《刘仁静》一书(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比较全面、客观、真实地描述和论证了他父亲的一生。

1986年10月间,国务院参事室通知人民出版社,决定任命刘仁静为参事室参事,宣布任命时还将宴请他和他的夫人,要人民出版社派人作陪。我想这应该是中央对他作出谅解和落实政策的表示吧,虽然来得迟了一点,但对这位迭遭挫折、饱经风霜的老人来说,总是一种安慰。赴宴是我陪同刘仁静夫妇俩去的,参事室的两位领导吴庆彤和王海容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应该说,这也是30多年来他们老夫妇俩最高兴的时候了。这以后,他参加过参事室组织的几次活动。

谁知不到一年,刘仁静老人却因车祸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责任编辑 吴思)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受到共产国际的指责，作为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几乎承担了全部责任。对此，他陷入困惑、迷茫之中而不能自拔。当他获悉托洛茨基的政见与其一致时，便有意引为知音，开始进行党内反对派的活动。然而，当托洛茨基提出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的政治口号时，他便质疑问难，与之格格不入了。发展到后来，终与托洛茨基分道扬镳，成为一个左冲右突、天马行空的独行客。

困惑

1927年，中国革命走到了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距此半个月之后，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陈独秀受到瞿秋白等人的批评，并在会上作了检讨。瞿秋白曾在《多余的话》中说，中共五大时，陈独秀虽然仍当选为总书记，“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7月12日，鲍罗廷执行共产国际训令，重新成立临时中央局，陈独秀被排斥于外。他自觉难以与共产国际统一思想，难以再任党的领导工作，于是，便给中央写信辞去总书记职务。他对大革命失败的惨痛事实深自愧疚，在一封给中央的信中说：“自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同时，他又表示，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认为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推卸责任，自己充其量是只替罪羊。

他虽然已不是党的领袖，但是，仍对政治前景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当他看到左倾盲动错误将要危及党的前途时，便再也不能甘于寂寞，不闻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交往

● 张家康

不问。他给中央常委写信说：“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他多次去信中央，阐述自己的意见。然而，先是瞿秋白后是李立三，一次比一次“左”，他的意见不可能被采纳，只会作为笑柄，受到批判和奚落。他郁闷至极，感到新的中央有意排挤他这个“老头子”。

他与中央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从不服输的他，总以为真理在自己一边，甚至天真地提出将他的信件，“全部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在未经中央许可的情况下，他竟在党内自由散发给中央的信。于是，他当然地受到中央政治局的严厉批评，告诉他，“这是列宁党所不能宽恕的破坏党的行为”，警告他，必须“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今天，我们重读陈独秀给中央的意见信，重读中央对其的批驳文件，仍能体悟到他与瞿秋白、李立三等的紧张关系。作为历史的过来人，他们都已成为历史，作为历史的阅读者，我们可否假设，诚如陈独秀所要求的，“平心静气”、“详细审查”他的意见信，并“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也诚如中央所警告的，他能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规劝，那么，历史将会是另一种走向。遗憾的是，瞿秋白和李立三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一个比一个粗暴，他们决然不会听从一个“机会主义者”的絮叨。陈独秀则自以为是党的

的创始人，倚老卖老，无视党的铁的纪律，进行自由主义活动。他所表述的政治主张，又恰与托洛茨基的取消主义相吻合。于是，事情的结局便是意料之中的了。

当时，中共党内不少人，对瞿秋白、李立三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简单生硬地对待陈独秀的态度，都曾表示过不满，如王若飞、易礼容

等。瞿秋白后来也认为，“现在只能说他个人犯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陈独秀作为特殊的政治人物，就是在离开领导岗位后，仍具有一定的感召力，仍被一些人树立为反对瞿秋白的中央的一面旗帜。张国焘就曾向他建议“创造新党”，彭述之、汪泽楷、郑超麟等人自标为“陈独秀派”，怂恿他去夺瞿秋白的权。这一切都为他所不为。正如李维汉所说的，陈独秀是我党早期犯错误的领导人中的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

此时，共产国际内部出现了重大的波折，尤其是苏共内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直接影响中国革命，也极大地改变了陈独秀的政治命运和历史形象。斯大林在顺利地清除托洛茨基，并将其驱逐出境后，又无情地清除许多老一辈布尔什维克，并以至尊至高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权威，开始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他在与中共一位主要负责人谈话时，便表示即使像陈独秀这样的老同志，只要有不满的表示，便有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可能，如果这样，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李立三执行斯大林的路线，在中共党内兴起一股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旋风，首先开除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送请共产国际纠正其错误。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笔者走笔至此，十分痛心地向读者，中共的许多精英分子恰恰罹难于此时，如杨殷、何孟雄、林育南、恽代英等。李立三整治的下一个政治目标便是陈独秀了。

这时，陈独秀的外甥吴季俨由莫斯科东方大学归来，向他详细介绍了苏共党内斗争的情况，说托洛茨基是列宁的战友，是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在苏共党内很有基础；斯大林是“专政暴君”、“红色沙皇”等等。外甥还建议他读读托洛茨基的著作，会对中国革命有个全新的认识。当他正在迷茫和彷徨时，吴季俨的到来和提示，促使他尽快接触托洛茨基的观点，以化解萦绕于胸中的种种疑案和迷团。他的另一种政治经历开始了。

接 纳

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留学

生，他们的人数在150人左右。1929年1月，第一个托派组织在上海成立，全称是“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因其机关报《我们的话》，故而在后来的托派内部纷争中，又叫做“我们的话”派。陈独秀通过尹宽，从归国留学生王一平手中，读到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等文件。他在与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的讨论中，除个别问题外，基本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他特别注意到，自己多次提出的反对加入国民党，和加入后又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竟和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谋而合。托洛茨基说，共产国际“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领袖”，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最为“酷烈”，中国革命的失败是“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造成的。他总算找到了知音，顿时如释重负，浑身轻松，不无感慨地说，当共产国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机会主义’时，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



斯大林（摄于1918年）

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1929年8月,他和彭述之与“我们的话”派相商,要求加入或与他们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但是,“我们的话”派一直鄙视他为“老右”,不愿接受他们。提出:如果真心加入,必须服从一个先决条件,即承认其机会主义的错误。他愤怒了,一气之下,于9月间,与彭述之、尹宽等人自行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这个组织因其机关报《无产者》,而称为“无产者社”派。

托洛茨基极为关注他的情况,从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给中国托派和他写了22封信,其中直接谈他的信件就有17封。托洛茨基赞同“我们的话”派的先决条件,说,现在,“如果太性急地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分裂,那简直是罪恶。”对他始终坚持“工农民主专政”的立场,而不接受其“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直不快,认为与这样的人统一,“便是不可饶恕的轻率”。

可是,当他与“我们的话”派闹僵,并单独建立组织时,托洛茨基又表示担忧,唯恐刚刚兴起的中国托派运动,因内耗而衰落下去,便立即复信,欢迎陈独秀转向托派。至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为之开脱说,他在“那几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托洛茨基还在信中说,希望能读到陈独秀“纲领式的声明书”。

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是斯大林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他的错误仅仅是“忠实的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和我们都应该负责的。”这封信还鼓动全党,“毫不隐讳地站在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

托洛茨基读到这份“纲领式的声明书”,评价它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指示中国托派,“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没有的。”他甚至高兴

地说:“当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者与(革命)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青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托洛茨基还对刘仁静说:“我怕我这里的陈独秀的地址不能用。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请告诉他,读到 he 去年(1929)12月10日的信(《告全党同志书》)我非常喜欢,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统 一

陈独秀离开领导核心后,难以接受新的中央路线和策略,并欲诉诸全党公开讨论。这种天真的要求,自然遭到拒绝。恰逢此时,他惊喜地发现,托洛茨基关于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与他竟是不期然而然的相似。于是,他倾向托洛茨基便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他又是个具有独立思维的人,就在他倾向托洛茨基时,中国和苏联之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这一事件深深地挫伤了他的民族感情。而托洛茨基在这一事件中的态度,又为他们日后的政治关系设置了重重阴影,只是由于此时的他,在政治上如同弃儿,独往独来,形单影只,如今好不容易觅得知音,有了新的政治归宿,当然不愿轻易放弃。所以,矛盾也就隐而未发。

中东铁路是沙俄帝国侵略我国东北的罪证,它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它是19世纪末,清朝政府出股金500万两,由沙俄帝国政府修建经营的。早在20世纪初,中东铁路行将竣工时,陈独秀就指出,它是沙俄在东三省罪恶的起因,并向国人发出呐喊,“东三省从俄人造铁路以来,东三省的土地,还算得是中国的土地吗?”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曾经声明,中东铁路将“归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但是,到了1924年,苏联又单方面宣布,中东铁路暂由中苏“共管”,接着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托洛茨

基便是这个委员会主席。时隔五年，张学良受命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逮捕、驱逐苏联驻中东铁路人员，中苏两国酿起纷争，震惊一时的中东路事件爆发了。

中东路事件后，李立三提出“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过左口号。陈独

秀对此厌烦至极，给中央写信说，这些口号“太说教了，太超群了，也太单调了”，如果再宣传下去，是“不能够动员广大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中东路事件不久，托洛茨基便指示中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保卫苏联，对此，“一点也不怀疑。我们不仅自己要保护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护它。”陈独秀没有加入“保卫苏联”的大合唱，而是特立独行，始终保持民族独立和尊严的严正立场。

中国托派主要有四个小组织，即“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派、“十月社”派、“战斗社”派，他们在反对斯大林路线、李立三路线方面是统一的。但是，他们又各以正统自居，互相指摘、争论不休。他们对曾是他们领袖的陈独秀，也是极尽嘲讽、侮辱之能事，从不认可他的政治地位，只是由于托洛茨基的垂青和推崇，才获得一席之地。1930年5月，俄、法、德、西、比、美、奥、意等国托派，组成共产主义反对派临时国际（即第四国际前身），托洛茨基为总首领。托洛茨基对四分五裂的中国托派非常焦虑，一再催促“召集一个统一的大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中国托派各自为王，自以为是，要在这班自命不凡、资望不深的人中推出领袖人物，实在太难。托



1931年的托洛茨基

洛茨基深思熟虑，觉得唯有陈独秀尚可孚众。于是，便有意把他推到中国托派的领袖地位。1931年5月1日至3日，四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秘密召开统一大会，决定中国托派正式的统一名称，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

他虽然和托洛茨基合而为一，并曾有过默契和合作，但是，这种关系是在不协调的基础上寻找和谐，在不统一的前提下强求一致。他与托洛茨基在很多问题上，有着难以弥合的分歧，如他的“二次革命”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不和谐；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而他认为苏联已不是“工人国家”，甚至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已是“法西斯主义格柏乌政治”的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对托洛茨基不切实际的左倾口号，更是不以为然，离心离德。可是，托洛茨基却自以为深入到了他的思想精髓，对他的一些观点，采取妥协和苟且的态度。他则大不一样，与生俱来的桀骜不驯的个性，使他容不得外国团体和个人，对中国革命、中国事务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大革命时的惊世骇俗之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言犹在耳。由此论定，现在的统一，只能是暂时和表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貌合神离的统一和

联合,必然是要破产的。

抛 弃

陈独秀的中国托派总书记任了不到一年半,便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刚刚拉拉扯扯统一的中国托派又群龙无首,陷入无休无止的争争吵吵之中。托洛茨基知道后极为担忧,很快便派美籍加拿大人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来到中国。李福仁的公开身份是《密勒氏评论报》副主编和《达美晚报》编辑,秘密使命是帮助整顿中国的托派。

1935年1月,李福仁背着陈独秀,操纵中国托派,将其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重组临时中央常委会。陈独秀十分厌恶李福仁的所作所为,说:“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如果他算是国际代表,最后国际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为求得他的理解,李福仁多次提出前往监狱探视,并说这是托洛茨基的指示,可是,都遭到他的断然拒绝。

陈独秀虽然在狱中,还不时地过问中国托派的活动,间或写一些指导性的文章。但是,这样一个乱哄哄的草台班子,已经没有任何人以为他领袖。相反,他的许多顺乎国情民意的言论,却屡屡召来警告,甚至扬言要将他开除出党。8月,另一个美国托派分子伊罗生,专此去挪威奥斯陆,向托洛茨基汇报这一情况。托洛茨基非常不安,指示伊罗生,对陈独秀的批评是“大大地夸大的”,我“绝不相信”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至于开除陈独秀,那当然是“不允许的”。托洛茨基的谈话,由伊罗生记录整理成《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由美国寄给了中国托派。托洛茨基在这个谈话里说,陈独秀“是知名的,而且是业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他是国际的人物,他现在被监禁在牢内。”“我们现在正创立第四国际,以总理事会为领导国际的理论机关和咨询机关。……我认为,无疑陈独秀同志是应当加入总理事会的。不管他和中国支部有什么重要分歧。”托洛茨基还认为,“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权威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托洛茨基指示中国托派

“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党,以及整个中国统治阶级”,“无须要有丝毫的幻想”,要在“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陈独秀是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当然拒绝托洛茨基的左倾策略。但是,他对托洛茨基还是有着一一种由衷的感激之情,在与中国托派的多次无聊的争执中,他都能感受到托洛茨基的理解、宽容和关怀,托洛茨基比任何人都更为尊重他的历史地位。在前程未卜的政治流亡中,托洛茨基还时时牵挂着远在中国的他,这使他深受感动。他思忖良久,觉得有必要给托洛茨基去封信,无保留地说明中国托派已走到什么样的危险境地。他在这封信中说:

……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怀疑国民会议的口号,认为它没有阶级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国民会议是反动时代和平运动的口号,不能用为夺取政权的口号,无产阶级只有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有些人认为民族民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对国内独裁者的共同行动,都是机会主义,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究竟是谁。……

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托洛茨基很欣赏他的坦诚,在给中国托派的指示中说:“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然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本质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

陈独秀与中国其他托派分子的区别在于,始终坚持“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作为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毕生都有一颗炽热的爱国良心。出狱后,他即投身全民的抗日热潮,已无意于日见衰落的托派活动,在给《中央日报》一则启事中写道:“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当有人劝他回上海重整托派时,他明显表示出厌倦的意向,并毅然由南京往武昌,他说:“这次抗战是一个革命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世界也应当帮助中国。”并郑重宣布:“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他与托洛茨基的另一重大分歧,是在对苏联的评价上。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或者是“蜕化的工人国家”。早在1936年,莫斯科大审判时,陈独秀就认为苏联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国家了。1939年8月,苏德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他刺激最大,他更坚定自己的认识,指出苏联已“实际站在希特勒方面”,在文章和讲话中已将德俄并称为,“法西斯主义及格柏乌政治”。他对托洛茨基一再强调的“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的口号,已完全失望,认为如若这样,“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他是“始终赞成联合英美向纳粹进攻”。历史已经证实,他的这一观点与托洛茨基相比,不乏真知灼见,也正是在这点上,他对托洛茨基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托洛茨基和他从来未谋面,而且,他们中间“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但是,托洛茨基一直将他视为老朋友,愿意“能够同他经常合作”。托洛茨基根据莫斯科的经历,担忧他的人身安全。1937年8月至1939年2月,托洛茨基多次指示李福仁,第二次国共合作一当实现,斯大林和蒋介石“将杀死陈独秀”,所以,要在中国发起一个“护陈运动”。至于陈独秀的歧见和悖论,托洛茨基指示,“不应该通过非常鲁莽与非常严厉的手段”与之决裂。托洛茨基一再表示,“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杀他。……他应该到美国去。”“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耐人寻味的是,陈



陈独秀

独秀没有死于非命,托洛茨基却难逃厄运,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遭到暗杀。

此时,陈独秀已全然否定托洛茨基,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现在应“重新估定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他便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一种政治思想接受的快,抛弃的也快。对此,他有过惊人的论述,“自来之论,喜根据历史现在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故而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他”,对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亦然”。

再别老托,他欣然高兴地说:“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他沾沾自喜地戴上“终身反对派”的帽子,抛弃了他所信奉和推行的一切主义,又回归到新文化运动的原点,再次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可是,结局又如何呢?他曾无可奈何地哀叹道:“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真所谓情到不堪回首处,一齐分付予东风。

(责任编辑 吴思)

中国留苏学生反斯大林游行事件

● 吴晓

1927年11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节10周年游行时,在红场上发生了一桩反斯大林事件:参加游行的中国留学生和一部分苏联群众,经过检阅台时,突然从衣袋里掏出布旗挥舞,呼喊反对斯大林的口号,顿时,全场混乱,不同观点者相互斗殴,大打出手——令站在主席台上检阅的斯大林及联共共产国际领导人感到十分震惊!

参加红场反对斯大林游行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的学生。那么,中国学生为何反对斯大林?这事虽已过去76年,但今天的读者尤其年轻的读者,未必了解事件的真相。

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

东方大学,是斯大林亲自命名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简称。它是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根据列宁“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精神,为东方和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培养训练革命干部,于1921年4月创办的。1920年陈独秀、李大钊筹组中国共产党后,曾派出第一批革命青年罗亦农、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彭述之、汪寿华等赴苏到东方大学学习。凡进东方大学的学生,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中山大学则是国共合作的产物。1923年国共合作后,苏联政府为国民党培养训练干部,1924年在广州帮助创办了黄埔军校,但由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迅速,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东方大学培养的干部,远远不能适应需要。为此,苏联政府又决定在莫斯科再创办一个专门训练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正在筹办之时,孙中山不幸于1925年3月逝世。为纪念孙中山该校取名为“中山大学”。经过国共两党严格的挑选和考试,中山大学第一期录取了340名学生,到1927年,在校学生达500余名。学生中不少是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子女和亲戚。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李宗仁妻子魏淑英等。这样国内出现了一股不小的留苏学潮。当年邓小平从法国到莫斯科入的也是中山大学,与蒋经国同一个共青团小组。学生中设有共产党支部局和国民党支部局,国民党党员约占一半多点。但当时国共两党实行的是国民党党内合作,共产党员可以跨党加入国民党。所以,国民党支部局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

中山大学坐落在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1925年秋开学时,托洛茨基主持开学典礼。他在讲话中,针对沙皇俄国以来俄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偏见,说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话:“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不论他是一个同志或者一位公民,他如果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留学生,见面时双肩

一耸,那他就不配当俄国共产党人或者说苏维埃埃公民。”托洛茨基这段讲话,加之他那时在苏联国内及国际上远比斯大林的威望高,使他在中国留学生中留下了十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同时,托洛茨基还任命其亲信拉狄克为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

大革命失败引发事端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倒在血泊之中。继而,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又发动了清共运动,一片白色恐怖。这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了。

4月14日,当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苏联群众和中国留学生感到万分震惊,尤其中国留学生对蒋介石无比愤慨。就连在中山大学学习的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无法容忍父亲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并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表示与他划清界限,宣称:“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是我的敌人。”

中国革命形势的逆转,不仅中国留学生感到痛心,心情沮丧,陷于绝境,而且苏联广大群众的思想也发生混乱,许多人认为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预言和警告是正确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斯大林和联共、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所导致的。这样,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及其失败,开始严重地影响苏联两派斗争的进程,而且明显有利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越来越被动。两派斗争,由口头辩论发展到暴力斗殴。有一次,列宁格勒几个老布尔什维克,借中国发生清共事件,摆老资格,开会痛斥斯大林无能,结果被定时炸弹炸伤。



流亡海外的托洛茨基

这样,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也卷进了苏联两派斗争旋涡之中。尤其是那些在国内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饱受革命失败痛苦的磨难,亲眼目睹无数战友倒在血泊之中的大批新来的学生,他们从苏联党的斗争中发现:他们在国内执行的路线,完全来自斯大林。“无论鲍罗廷、陈独秀或印度人罗易,都不过是政策的执行者。”真正的决策者乃是俄共中央,是斯大林。于是,中山大学以及东方大学的一些中国学生对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尤其撤销了托洛茨基共产国际执委的职务产生反感。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转向托派,有的甚至加入了苏联托派组织。就连蒋介石儿子蒋经国也毫无顾忌地站在托派一边,参加辩论。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在演讲台上露面,由于每个演讲者只准讲5分钟,所以他总是像机关枪一样,一边讲,一边飞快地翻书,及时找到适当的引文,然后再讲。大家称他是个“出色有条理的演讲者”。同时,他还写了许多尖锐有力的短文章,贴在墙报上,公开拥护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蒋经国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碰巧我的观点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于是许多人认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实上,他们的臆测是正确的。我开始与几个中国

同学研读托洛茨基学派的秘密著作,对于托洛茨基要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尤感兴趣。后来越来越热衷托洛茨基学说,终至加入秘密学社。跟我的同学日多,并开始视我为托派的领导者。”他又说:“苏联当局和联共早已以严厉手段箝制托派。我的一些同学已经被捕。校方为平息学潮邀请斯大林来校演讲‘托派的错误’,这是我们首次见到斯大林。然而我不为所动,坚持我的政治观点,并继续反抗斯大林政权的活动。”

联共中央和斯大林一面批驳反对派,一面继续采取组织措施,于1927年10

月，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在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节时，发生了反斯大林游行。

红场反斯大林游行突然爆发

十月革命节这天，莫斯科红场上红旗招展，人海如潮。斯大林及苏联党政军、共产国际领导人和应邀前来的世界各地的重要贵宾及各国革命领导人，站在列宁墓的主席台上，检阅盛大的游行队伍。中午时分，中国留学生的队伍一走进红场，斯大林等人就向他们招手。同时，扩音器里传来了：“中国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向中国人民致敬！”、“坚决支持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万岁！”……主席台上和红场上震天动地地响应：“呜啦！呜啦！”中国留学生的队伍越走近检阅台，气氛就越热烈，叫喊声也越发高昂，使许多在国内饱受磨难的年轻革命者热泪盈眶。一位刚来莫斯科的学生谈当时的感受时说：“前前后后的红旗挥动着，形成了火海。四周围的人，列宁墓上的，墓房两侧贵宾台上的，面向宫墙，层层叠叠排列在行进队伍之另一边的，上千上万的人，挥舞着帽子或者旗帜，对我们欢呼出庆祝中国革命的口号。人们仿佛奔向我们，要举高我们，要紧紧地拥抱我们。处在这种情景中，任谁都要被感动得掉下泪来的。我们何幸而生为中国人？何幸而成为中国革命者？更何幸而遭遇到已经胜利了十年的俄国的兄弟们呀？这种欢呼一直送我们走过了红场。”

但是，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另一件事：

中山大学的游行队伍走到红场入口处时，队伍里的苏联学生突然从口袋里掏出布旗挥舞，呼喊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一挑衅，当即引起拥护联共领导的其他游行学生的反击，于是双方发生斗殴。中山大学新调来的教列宁主义课程的马达格洛夫教授，在这场混战中遭殴打，鼻孔流血，满脸青紫。就这样，一边打，游行队伍还不停顿地继续前进。走过主席台时，在上面的斯大林等领导人，虽然看到了在他们面前发生的斗殴场面，但没有也不便有所表示，而当他们看到中国留学生游行队伍时仍振作精神，举手高喊支持中国革命的口号：“革命的中国青年万



斯大林

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学生则用俄语高呼：“呜啦！斯大林！”

然而，就在这时，另一部分中国留学生，也突然打开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子，并高呼口号，支持队伍前面被围攻的俄国学生。他们拚命大声呼喊，比俄国学生喊得更响。中国留学生公开造反完全出人意料，使主席台上的斯大林及联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感到震惊；当着许多来自世界各地重要来宾和革命领导人的面，发生这种事，使斯大林大失体面。

这是联共党史上的严重事件，加剧了联共党内反对托派的斗争，使斗争很快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事件发生一周以后，即11月14日，斯大林召开联共中央及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特殊会议，作出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党籍的决议。第三天，曾在1923年1月代表苏俄政府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宣言的越飞，因同情托洛茨基而悲愤地开枪自杀，成为死于苏联反托运动中的第一个上层人物。12月联共的十五大，批准了开除托、季的决定，同时开除75名托派骨干分子。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到苏联东南边疆

城市阿拉木图。苏联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托派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

中国学生惨遭迫害与打击

参加红场事件的中国留学生,也遭到了残酷的打击,都被开除党籍和团籍,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被流放西伯利亚。少数人如陈琪、闻岳留校当了一段时间的“反面教员”,然后充军到南俄靠近伊朗边界的地方服苦役,后两人想乘机逃入伊朗,结果一人被国境卫兵当场击毙,另一人押解回来投入监狱。在这些被打击、被迫害的人中,蒋经国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中国新统治者蒋介石的儿子,受到特殊的处置。蒋经国在回忆录中说:“当时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认为我回国比留在莫斯科对他们威胁更大。1927年4月我从中山大学毕业,同一群毕业同学要求回中国,却未得到他们允许。中共说:‘让蒋经国回国,他一定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们要他留在苏联。’”他又说:“我的政治活动却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密监视。”即使他1928年声明与托洛茨基组织断绝关系,但王明仍不放过他,后又指控他组织“江浙同乡会”的反革命团体。为此,王明要求苏联政府逮捕蒋经国,但斯大林要把蒋经国当作与中国统治者打交道的棋子与人质,没有同意王明的提议,而是让他到基层去“锻炼”。直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蒋经国才被允许回国。

被苏联政府遣送回国的这批人,出国前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梁干乔是广东人,入党后曾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在东江地区打过土豪,大革命时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然后赴苏留学。史唐是浙江诸暨人,大革命时是上海中共中央的机要秘书。宋逢春是河北景县人,出国前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做机关报《政治生活》的发行人。他们回国时,中共党内正处于大革命及各地武装起事失败后的混乱状态。因此,他们中有的继续混在党内,并被中央委派工作,但暗地里则互相联络,酝酿成立托派组织;有的遭国民党逮捕,同时,斯大林及其联共领导人也希望借中国反动派之手,消灭这些异己。

总之,红场上的反斯大林游行发生于1927

年11月,在此之前,1927年4月,国民党进行清共,然后在7月26日正式发表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与该校断绝一切关系,声称:“莫斯科中山大学非法使用国民党领袖名义作掩护,从事策划反对本党的阴谋活动。为此理当取缔,著各级组织都不得再派学生去莫斯科。”这样,非但国民党各级组织停止送学生去莫斯科,就是在校的国民党学生,除少数人转向共产党之外,也纷纷回国。这些人回国后,成立了“留俄同学会”,多数人成为极端反苏反共的急先锋。苏联共产党用卢布和面包培养训练了这样一批中国人,实非初衷,也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共产党选派的学生,非但不能回国,由于南京、武汉的国民党屠杀、追捕、通缉共产党员、亲共分子,因此大革命失败后,由组织安排,纷纷逃亡来到莫斯科,也都安排进了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成为政治避难式的留学生,使这两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达到六七百人。这些新生与旧生,很快卷入了联共党内正在激烈进行的论战旋涡,并且发生分裂,红场反斯大林游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责任编辑 吴思)

中央文史研究馆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主办

欢迎订阅《世纪》

全国各地邮局征订 邮发代号4—557



文史综合性双月刊
《世纪》凭借全国文史研究馆系统文史人才荟萃的优势,努力开掘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以第一手资料披露中国百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内幕,介绍历史风云人物的传奇经历和趣闻轶事,深受知识界人士,尤其是中老年知识分子的喜爱。

《世纪》采用国际标准大16开64面,逢单月出版,2003年、2004年定价为5元,全年6期,订价30元。敬请到您当地邮局订阅。如订阅不便或错过邮订时间,本刊发行部随时为您办理补订和邮购(平邮不另收邮费)。欢迎来函免费索阅,务请写清通讯地址、邮编及收件人姓名,并附1元邮资,本刊即可寄赠一期杂志请您试读。

社址:上海市复兴中路529号《世纪》杂志社
邮编:200025 电话:(021)64740822 64675768

罗荣桓纠正 湖西“肃托”冤案

● 黄栋法

四围敌垒不闻鸡，雪拥南阳急马蹄。

惠及死人肉白骨，至今歌颂满湖西。

这首诗，是曾于抗日战争在山东微山湖地区工作的郭影秋所作，怀念罗荣桓以快刀斩乱麻的工作作风，纠正湖西“肃托”冤案，救出了500多名干部。

1939年10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正率领一些参谋人员和两个连队由鲁中向鲁南转移。这时，罗荣桓接到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及苏鲁豫支队彭明志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微山）湖西地区的苏鲁豫区党委正在搞“肃托”，杀了许多人，连苏鲁豫支队的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也被当作“托匪”抓了起来。电报还说，主持这项工作的是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王凤鸣。罗荣桓读到电报后，大吃一惊，立即和陈光召集一些领导同志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研究后决定立即打电报给王凤鸣，命令他立即停止捕人杀人，打电报给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朱涤新，叫他就近到湖西，向王凤鸣当面传达师部的指示，决定罗荣桓会同将去延安的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分局统战部长郭子化、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一道，去湖西处理该事件。

所谓“肃托”，就是肃清托派。托派，原来是苏联共产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30年代，苏联曾开展大规模的反托斗争，将许多人当作托派杀掉。在中国，陈独秀等人曾在1931年

5月成立托派“中央”，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活动。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托派组织即发生分化。抗战时期，托派已没有统一的组织。可是，王明和康生于1937年11月回国后，却照搬苏联模式，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8月，康生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其恶劣影响波及到全党。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懂得托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间接地受到康生的影响，把“托派”这个词当成“汉奸”，或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AB团”、“改组派”来理解。

1939年8月，湖西地区突然掀起了“肃托”的狂风恶浪。湖西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教员魏定远为“托匪”。在王须仁残酷的肉刑之下，魏定远招认自己是“托派”成员，并且还供出了第一批“托派”成员名单。

王须仁的“肃托”行动得到了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的支持。二王又挟持苏鲁豫区党委书记同意他们一起行动。他们刑讯逼供、诱供、串供，然后再根据口供抓人。如此恶性循环，“托派”越“肃”越多。不到两个月，被关押的党员、干部有苏鲁豫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等好几百人。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300多人被无辜杀害。二

王肆无忌惮,草菅人命。他们不仅不向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汇报,而且还向冀鲁豫支队杨得志拍电报,说该支队活动的鲁西南地区党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杨将他们逮捕后送到湖西去交给他们处理。杨得志赶紧向上级作了汇报,同时回电严词拒绝了二王的无理要求。不久,杨得志率部经过湖西,当面责问王凤鸣:“你们抓人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而王凤鸣置若罔闻。事后,杨得志将情况向一一五师作了汇报。

苏鲁豫支队长彭明志得知梁兴初等人被扣押,就从陇海路南赶到湖西,想制止王凤鸣的胡作非为。王凤鸣不但不听劝说,反而想抓彭明志。彭明志已知自己无法扭转这种险恶局面,只得设法脱身并打电报将情况告诉罗荣桓和陈光。

罗荣桓制止乱抓乱杀的电报很快传到了湖西。王凤鸣慌了手脚。他赶紧派侦察科长到湖西侦察敌情,以便向罗荣桓汇报,同时又伙同王须仁继续编造口供,抓人杀人,企图让罗荣桓承认他们造成的既成事实。

“肃托”还在蔓延。那位去湖东的侦察科长回来,也被投进了牢房。他给牢房里的蒙难者带来了好消息:“罗政委要来了!”蒙难者们欣喜之余,急切地盼望着:罗政委,你快来吧!

雪花飘飘,寒风习习。南阳湖结着薄冰,平原披上白衣,好像在为被杀害的烈士带着重孝。罗荣桓心如火焚,率领干部、战士,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向微山湖西的单县飞驰。

罗荣桓带领一行人马赶到湖西四大队所在地后,随即派朱涤新去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前来汇报。同时把自己带来的干部分为两组,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以调查事件真相。

王凤鸣走进罗荣桓的屋子,赶紧向罗荣桓敬礼,同时忐忑不安地观察对方反应。他发现罗荣桓没有向他还礼,罗荣桓皱着眉头,眼镜后面射出愤怒的目光。

平时非常有耐心的罗荣桓,这时打断了王凤鸣那些漏洞百出的汇报,严厉

地问:“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硬着头皮,强词夺理地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进一步追问。

王凤鸣举了举手里的材料:“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来的?你打人没有?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罗荣桓一阵连珠炮式的发问。

王凤鸣实在招架不住,只得吞吞吐吐地承认自己对梁兴初等人用了刑罚。

“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证据!如果别人的历史你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负了十几处伤,怎么会成为反革命?!”

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拍案而起:“你抓



罗荣桓(摄于1943年)

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

专横跋扈的王凤鸣终于瘫软在椅子上。

这时,进来一个警卫员:“报告首长!大队长带来了。”

进门来的是一位个头细高、面容憔悴的汉子。他穿着灰旧的棉衣,袖子上的“八路”臂章已被扯掉。他就是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他刚从牢房出来,因而对外面的变化一点也不知道。他一看见罗荣桓,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眼泪汪汪地哭叫道:“罗政委!救命呀!救命呀!”

罗荣桓赶紧搀扶梁兴初坐在椅子上,仔细察看了他的刑伤,愤慨地说:“这简直是犯罪!”接着问了梁兴初一些情况,勉励梁兴初振作精神,好好工作。

梁兴初走后不久,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被带去见了他从未见过面的罗荣桓。罗荣桓询问了郭影秋一些情况后,决定立即释放他。郭影秋当时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流泪。郭影秋事后回忆道:“罗荣桓同志再晚来四个小时,我和李乾贞、郝中士、梁兴初几位同志,就被拉出枪毙了。罗荣桓同志到了湖西后,所谓‘肃托’斗争才被制止。”

紧接着,罗荣桓还与张经武、郭洪涛等去牢房看望了李乾贞。李乾贞是最早建立湖西抗日武装的领导人。他受了重刑,躺着不能动弹。罗荣桓亲切地安慰他之后,马上叫人把他抬到卫生队治疗。李乾贞被这突如其来的拯救,感动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像春潮冲破冰封,像光明突破黑夜,几百名“囚犯”一下子获得了自由。

两天后,罗荣桓主持召开了平反大会。在会上,罗荣桓面对那一双双热泪盈眶的眼睛,大声说道:“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向你们慰问!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

会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有人用手绢擦着眼泪,有人开始低声哭泣。

“现在,我向你们正式宣布,所有被关押的人,不管有没有问题,一律释放!从现在起,你们

自由了!”

掌声过后,是一片哭声。哭声越来越大。这哭声,是对党的感激,是对死者的哀痛,是对刽子手的控诉。罗荣桓的眼睛也湿润了。他激动地说:“这不仅是哪一位同志的不幸,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又一次惨痛的教训。这是我们党的严重损失!”他沉痛地指出,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山东八路军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加倍努力工作,尽快挽回损失,推动党领导的山东抗日革命事业的发展。

湖西“肃托”冤案被纠正后不久,凶手王须仁畏罪自杀,王凤鸣则乘对他看管不严之机,逃跑投敌。王凤鸣逃跑后,罗荣桓向党中央打报告请求处分自己,并且在一一五师一次政工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

1963年冬天,罗荣桓与世长辞。郭影秋挥毫写下了四句悼诗:

沂蒙寇急震人心,亿万心连百战身。

昨日人经苏鲁皖,四山风雨哭将军。

(责任编辑 吴思)

订份 《文史春秋》杂志 知识越丰富 追求越迫切 兴趣越浓 风情越醇

主要栏目

- 军旅春秋 ●史海钩沉
- 名人写真 ●往事追忆
- 民国春秋 ●人物春秋
- 将星闪烁 ●本刊特稿

2004年继续举办有奖
 订阅活动,每位订读者均有
 机会中奖,到越南的首都河
 内以及联合国自然文化遗
 产著名景点下龙湾等地享
 受越南风情游乐趣(名额
 10名)。读者只需于2004
 年8月31日前将1-8
 期《文史春秋》杂志的总
 花(复印无缝)寄回杂志社
 即可参加抽奖。

《文史春秋》杂志是纪实性文
 史综合月刊,重点选编中国和广西
 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
 物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内幕秘闻
 披露,历史见证,海内外名人成功
 之路,传统文明新角度发掘,珍贵
 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军警谍史料和
 社会百态等纪实性文章,知识性,
 可读性强。内容丰富,特色突出,权
 威可靠,具体生动,图文并茂。荣获
 第四届广西优秀社科期刊称号。

邮发代号:48-93 定价:4元 全年价:48元 电话:0771-2836920

邮编:530021 社址:广西南宁市桃源路3号

一代报人成舍我

● 傅国涌

结束了长达 8 年零 3 个月的厄运 ,1945 年 11 月 20 日 ,《世界日报》、《世界晚报》终于在北平原地复刊 ,当天成舍我发表《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长文 ,深情地回顾了《世界日报》和他本人的办报经历 :

“我们真不幸 ,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在艰苦奋斗中 ,万千同样的报人中 ,单就我自己说 ,三十多年的报人生活 ,本身坐牢不下二十次 ,报馆封门也不下十余次。……世界日报的生命中断 ,一个纯粹的民营的报纸 ,竟如此牺牲。实则此种艰辛险恶的遭遇 ,在这一时代的中国报业 ,也可算司空见惯 ,极其平凡。做一个报人 ,不能依循轨范 ,求本身正常的发展。人与报均朝不保夕 ,未知命在何时 ,我们真不幸 ,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

“但从另一角度看 ,我们也真太幸运了 ,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过去凡是我们所反对的 ,几无一不彻底消灭。这不是我们若干报人的力量 ,而是我们忠诚笃实反映舆论的结果。……打倒我们的 ,只有我们自己 ;只有我们自己 ,变成了时代和民众的渣滓。我们向正义之路前进 ,我们有无限的光明。我们太幸运 ,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

成舍我是大时代的产儿 ,正当五四浪潮澎湃之际 ,他白天在北大国文系听课 ,晚上在《益世报》当编辑、主笔 ,经常以“舍我”的笔名发表社论。1919 年 5 月 23 日 ,他发表《安福与强盗》社论 ,直指权势炙手可热的安福系所作所为 ,“哪一件不是鬼鬼祟祟祸国殃民的勾当”。同一天还登载了山东军人“痛外交失败”的通电 ,《益世报》被停刊五天 ,总编辑潘蕴巢被捕 ,报纸的发行量

却因此大增 ,成舍我也没有被解职 ,反而代行总编辑职。因为家境贫寒 ,他十四五岁就外出谋生 ,在沈阳、大连等地的报馆当过校对(1912-1913 年) ,18 岁到上海《民国日报》当校对、助理编辑(1915 年) ,结识了陈独秀、李剑农、李大钊等知识分子。1917 年 ,他只身来到北京 ,得到陈独秀等的照顾 ,得以进北大读书 ,“东斋吃饭 ,西斋洗脸”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1920 年 ,他在北大成立“新知编译社” ,翻译出版外文名著。1921 年初 ,他发起“北京大学新知书社” ,公开招股 ,从蔡元培到稍有资力的同学都被拉入股 ,当年冬天 ,他办了四开小报《真报》 ,这是他办的第一份报纸 ,没能办下去。1922 年春 ,他进北京师范学校任教 ,不久回《益世报》当总编辑 ,1923 年秋进北京联合通讯社任编辑 ,第二年就接手主持社务。这是他独立办报之前的经历 ,为以后登上报业大舞台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因采访关系他认识了不少议员 ,1924 年 ,他当上众议院一等秘书、教育部秘书及华威银行监理官 ,都是拿干薪的兼职。这个长期陷于困境的书生眼前似乎一片光明 ,也许他完全可以循着这条道路往上爬 ,做一个脑满肠肥的政客、官僚 ,但他选择了另一条路。

二

1924 年 4 月 ,成舍我以 200 元独自创办《世界晚报》 ,一年以后(1925 年 5 月) ,又创办《世界日报》 ,10 月 ,《世界画报》出世。在短短一年半时间 ,“三个世界”诞生了 ,除了 1928 年至 1929 年间 ,他做过北平大学区秘书长 ,他几乎把一生都献给了报业。“三个世界”形成了中国第一个稍有规模的报系 ,被称为“世界报系” ,加上他后来在南京办《民生报》 ,在上海办《立报》等 ,这个一无资金 ,二无背景 ,无党无派、白手起

家的一代报人无疑创造了一个奇迹,以他独特的个人和持续的努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报业史。

从编辑采访、新闻评论到新闻教育,他都很有一套,张友鸾说甚至可以成为“成舍我体系”,不足的是他始终搞不好印刷。除了吟诗填词、昆曲,他无嗜好,不讲究享受,发达以后还是如此。他常穿一双大皮鞋,报社中人习惯称他为“大皮鞋”。从“三个世界”到《民生报》、《立报》,到香港《立报》、重庆《世界日报》,“大皮鞋”几乎踏遍了南北。张友鸾晚年回忆说,他生活上很像个清教徒。尽管他的刻薄也是有名的,却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奇迹般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编辑、记者。他在北平、桂林等地先后办过新闻专科学校,他知人善任,不拘一格重用人才,张友鸾当《世界日报》总编辑只有22岁,当时还在平民大学新闻系学习。萨空了南下当《立报》总编辑也不过29岁。还有诸如身为参政员的他坐在参政会会场勾错字,这些都成了报业史上遥远的逸闻、佳话。

为了他的报纸,成舍我曾多次被捕,封门、停刊不下十余次。1925年11月29日,《世界日报》发表《昨日十万民众对段政府大示威》的新闻,成舍我发表署名社评《哀段君祺瑞》。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第二天,《世界日报》即发表署名“舍我”的社评《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提出段政府引咎辞职、惩办凶手、优恤死难者三项要求。“世界”报系连日发表文章谴责段政府,以大量篇幅刊登新闻和死难者照片,画报和副刊都出版专刊。当段政府通缉李大钊等,当京师地方检察厅确认段祺瑞卫队有杀人罪时,日、晚报都发表社评,严厉谴责。段政府的财政总长仗着曾资助3000元开办《世界日报》,向他发出警告,没想到他竟不买账,义正词

严地予以拒绝。1925年北京政府以“宣传费”名义给全国125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他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名列“最要者”,每月可得津贴200元。但他并不因为接受了“津贴”就放弃对当权者的批评。4月26日,著名报人、《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公开杀害,第二天,《世界日报》就以《邵飘萍以身殉报》的大字标题作了报道。8月6日,另一位著名报人、《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又被军阀张宗昌公开枪杀,北京新闻界黑云压城。第二天(8月7日)夜间,成舍我被捕,“并宣布处死”。如果不是有恩于张宗昌的前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奔走力救,成舍我将会步邵、林的后尘,所以他在《世界日报》刊登启事:“平此次被捕,情势危急。……承各方师友竭力营救,再生之德,没齿难忘。”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长留在他的记忆中,事隔四年,在游历欧美的途中,辽阔的太平洋上,这位参加过“南社”却很少写诗的报人还写下了“崎岖历尽归平淡”、“且喜半生逃百死”这样的诗句。

1927年4月18日,也就是“国民政府”正式成立的同一天,成舍我在南京创办了《民生报》。1934年5月,因为报道行政院政务处长、他的亲戚彭学沛贪污舞弊的新闻(已被新闻检查机构删扣,结果仍然发表),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行政院长汪精卫大怒,罚令停刊三天,《民生报》复刊时竟然发表社论说明被罚经过,指责当局非法摧残舆论,声言将依法抗争。彭学沛向法院控告他妨碍名誉,6月18日开庭,成舍我当庭答辩,把指控驳得体无完肤,并在报上公开发表亲书的万言答辩书,轰动一时。彭虽然不敢出庭,并以撤诉了事,但怀恨在心。7月23日,因



成舍我一生中创办的报纸

《民生报》发表来源于民族社的《蒋电汪、于勿走极端》一则消息,成舍我被捕,和陈云阁等人一起被关押了40天,《民生报》被封闭。

9月1日,他获释出来即说:“只要汪精卫一天在南京,《民生报》就一天不复刊。”唐有壬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他坚决地回答:“‘我的见解完全与你相反,我有四大理由,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此四大理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新闻记者可以坚守自己主张,保持自己人格;做官则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败名裂。”最后的结局是——“民生报永久停刊”,成舍我“不许再在南京用其他名义办报”,“不得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的文字”。

1929年12月31日,《世界日报》一段“某要人谈时局”的报道得罪了已接管华北、炙手可热的阎锡山,遭停刊12天的处罚。1930年1月13日复刊时,发表张恨水执笔的《本报复刊的意义》,语虽委婉,实多愤慨。

1933年5月10日,《世界日报》公开报道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内幕,引起蓝衣社头子刘健群恼怒,命令宪兵逮捕成舍我,经人说情,才免遭毒手。

1935年《立报》创刊,因全程跟踪报道帮会头子顾竹轩杀人案,受到黑社会威胁,他说:“在上海滩办报,要站住脚,必须战胜这帮流氓,决不能退让。”

据先后做过三报(《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总编辑的张友鸾和老报人左笑鸿等回忆,成舍我常对编辑记者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負責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这些话代表了成舍我一生对新闻自由的追求。《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一文回首当年,感慨无比,“当时张宗昌杀人不眨眼,那威风,真可使人股。然而没有几年,我却在中山公园,时时看见他闷坐来今雨轩,搔首无聊。他屡想和我攀谈,我只是报以微笑。”“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以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

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他“仅是万千报人中的一个”,亲历了那一时代的“不幸”和“幸”。

三

对于报纸,成舍我有许多自己的见解。1920年4月,他即在《时事新报》发表文章说:“舆论家是要往前进的,不可随后走的。他是要秉公理的,不可存党见的。他是要顾道德的,不可以攻阴私的。他是要据事实的,不可以臆想的。他是要主知识的,不可以尚意气的。”1921年,他在《新人》杂志发表《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今后大规模的文化运动》一文,认为“文化运动最大的武器,就是报馆。”他后来以办报为业在他思想深处可以找到源头。

1925年《世界日报》初创,他在发刊词中提出——不党不偏,不受津贴(实际上接受了北洋政府六机关的津贴),言论公正,不畏强暴,替老百姓说话,作民众喉舌。同时提出“以国民意见为意见”,“以超党派立场争取全民福利”等。对政党,他一贯持超脱和无所偏倚的态度。他和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有很深的交情,但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他和李石曾等许多国民党大佬有私交,但对国民党始终保持超脱的态度,经常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抗战爆发,他发表文章呼吁“国民党应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公开政权,建立国民联合政府”,“对中共采取较宽容政策”等。抗战期间,他成为国民参政员,一度还是陈诚的驻港代表,但他始终没有加入过国民党。香港沦陷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和军方的《扫荡报》都想拉他去接办,在这个问题上他考虑得很审慎,也确实有保留,不愿轻易“下水”,最后拒绝拉拢和诱惑,始终未进官报乃是事实。“超党派”是他始终如一的办报立场,三个“世界”如此,《民生报》如此,1935年他在创办《立报》时“绝不招本份官股,绝不请一文津贴”,并表示:“说大家要说的话,决无任何背景,及为金钱势力所左右”。1945年他在重庆办的《世界日报》也是无党无派的私营报纸,这条底线他是守住了。

《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在北平复刊,他

发表《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长文,自我定位是“站在国民立场,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认为只有“真正超然”、“代表最大多数人民说话的报纸,能充分发挥舆论权威”、“我们认为‘超然’的可贵,就因他能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而无任何党派私怨,加以障害。”在最后的几年中,《世界日报》坚守了这样的立场。

从1925年到1935年,张友渔在《世界日报》前后工作了十年,成舍我明知他是共产党员,还让他写社论,任凭他把一些倾向“左”的社论发表出去。还让他担任“社会科学副刊”主编,发表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甚至1932年张的身份暴露后,还派张到日本,作为《世界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1933年风头过了,又让张回北京,任总主笔。这样的例子不是孤立的,萨空了在桂林被国民党特务拘捕,他曾积极营救。

1930年,他曾出国考察欧美各国新闻事业,历时近一年,对西方的新闻自由无比向往,“符离街(英报馆集中地)支配唐宁街(英首相府所在地),在词典上无‘言论自由’之吾辈中国记者观之,自不能不悠然神往耳。”回国之后他在北京报界公会举行的欢迎会上报告世界新闻概况,认为欧美新闻事业发达的原因之一是“言论有保障”,主张报纸的言论完全听民意的支配。此行对他经营新闻事业影响很大,更坚定了他组织报业托拉斯,做真正有权威的“无冕之王”思想。他的口号是“资本家出钱,专门家办报,老百姓讲话。”做报业托拉斯巨子是他多年的梦想,抗战时期,他在重庆组织“中国新闻公司”,以“提倡民主建设,独立经营新闻事业”相标榜,雄心勃勃,要在全国东、南、西、北、中办十家大报,都以“世



成舍我在台湾的晚年时期

界日报”命名,还要开办专用通讯社、新闻研究中心和定期新闻研究刊物、新闻画报等,虽然最后都没有成功,但他对新闻事业的深情和执着从来都没有改变。

四

成舍我一生的新闻事业,最重要的是北京的《世界日报》,包括以“世界”命名的日、晚、画三报,前后历时17年。

从1924年到1927年是“三个世界”的初创时期,筚路蓝缕,备历艰辛,因批评军阀政府,成舍我几遭杀身之祸。张恨水的连载小说《荆棘山河》、《金粉世家》等为“世界”

报系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1928年到1931年是它的发展时期,把教育新闻作为生命线,受到知识界的欢迎,迅速成为北平发行量最大的报纸。1928年,国民党定鼎南京之后将北京九所高校合并为中华大学,师生一致反对,成舍我身为北平大学区秘书长,他主持的《世界日报》不仅如实予以报道,而且发表了不少教授、学者的反对言论,这样的《世界日报》当然声誉鹊起。

1931年到1937年是其鼎盛时期,主张抗日,反对不抵抗政策,抨击国民党政府乃至“国联”,倡议政治安内、武力对外,反对内战。1935年1月起,《世界日报》开辟了“学人访问记”专栏,两年半中,记者贺逸文先后访问了56位有成就的各方面学者,发表了70万字,对学界影响很大。“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天,《世界日报》即在要闻版刊登“平市治安无虞,禁止集会游行举动,昨日军警特别戒备”的新闻。教育版则出现大片空白,一连几天都是如此。《世界画报》刊出学生与军警搏斗的照片,并以隐蔽曲折的文字披露学生游行情况。1937年8月9日,“三个世界”被迫停刊,所有财产被没收。

在这期间,成舍我创办《民生报》,“小报大办”,仅一年发行量就突破3万份。到1934年被封,前后7年。1935年9月20日,他又在上海创办新型小报《立报》,以“立己”“立人”“立国”为宗旨,提出“以日销百万为目的”、“报纸大众化”等口号。“发刊要旨”表明“以最新姿态,使报纸功能,普及全国大众”。他在《我们的宣言》中说:

“我们认为不仅立己立人不能分开,即立国也实已包括在立己的范围以内。我们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我们就必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于国家的关系。”“我们要使报馆变成一个不具形式的大众乐园,和大众学校。我们始终认定,大众利益,应超过于任何个人利益之上。”

同时提出四个原则:

一、凭良心说话。

二、用真凭实据报告新闻。

三、除国家币制,及社会经济,有根本变动外,我们当永远保持‘一元钱看三个月’廉价报纸的最低价格,决不另加丝毫以增重读者的负担。

四、除环境及不得已原因外,我们认定,报纸对于读众,乃一种无形的食粮,和无形的交通工具,应当终年为读众服务,无论任何节日,概不许有一天的休刊。”

积十多年的办报经验,尤其是《民生报》的尝试,成舍我决心将《立报》“小报大办”,办成一张有巨大发行量的大众化报纸。“只要少吸一支烟,你准看得起;略识几百字,你准看得懂”,“五分钟可知天下事,一元钱可看三个月”等宣传很能吸引普通读者。由于他敢于和上海恶势力对抗,很快声誉鹊起,一纸风行,发行量超过10万份。1936年11月23日凌晨,沈钧儒等“七君子”在上海被捕,当天《立报》就在头版右下方加黑框发表了《今晨七人被捕》的消息。在此后“七君子”关押的240多天中,《立报》从方方面面进行追踪报道。1937年6月8日,还全文发表《沈钧儒等答辩状》长文,从二版转三版再转五版,还在二版配发评论《怎样沟通政治和法律》。小小的《立报》汇集了张友鸾、张恨水、萨空了、谢六逸、恽逸群、严谔声等政治倾向各异的报界才俊,

副刊、评论、特写、通讯都虎虎有生气,真正做到了“消息灵通,时代先驱”。到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宣告停刊时,发行量最高达20万份,居全国报纸之冠。《立报》虽然只存在了两年零两个月,但它创造了成舍我报业生涯中新一轮的辉煌,直到晚年,台湾解除报禁后,他再次办报仍以《立报》为名。

1945年5月1日,他以“中国新闻公司”名义集资在重庆创办《世界日报》,他后来回忆“我这一生办报,最辛苦,最累人的时候,就是《世界日报》在重庆复刊的时候”。不过为时很短,4个月,他回北平前夕把报纸交给了曾共患难的陈云阁。

北平“世界”报系复刊(《世界画报》没有复刊),他提倡改进国民心理,转变社会风气,“发动全国舆论,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力图在激烈的党派纷争之外走出“第三条道路”。他和他的“世界”最后三年基本上走的是这条路。

《世界日报》复刊后,除社评外还有专论、特论、时论,主要由各学科学者撰写,三年中发表了近千篇,参与撰写的有上百人,共同点就是学者论政,产生了一定影响。为实践“读者有其报”和“人民的报纸”的诺言,还另外开辟带有读者论坛性质的“人民公论”,订有严格规约,必须文责自负,写稿的多为学者名流,如1945年12月曾发表朝阳大学教授陈瑾昆的《少“自作孽”》,借古论今,抨击当政。

《明珠》副刊明确提出“四个反对”,反对茶余饭后的消遣,反对不顾及大众的个人牢骚,反对软性化色情化的东西,反对无聊的考证。1945年12月31日,它曾以整版篇幅刊登《访问鲁迅夫人》一文。1946年10月19日,又以整版篇幅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有《匕首般的文章》、《祭祀鲁迅逝世十周年别忘掉其遗族的苦难》等文。虽然它也整版刊登过为蒋介石祝寿的文章。

1949年2月,内战即将落幕,胜负已分,作为“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成舍我的“世界”已无路可走,停刊是它的必然命运。然而,成舍我这个名字和三个“世界”、《民生报》、《立报》一起成为报业史不能回避的话题。

(责任编辑 吴 思)

我认识的 廖承志

● 高梁



一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46年初他被国民党释放出狱不久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按照双方达成的“双十协定”,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全国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会上,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一再要求国民党当局尽速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和廖承志、叶挺等同志。在各方面的强烈呼吁和支持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在1946年1月先释放了被关押达四年之久的廖承志,然后又释放了叶挺将军。

当时,我在重庆中央大学就读,在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和革命工作。周恩来同志指示西南局从当地的大学生中,选派一批懂英文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到解放区去从事英文翻译工作。我响应党的号召,在当年三月中旬来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报到。当我到达“红岩村”时,看到一些同志正围着一个中等身材的人亲切交谈。他面部微黑而稍显消瘦,留着一头黑发和小胡子,穿着一身像是新购来的黑色西服,带着广东口音和同志们侃侃而谈,时而引起朗朗

笑声。办事处的同志告诉我,他就是才出狱不久的廖承志同志。当时他那谈笑风生的英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年四月初,我和被选派去解放区的同学们开始到“红岩村”集中。一天,我来到办事处同志们活动的地点,看到那里有一份墙报,上面登载着一篇用稿纸写的长约七、八页的文章,文章作者署名是廖承志。我立刻被这篇文章吸引,站在那里专注地读着,而且越读越受感动。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忆着这篇文章的大致内容:

1942年日本占领香港时,廖承志同志从香港撤退并帮助一批批爱国人士回到内地,然后他参加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出卖,他遭国民党特务绑架,被关押在江西的集中营。入狱后,由于他是国民党革命元老廖仲恺的儿子,国民党反动派还不敢任意杀害,只是逼迫他叛党投降。他们先是用极残酷恶劣的狱中生活折磨他的肉体,后又用高官、美食和美女来诱惑和软化他的斗志。期间,蒋经国曾奉蒋介石之命,亲自到江西集中营来“看望”和“劝服”他,他依然未被所动。直到1945年,蒋介石命令“军统”把他转移到重庆歌乐山的“白公馆”看押。为了在国共谈判前逼他投降,蒋介石最后亲自出马找他谈话,劝他悔悟退党,留在蒋的身边工作。他断然拒绝了,明确表示:“我活着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死做中国共产党的鬼!”在万般无奈下,蒋介石才不得不释放了他。在他出狱后泪流满面地见到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时,才确

知,当他在狱中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已把他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了。

我两三遍地读着这篇文章,眼前涌现出一个蔑视敌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气势磅礴的革命勇士的形象。后来,我又听到办事处的同志们讲,他青年时期在日本、欧洲国家因参加反帝同盟和领导海员运动曾多次遭到逮捕,回国后又于1933年在上海被捕;在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之后,因不同意张国焘左倾错误,又被张国焘拘捕,带着手铐走过了长征,后经周恩来营救才获释。

二 四年解放战争中,他任新华社社长,把党中央的声音及时向国内外传播

廖承志出狱不久,党中央调他回延安,委任他为新华通讯社社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

1947年3月党中央从延安撤出前,决定将新华社同《解放日报》合并,由廖承志负责,撤出时,他把全体人员分为两路,一路短小精悍,由副社长范长江率领,紧随党中央转战在陕北,用“陕北电台”呼号向外发布消息;一路约二三百人,由他亲自率领到了晋太行山下,在涉县建立起新的电台和临时总社编辑部。这样,当陕北战场形势告紧而电台再不能工作的时候,廖承志立刻就用新建的电台,继续以“陕北电台”的呼号向外广播,保证了中央的声音得以及时而毫无间断地传播到国内外。根据形势发展,他还请示中央,在全国各野战军建立了新华分社或总分社,及时汇集和报道了全国解放战争进展的情况;他设法收集国民党统治区的广播和报纸,接收外国通讯社的新闻,每天都把它们编辑成几千字的《新闻情报》,播发给中央和各解放区领导参考,这也就是建国后的《参考消息》。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使国际上更需了解解放区的实况,于是在他的直接关注下,新华社第一个国外分社就于1948年春在捷克布拉格建立了,主要任务是抄收和发布新华社的英文电讯,扩大解放区在国外的影响。他还在太行山积极筹备英文口语的对外广播,并于1948年秋正式开台对外播音。我们的

一位女同学魏琳就成为解放区对外英语广播的第一个播音员。

三 建国后,他在侨务、对外交往和维护世界和平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贡献;我曾有幸蒙受到他的启发和教诲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根据他青年时期在国外和香港开展华侨工作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丰富经历,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等职;同时被选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这个时期,他在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把主要精力放在侨务工作上。他接见了建国初期从海外归来的几乎每个爱国华侨,倾听他们的心声,全心全意地为他们和侨眷服务。

我第一次同他直接接触并亲聆他的教诲,是在1953年的春天。当时,我国为了开展战后对日本的新关系,决定将仍滞留在中国的三万多日侨遣送回国,由中国红十字会邀请日本三个人民团体组成第一个民间代表团,前来北京进行具体商谈。周总理考虑到廖承志在日本出生,曾结识众多日本友人,且对日本情况熟悉,特指定他为中國红十字会顾问,参加同日方的谈判。由于我过去做过外事工作,他和红十字会负责人伍云甫同志商定,派我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前去广州罗湖口岸迎接这个代表团到北京。在我出发前,他了解到我有亲人曾在抗战中被日军杀害,他一再叮嘱我说:“我们大家都遭受过日本侵略,是苦大仇深的。但日本人民是无辜而友好善良的人民,我们必须把日本人民同日本军国主义者严格区别开来。”他还说:“这次来的日本客人大多是友好的,你要热情友好地接待,千万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但也要不卑不亢。”我尽力按照他的嘱咐完成了任务,他很高兴。在随后同日方的三次谈判中,我看到,他非常坚定而鲜明地阐述了我国对日本的上述立场和政策,同时又深切理解战后日本人民的困难处境,对日本当前时局分析得十分清晰;他以地道流利的日语,有时夹带些日本典故和俚语,同日本友人坦诚交谈,使对方

听后感到格外亲切和信服。结果谈判进行得很顺利。第二年,他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副团长回访了日本,打开了战后中日人民交往和“以民促官”的新局面。从此以后,凡是同日本人士交往和对日关系问题,他都作为周总理的得力助手,亲自参与,一生同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来,他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开辟和扩大了同日本往来的渠道,直到同日本正式恢复邦交和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签订;他广泛结交了日本众多官方和非官方人士,用自己的言行取得他们的尊敬和信任。

1955年,我调入新华社工作,被派到印度任新华社常驻记者;1960年以后又调到非洲国家任常驻记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世界和平运动蓬勃发展、亚非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浪潮高涨的年代。廖承志同志在这期间曾多次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世界和平大会和理事会,他还作为代表团顾问,随周总理出席了万隆亚非会议,随宋庆龄副委员长访问了印度等国;后来,他担任了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多次率团出席了在非洲国家举行的亚非团结大会和理事会。他还在1965年以代表团首席顾问的身份(这时他已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多年),随同陈毅副总理出席了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第二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筹备会议。我曾有幸随他采访过一些访问活动和一些会议,有机会进一步领略到他出众的外交才能和作风。我特别感受到,他心怀宽阔,高瞻远瞩,在同大量具有不同政治观点和不同政治派别人士的交往中,他开诚布公,以理服人,善于根据周总理所提倡的“求同存异”方针,倾听和采纳对方一切合理的意见,因而使人折服。

四 “文革”劫难后,他在侨务工作中拨乱反正,为香港回归带病请缨、不遗余力

1966年国内“文革”开始,“四人帮”以“叛徒、特务”等罪名对他进行了批斗,并抄了家。待周恩来知道后,立即下令让他住进中南海,暂与外界隔绝,但后来仍被造反派软禁在西皇城根等处进行“反省”和“监管”。他一生在对敌斗争中

曾被关押七次,对关押从不畏惧;然而,这次他眼睁睁看着林彪、“四人帮”肆虐篡权,把革命老一代终身为党为人民创立的事业毁于一旦,他的痛苦却无以复加,在忧郁中心脏病也开始发作。直到1972年中日即将建交,许多来华的日本朋友要求一定见他,经周总理竭力设法,他才得以开始露面活动,从此恢复了工作。

待他再度复出工作后,众多国内外的华侨和侨属都要求来看望他,吐诉他们在“文革”中遭受的灾难和苦闷心情。他对来者有求必应,带着病体,一律热情欢迎和竭诚相待,有的还促膝长谈。他发现,绝大多数华侨和侨属在“文革”中因有“海外关系”而受株连和迫害,但他们依然眷恋着祖国,深信祖国在受到巨大劫难之后会更加成熟和发展壮大,并愿为此而献计献策。世界上哪国侨民能像华侨这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啊!他一方面尽力为他们做些解忧排难的实事,另一方面则苦思着如何清除“四人帮”的余毒,使侨务工作尽速回到正确的轨道。他在1978年1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力的文章:《批判“四人帮”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反动谬论》,首先举起了在侨务工作中拨乱反正的旗帜。

这年,党中央决定恢复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经邓小平同志建议,由廖承志任主任;接着又建立了港澳办公室,由他兼任主任。他带病工作,领导办公室的同志们首先在思想上统一认识,然后把过去各种“左”的规定和条例一一加以清查和纠正,重新制定出一系列关于保护海外侨胞和国内归侨正当权利和利益的规定。他安置了大批国内归侨的生活和工作以及子女升学的问题,并且积极恢复和重建了“中国新闻社”和“华侨旅行社”,以加强国内同海外侨胞的信息交流,便于他们同祖国的来往。在他的积极推动和筹划下,第一批与港澳合资建立的国际旅游宾馆出现在我国首都和外地。一些香港和国内的爱国有识之士写信给他,建议在深圳等地开辟一个吸引港澳和国外投资的特区,他对此甚为赞同,积极地向党中央作了反映。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党中央在1979年7月作出了在深圳成立经济特区的决定。

1979年1月1日,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为和平统一祖国发表了《告台湾同胞

书》,接着,党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委托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担任组长,由已经任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承志担任副组长。后来由于邓颖超年高体弱,小组的日常工作由廖承志负责。

就在同一年,中央决定恢复、整顿和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成立了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并在中央宣传部内设立对外宣传局,作为小组的办事机构。我从国外被调回参加这项工作,并且同侨务办公室、港澳办公室和对台领导小组等建立了经常业务联系。从此,我有了比过去更多的机会见到廖承志同志并亲聆他的教诲了。

我记得,自我1965年随他在非洲采访,已有十多年未再见到他。这次见到他时,他已不再是当年那样满头黑发、黑胖健壮和异常活跃的形象,也少有那种爱说爱笑、诙谐幽默的风趣了;而已是一位头发灰白、面有斑纹、行走缓慢和少言寡语的七旬老人了。当年比他年长者都一贯亲切地称他为“小廖”,而今所有的人都敬爱地尊称他为“廖公”了。岁月的流逝,特别是“文革”的迫害和严重的心脏病,已使他的身体受到空前的折磨而显得虚弱,神态也更加沉着持重。然而,我发现,他对同志不仅依然是那么坦诚相待,而且更加亲切关心和谆谆善导;在他内心深处,好似燃烧着一团更为炽热的火焰,促使他更加急迫地要把在“文革”中失掉的一切弥补起来。

1979年底,他的心脏病屡屡发作,搅扰着他几乎已无法工作和生活。当时他的好友、香港著名爱国人士查济民先生推荐美国旧金山一位著名心脏科大夫前来北京为他进行了全面检查。根据检查结果,这位大夫建议他到美国去进行冠状动脉搭桥和室壁瘤切除手术。几乎所有他的亲属和同志们都不赞成他这个古稀之人前去冒这么大的风险。但他为了争取生命中能有再多几年工作时间,毅然接受了这个治疗方案,并向党中央写了报告。中央经过慎重考虑,批准了他的要求。

手术进行得很成功。经过短期的疗养,他于当年5月精神振奋地返回祖国。在回程中暂在香港停留期间,他同当地经济界、文化艺术及新闻界的许多代表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和深入交谈。他发现,多数人关心的还是1997年香港是否回归和如何回归祖国的问题,他们普遍存在着种种疑

虑,尤其担心香港回归后是否同大陆实行一样的制度和政策。他回国后立即召集港澳办连续开会,提出了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等观点。最后,他概括了大家的讨论,提出了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意见,上报中央审核,后由中央采纳。

五 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日思夜想的是广大台湾同胞,他为祖国统一大业鞠躬尽瘁

此后,他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对台工作。不管多忙,他都精神抖擞地定期召集对台小组开会,调查研究对台的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开始时,他要我参加讨论有关对台宣传问题的会议,或者派人同我一起拟定对台重大事件宣传的口径;后来,经他批准,我正式参加了对台小组每次举行的例会。

根据《告台湾同胞书》的精神,他要求大家首先从思想感情上转变过来。他经常向一些对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想不通的同志这样说:国民党右派杀了你们的亲人,也杀害了我的父亲和许多共产党员,可说是血海深仇;但我们必须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国家利益为重,要有不计个人恩怨的胸怀,目的就是为实现祖国统一这个伟大事业啊!他要求今后必须摈弃一切不合时宜的概念和提法,如什么“大打大闹”、“分化瓦解”、“拉过来为我所用”等等,而要脚踏实地地把中央的政策落到实处。在工作上,他要求首先把当时住在大陆的两万多名台胞的工作做好,并成立起他们自己的“台湾同胞联谊会”;同时要通过岛外影响岛内,以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和广交朋友的方式,逐渐建立起愿意接触和互相了解的气氛。在宣传上他要求着重讲“爱国一家”的思想,不要过多强调“既往不咎”等。经过长期对台政治、经济、贸易及文化各方面的调研和反复讨论,对台小组在邓颖超、廖承志亲自领导下拟定了对台湾工作的九条建议;后经党中央批准,由叶剑英委员长于1981年9月30日以向新华社发表谈话的方式,向世界公布。九条的要点包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探亲旅游等方面的交流提供方便；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等等。

1982年7月，邓颖超同志看到了蒋经国在悼念他父亲蒋介石的一篇文章中，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等一些思念家乡故土的话，她建议廖承志利用此机会给他所熟悉的蒋经国写封信，以推动形势的发展。他回忆起青少年时同蒋经国一起长大、后在莫斯科一起学习过的情景，连夜赶写了这封信。在信的开头，他用了“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一语，表达他对蒋经国的悬念；然后即展开直言：“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他坦诚劝告：若蒋经国能“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名留青史”；若蒋“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也将难辞其咎。”最后，他强调指出：“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试以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与绝续，望弟再想。”信在结束时，他以“寥寥海天，不归何待？”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等情深意切之语，再次表达他对祖国统一的诚挚渴望之心。此信写成后，经中央同意，由新华社广播并于7月2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时通过香港报纸进入台湾，使整个台湾受到震动。

在这个时期，他所接见的各界台湾朋友也不断增多，他都亲切坦率地同他们交谈交朋友；凡属有利于海峡两岸交流的事他都支持。有次，在台、港的几位编导表示愿同大陆共同合作拍制“火烧圆明园”影片，他听后十分高兴和赞成，他要我协助同中国电影界联系。他自己在健康不佳的情况下还召开了一次有各方参加的招待会。

不幸的是，有天他在家中摔了跤，股骨胫折损，这无疑对他的病体如雪上加霜。医生建议他做保守疗法，长期卧床静养。他坚决不同意，要求

立即开刀，打进钢板，争取尽快下地走路。他好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时间有限，坚持地说：“我没有时间再静养了，也浪费不起了！我要工作！”不久，我们就看到他坐着轮椅前来开会，乐呵呵地跟同志们打招呼。

1983年5月，经他和港澳办等单位多次讨论修改的关于同英国会谈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意见，已由邓小平同志和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政治局委托他去南方亲自再征求一下在那里养病的叶剑英、陈云同志的意见。他去南方完成了这项任务。回程中他顺路在南京谒拜了双亲廖仲恺、何香凝的陵墓。一路辛苦，使他患了感冒；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又带病参加了外事活动。结果，由于低烧、咳嗽，他不得不住院治疗。

6月6日，全国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他拒绝大夫的劝阻，坐着轮椅，从医院来出席这次大会。在这届大会前，中共中央已向大会提名他为国家副主席候选人选。当时，我参加大会对外宣传工作，为加强同中外记者的联系，经常奔走在主席台和记者席之间。我见他在整整三个小时里，坐在主席台上全心专注地听着大会上的报告，毫无疲倦之意。待大会结束他离开主席台时，我跑上前去同他握手，问好致敬，并告诉他，这届大会已开始有批港、澳记者前来采访了。他听后，在轮椅上对我微笑地说：“很好！很好！”但万万没有料到，这却成为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

回院以后，他就感到胸闷，咳嗽和气喘。在病中，他还叫秘书打电话，检查一下他所关心的工作；还同一位有关同志谈六届人大，谈祖国未来的繁荣。他向对台办的一位负责同志一再嘱咐：在对台工作中，要永远记住周总理临终前的话，一定不要忘记老朋友，要坚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才可能争取更多的朋友，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

廖承志同志知识渊博，通晓五种外国语，擅长诗词、书画和戏剧。

1983年6月10日凌晨，他终于因肺动脉栓塞而不幸逝世。他的逝世，引起全国人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各国友好人士和人民的悲痛和惋惜。

（责任编辑 吴 思）

刘英在瑞金的多彩生活

● 曹春荣

到了瑞金就是回到了家

刘英原名郑杰，湖南长沙人。她是1933年6月到达赣南东部瑞金的。她由共产国际分派，从苏联回国，到中央苏区工作。

这时的瑞金，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原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也迁到了这里。在这里一下子就见到了许多熟人，其中有：周恩来与邓颖超、周以栗、罗迈（李维汉）、曾三、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王稼祥，还有此前虽未谋面却心仪已久的毛泽东。他们或是刘英的师长、上级、战友，或是刘英与之交往过的党的领导干部。所以，刘英虽是第一次来瑞金，却一点也不陌生。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我觉得，到了瑞金我就是回到了家。”

刘英刚到瑞金时，住在位于下肖区（今属沙洲坝镇）下屋场（又称下下肖）的中共中央局楼上。这幢房子原是一个姓杨的前清举人的私宅，砖木结构，上下两层，前后两厅，且有左右横屋，仅一层就有18间房。举人后裔在土地革命中划了地主成分，房子被当地苏维埃政府没收，后来就派了上述用场。在这里办公和居住的有中央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博古、洛甫、陈云、罗迈、邓颖超、李坚贞，以及王首道、毛泽覃、金维映、小开（潘汉年）等人。他们对刘英的到来都很高兴。博古说，这下我们电台增加了一个女营政委！他要刘英去电台工作。刘英到电台转了转，觉得这里并不缺少人，就向中央组织局主任罗迈提出让她做群众工作。罗迈是她的老上级，知道她有这方面的长处，答应了她的要求，又征得博古同意，便派她去了正需要干部的少共（即共青团）中央局。

少共中央局驻地是下肖区上屋场（又称上下

肖），离中共中央局驻地很近。这里聚集了一批挺能干的年轻人，如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何克全）、宣传部长陆定一，时年均27岁，长刘英一岁；少先总队队长张爱萍时年23岁；儿童局书记陈丕显和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其时还只十七八岁。刘英来到这里的第一个头衔是少共中央局巡视员。三个月后，她奉命去福建团省委巡视，被中共福建省委留下，当了几个月的团省委书记。1934年1月，刘英回到瑞金，担任了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

少共中央局的领导干部，虽说大多是职业革命家，但年轻人生动活泼、朝气蓬勃的秉性依然不减。加上那时没有等级观念，无论哪级领导和下面同志相处，都不分彼此，亲密无间，刘英在这个革命家庭里生活得非常愉快。尽管当时生活很艰苦，吃的饭菜很差，还常常缺油少盐，吃饭没有凳子，都站着吃。但中央领导人和机关普通干部吃一锅饭，大家也就心情舒畅得很。晚饭前后，中共中央局和少共中央局的同志还常常聚集在大树下草地上，开展文体活动。山歌能手胡耀邦和赖大超（也是少共中央的半大小伙子），喜欢打山歌、斗山歌，不时引来满堂喝彩、众声齐和。洛甫、陈云、小开爱打乒乓球，将杉木板子做成球拍，两张方桌拼成球台，就“杀”开了。刘英去看热闹，他们总要喊：刘英，来一盘！刘英便兴冲冲地上阵打了起来。王盛荣、张爱萍、杨尚昆一班人爱好篮球运动，他们就在自辟的球场上奔腾跳跃。

瑞金及其远近周围的中央苏区多是山地丘陵，交通不便，唯一可以借重的交通工具便是骡马，所以少共中央局的同志们半开玩笑地说，不会骑马就不能干革命。刘英生性好强，听着这话就学开了骑马，先由别人牵着马走，后来可以一个人骑着慢慢走了。有一次，张爱萍等骑马小跑

过来,挨近刘英身边时突然喊道:刘英同志,跑马哟!说时将马鞭一抽,他的马便一溜烟奔驰而去。刘英的马受惊,也撒开四蹄跑了起来,把刘英摔了下去。张爱萍他们急忙返回,说是开个玩笑,还说不跑不摔学不会骑马。刘英没有因此吓倒,很快就学会了。后来她去远一点的地方都骑马,赢得了许多工作时间。

在瑞金“家”中成长

刘英就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后,有一次去看望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毛主席诚恳地对她说:“你嘴巴子伶俐,能说会道。不过当了宣传部长,讲话的对象不同了,可要注意通俗化啊。你宣传的对象是农民,长篇大论不灵,学生腔也要不得。就是湖南人的腔口也要变一变,要向江西老表学说话呐!”刘英照毛主席的话去做,受益匪浅。她在少共中央局的主要工作是培训青年干部。为此,她办了一个红军青年宣传干事训练班,给他们较系统地上团课。她用自己主编的《青年读本》作教材,把书中的道理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学员欢迎。后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党校)办的青年班,也请刘英去讲过青年团的任务和团的建设。两、三个月的“部长”生涯,使她的宣传能力与组织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

1934年4月下旬,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遭受严重挫折。为了支援前方,扩大红军成了当时的中心任务。5月上旬末,罗迈通知刘英到瑞金西边的于都县去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刘英立马带领十多个突击队员,赶到180里之外的于都开展工作。原规定三个月扩红2200名的任务,他们一个半月就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这年6月下旬,刘英满心喜悦地从于都回到瑞金。路上碰到时为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兼总政机关报《红星报》主编的邓小平。总政治部驻地白屋子,离下肖很近。刘英一帮年轻人晚饭后很喜欢到总政副主任贺昌那里玩儿。贺昌陆续告诉刘英关于邓小平的一些情况。说邓小平非常能干,又有独立思考精神,为此受了好多委屈,离了婚,但他依然很乐观。刘英因而认识了比自己一岁的邓小平,喜欢和他天南地北地吹牛,搞

“精神会餐”。这回邓小平一见到刘英,就伸出大拇指夸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刘英一时摸不着头脑。邓小平解释说:这是项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他夸奖你扩红搞得很好。你们的事迹都登上《红色中华》报了。

大约7月初起,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加紧了对瑞金县城和沙洲坝一带的袭扰轰炸。有一次,一个炸弹丢在沙洲坝一处岗坡上,半截身子露在外边,一直没有爆炸。时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李德下了个死命令,不准任何人去看,看了的就拉去枪毙。一天刘英午睡睡不着,想去看看那个炸弹,便邀上胡耀邦等几个人跑去看。事后被李德知道,他命令国家政治保卫局派人去抓刘英几个。这情景恰好被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看见,博古问明情况后就说:算了算了,几个小孩子看了就看了。不是从没见过炸弹吗?这下见了,以后就不稀罕了不是?李德碍于博古的情面,不得不让人放了刘英几个。这件事使刘英对博古的另一面有了最初的体验。

来到瑞金以后,刘英对当时与博古齐名的洛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第二届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认识,也由浅入深。1929年刘英到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时,洛甫正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兼做研究工作。后者有时到劳大讲课,就成了前者的老师。因为这一层关系,刘英对洛甫有种尊敬之情。想不到刘英刚到瑞金不久,就接到洛甫的一个电话。洛甫很随意地叫她的俄文名字——尤克娜,说是今天要打她的“土豪”。原来,从外面进入苏区的人,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路费,到达苏区时一般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叫做“打土豪”。刘英知道这个规矩,爽快地答应了。快吃晚饭时,刘英就到洛甫那边去。邀上博古、小开和少共中央局的同志,大约十来个人。走了上十里路,到了瑞金县城馆子店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要了当地熬豆腐、红烧肉等几个名菜,美美地吃了一顿。刘英买了单,余钱也花光了。这时,刘英感到洛甫除了可尊敬外,还可亲近,不是那种让人敬而远之的人。

刘英在福建做团省委书记时,洛甫同阿金(金维映)一道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参加过一次

福建省党代会。会议期间，刘英同洛甫多次接触，相互间有了更多的了解。刘英早就领教过洛甫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如今又体会到他的政策策略水平非同一般。洛甫也看到刘英在不断进步，并十分欣赏她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与说干就干的作风。

1934年5月，刘英第一次在于都扩红时，碰到肃反扩大化问题。她从许多迹象判断，觉得被抓的许多人是冤枉的。但当时有种逻辑，认为扩红搞不起来是因为反革命捣乱，

抓起反革命，扩红就搞起来了。正在为难之际，刘英收到洛甫写来的一封长信，信中首先祝贺他们扩红胜利，接着要他们注意，肃反不能乱来。对扩红不积极的群众，要多进行思想发动，而不是当反革命抓起来。刘英得了这把尚方宝剑，如释重负，很快把这些被错误关押的人放了。从此，刘英进一步增强了贯彻执行正确政策策略的自觉性，并因此终身受益。

刘英和洛甫在瑞金相处一年多，这一年多里他们由相识而相知，为后来在陕北瓦窑堡结为夫妻播下了种子。

从于都扩红回到瑞金后，刘英担任过一段日子的赣南战地委员会委员，负责组织工作。8月，仍回少共中央局，改任组织部长。

这时，第五次反“围剿”每况愈下，看不出转机，红一方面军已秘密开始了撤离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紧急扩红，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9月中旬，罗迈找刘英谈话，派她再次去于都扩红。

这一次扩红不比上次。时间更急促，任务更繁重，而兵源却越来越少。刘英到达于都时，当地才动员了255人参军，离规定的4500人的任务相差太远。刘英急得团团转，忙向正在于都巡视工作的毛主席求计。毛主席此时打摆子刚好，他



延安时期的合影。右起：徐羽、许大远、薛光军、张闻天、马洪、刘英、尚明、曾彦修、雍文涛

强撑病体，和刘英一起召集全县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并亲自讲话，鼓励大家下定决心，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会后，于都扩红的被动局面有了一定的改观。到9月底，动员了近千人参加红军。尽管距离完成任务很远，但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先是毛主席亲口告诉刘英，后是罗迈打来电话通知刘英，都说是有“特别任务”，让她马上离开于都回瑞金。刘英模糊地意识到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了，急忙收拾行装骑上马，带着警卫员急驰疾走，一天就赶回了瑞金。这时，她才知道所谓“特别任务”，就是要突围，从中央苏区打出去。

瑞金的父老乡亲眼看红军在匆匆地整装待发，又不像以往十天半月或多则两三个月就回来的样子，也是难分难舍。刘英的房东，一个可亲可敬的红军家属，就再三对刘英说：“我把房子给你留着，你什么时候回来都还住在这里噢。”听得刘英心里酸酸的，只能一个劲点头答应：“好，好！”这一幕，永久地铭刻在刘英脑海里。

1934年10月10日，刘英和中央红军万千将士一起，从瑞金云石山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从此，刘英一直背负历史的使命向北、向北，到了陕北，到了东北，又到了北京，就是再没有机会重回瑞金作故地游。（责任编辑 吴思）

我的祖父石瑛(字衡青),是湖北“三怪”之一。他一生特立独行,廉洁奉公,做出了许多不合世俗人情的事情。虽然他逝世60年了,但是他为民请命、力抗权贵的许多事迹,至今在民间还广为流传。

拒绝接受蒋介石 所荐黄埔毕业生

石瑛在第二次任湖北建设厅厅长的某一天,有一个衣着整齐、头发梳得光光的高个儿青年,走进了厅长办公室。他向石厅长自我介绍说:“我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并双手呈上蒋介石手书的推荐信。石瑛看完信后,一边与此人交谈,一边观察其行为举止,觉得此人属纨绔子弟。表面虽然恭敬,其实骨子里甚为傲慢。言行举止轻浮自大,善于夸夸其谈,实无真才实学,决定不用。遂致电蒋介石说:“钧座命我为湖北人民办事,又命我为钧座推荐的人安排官职,这样我就不好办了。我要治好湖北,必须选用廉能干练的官员。钧座推荐的人,我认为不合条件,不能安置。”

反对林森扩建中山陵园

1933年12月中旬,石瑛就任南京市市长才10个月,参加国府主席林森主持的中央会议。林主席以纪念孙中山逝世10周年为由,提议扩建中山陵园,添建亭榭,并要新建国府礼堂,要南京市政府辟地修建。与会者大都随声附合或者沉默不语。石瑛毅然挺身而出,为民请命道:“纪念总理,固然是党国大事,可是要扩大陵园界址,要新建国府礼堂,势必驱逐原来住在那儿的百姓,叫他们到哪儿去落脚谋生?总理是提倡民生主义的,是总理的忠实信徒,就要按总理的意志办事,绝对不能扰民。何况现在是何等时期?许多穷人需要政府安置,日本的炮火就在眼前。扩建中山陵园、修建国府礼堂,势必影响国防、市政建

『民国第一清官』石瑛

●石聿俊

设的开支,总理倘若九泉有知,也绝不会同意此举!”

在此案被通过后,石瑛愤而提出辞职。正在西南的蒋介石闻之此事,立即致电慰留,并使林森的提案搁置。

国民党元老冯自由,为此事挽诗赞曰:

世风日下竟贪污,高洁如君德不孤;
铁面无私继包拯,园陵界址不含糊。

怒打孔祥熙

1934年初,在一次中委会议会间休息时,石瑛气冲冲地走到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面前,面含愠色质问孔:“你为什么借口经费困难,而取消了铁道部协助南京市的12万元?”“南京从一个中等城市跃为国都,增加了多少中央机关,这些机关除大官们外,还有多少小职员要生息、要给养、孩子要受教育,你了解不了解!有多少贫民没有房子住、小孩没有书读,有多少事等着我们去做,你知道不知道!?”

孔祥熙忘不了石瑛整顿南京市税务,一次就征了他几千元现洋的税,心怀夙怨讥讽地说:“南京市的税收不是很可观吗?”石瑛听后,怒火中烧,随手抓起桌上墨盒向身着英国毛料西服的孔祥熙砸去,并大声斥责说:“你别忘了南京市的全年税收尽管很好,但还不到你现有家产的百分之一!”石瑛在孔祥熙笔挺的西服染上大块墨污,还未从惊呆中清醒过来时,拂袖而去,于当月27日提出辞呈。蒋介石与汪精卫再三挽留,社会各界也敦请慰留,石瑛才同意留任。

痛斥汪精卫媚日

石瑛僚属,曾任国民党后补中委、西北联合大学校长的赖琰(即赖景湖)在纪念他的文章里指出:“他做市长,是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代,请

他出山,是作为一种政治号召的。他就职后,一切公事公办,从来不买任何权要的账。那时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对日本忍辱负重,避免和它发生冲突,有时自然免不了退让,甚至屈辱的地方。”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汪精卫大谈:“对日外交的根本方针,遵奉总理遗教,中日应携手共同发展。中日冲突唯以和平方法的正常步调去解决。”石瑛听了汪的谬论后,愤怒之情油然而生,不能自己。只听“啪”的一声,石瑛桌子一拍,站起来大声质问汪精卫:“东三省已沦入日本之手三年有余,南京街头流亡的东北父老,你为何视而不见?!热河长城口被日军占领,驻天津的日军正加紧演习巷战,难道这些你都不知道?这一切是所谓和平方法、正常步调,解决得了的吗?”

1935年,日本侵华战争一触即发,石瑛与汪精卫的媚日投降路线的斗争也达到高潮。3月5日,南京报纸披露,日本将派《朝日新闻》访问团飞来南京。这下可忙坏了汪精卫,3月19日他从上海坐飞机赶回南京,亲自布置迎接,同时打电话命令石瑛:“明天下午2点,请你率市府科长以上的职员,全体到机场迎接日本贵宾。”

石瑛接电话后,正气凛然地回答说:“我的科长决不迎接敌人!”“啪”的一声搁下电话,转身神气严峻地向秘书口授指示:“明天下午,全体市府职员放假半天!”

对陈诚既支持又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宜昌沦陷后,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在湖北恩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工作是很有成效的。陈诚搞了“二五减租”、“耕者有其田”;当时物资匮乏,陈成立了“湖北平价物品供应处”,实行凭证供应;对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公费教育;严惩贪官污吏、禁烟禁毒;实行新的兵役制度,做了不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

任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的石瑛对省府各项有利于国家民众的措施多方给予支持和协助。当时“省府”与“省议会”两大机构的关系比较协调,两大机构的首脑间设有专线电话,可以随时联系并交换意见,并能互相尊重,使许多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另一方面,省参议员们在石瑛的领导下,

大都敢说敢为,使省临时参议会这个民意机构真正起到了监督省政府的作用。在省参议会开会时,常质询政府要员(包括陈诚在内),对某些官员的渎职、贪污、营私舞弊、祸害地方等丑行大加揭露、鞭挞、弹劾。

陈诚的亲信、省建设厅厅长朱一成因贪污受到省临时参议会的弹劾。军管区徐司令纵容部下胡作非为,副议长胡忠民声色俱厉当面斥责徐司令说:“你这个军管区,简直成了既谋财又害命的阎王殿。”一部大型机器在省府从武汉撤退至宜昌时运至万县搁置,而撤退到恩施的省府又等着急用,而负责运机器的人却坐视不理,并想乘机拍卖发国难财。省临时参议会为了弄清真相,照章通知省主席陈诚到会答复。陈未至,派来的代表几经议员追查质询,答复均不得要领,因而督促陈诚亲临面复,搞得陈诚很难堪,下不了台。陈对德高望重的党国元老石瑛素来敬重,不敢轻易得罪,只好以辞职相要挟。石瑛以眼还眼,立即提出辞职以相对抗。

“府会之争”形成僵局,必对抗日救国的大局不利,何况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严峻的时刻,石瑛想到此点,同时念及到陈诚多次来家面谈,有愧疚悔恨之意,居正、李书诚、何成浚、张难先等人又多方斡旋,终于主持通过了“挽留陈主席”议案,体面地结束了这次“省”、“会”之争。

在一次省府委员会上,陈诚提议盖六栋小楼,并诚恳地对石瑛说:“石议长两腿风湿很严重,现住的房子太潮湿、太简陋,对健康很不利,先给您盖一栋。”石瑛立刻反驳说:“我不要。人家小职员住的是什么?一家好几口挤在一间屋里,有的人家,桌子底下还养头猪、喂几只鸡。不光湿,还又挤又臭。要盖就给他们盖,何况现在还在打仗呢。”陈诚不得不取消自己的提议。

1938年下半年石瑛任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前,与严重(立山)代主席力主恢复难行的旧蜀道,修通了与四川万县交界的“施利路”(恩施到利川)、与湖南交界的“咸来路”(咸丰至来凤)、恩施至宜昌的“施宜路”。这些道路相对易修建,而且造价低。当时共修通了两千多公里,对抗日时期沟通东西南北,保障军民物资供应补给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陈诚的亲信、当时的省府秘书长柳克述违背省府决议,为了个人能舒舒服服地乘坐小汽车上下班,竟擅自调动大量民夫,毁林开山,动用国家有限的财力,将从宜昌安安庙起到省府所在地韩家坝的20余公里人行小道扩建为汽车公路。石瑛与张难先得知后怒不可遏,与柳克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于1939年元月向严代主席提出辞去省府委员的职务,以示抗议。

“你害百姓！”

石瑛任南京市市长时,当行政院长汪精卫要免去朱怀冰湖北省民政厅长职务时,石瑛站出来为朱怀冰说话。说朱干得很好,为什么要免职,质问得汪精卫哑口无言。

1943年初,已是湖北省代主席、民政厅厅长兼省粮政局长的朱怀冰,在省临时参议会全体议员会议上作湖北省的粮政报告并接受议员质询。议员们纷纷揭发各地的粮政弊端及粮政局官员的腐败贪污问题,问得朱怀冰瞠目结舌、支吾其词无法自圆其说,竟然推卸责任地说:“我实在干不下去了!我真不想当这个粮政局长,是没有办法,我才来兼这个局长的。我只能搞到这个样子……”这时,只听“啪”的一声,坐在主席台上正患严重风湿关节炎,站立、步行都很困难的石瑛猛然站起来,双手撑在桌上,怒目竖眉,对代理省主席呼名道姓地大吼:“朱怀冰!谁叫你当这个粮政局长了?老百姓没叫你干,我也没有叫你干,哪个叫你干的?你干不好,为什么还要干?你害百姓!”搞得朱怀冰下不了台、无地自容。副议长胡忠民赶紧站出来转圆,宣布暂时休会,朱怀冰只好灰溜溜地走下台来。不久,朱怀冰的粮政局长职务由上面派来的王冠吾接任。

劝居正生日要节俭

居正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国民党内功勋卓越的元老。胡耀邦总书记曾在报纸上公开说“我们怀念居正。”

居正参与缔造和保卫共和,以后历经事变屡遭挫折。他居官清廉方正,在野则甘于寂寞,堪称

淡泊宁静,在近世政界为不可多得的人物。他同石瑛是情同手足的结拜兄弟,石瑛逝世后,居正痛哭流涕在石瑛家祭时宣读祭文,并手书大幅挽联:“律己以敬,接物以诚,谋国以忠,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君子哉若人,敝德哉若人。”悬挂于石瑛灵堂。

下面一则小故事充分说明他们间兄弟之情的真挚、诚恳、心胸博大、互相鞭策、共同进步。

居正生活节俭,不喜欢铺张。但当他1935年60大寿时,在许多朋友的怂恿下,在私宅举行了盛大的宴饮,庆祝他60大寿。宴会厅里屏联镜架、歌声绕梁、灯火通明、笑语喧飞。石瑛知道此事后,给居正写了封长信,托彭临九转交,对居正祝寿的铺张行为进行劝。居正读信后非常感动,反省自己,并请彭临九向石瑛转达他的歉意。

斥责唐有壬卖国

唐有壬是辛亥革命先烈唐才常之子,汪精卫的亲信。石瑛任北京大学教授时,唐为石的助教,帮助石瑛作了些写作工作。唐有壬对石瑛很敬重,石瑛对唐有壬也很器重,可以说是较好的朋友。1928年石瑛任湖北建设厅厅长时,曾推荐唐有壬为湖北省银行筹委会主任和行长。

1932年蒋汪合作,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唐有壬为外交部次长。当时各派系激烈争夺南京市市长这一要职,汪感到很难办,决定物色政声好、威望高、懂技术的工程技术专家。于是唐有壬向汪精卫极力推荐石瑛出任南京市市长。蒋介石对石瑛素来敬重,于是石瑛出任南京市市长。

可是石瑛认为唐有壬是汪精卫的得力助手,走的是媚日的投降路线,每见到唐有壬,便声色俱厉,骂唐卖国无耻。见一次骂一次,唐有壬非常怕石瑛,见到石就躲避,不敢见石瑛的面。石瑛对老百姓和蔼可亲,急人之急,被视为“布衣市长”、“土老儿”、“可亲可敬的长者和朋友”。他历任要职,可谓高官厚禄。可是他布衣粗食,坐车坐三等、乘船坐统舱。他廉洁奉公、安贫如素,不拿公家一针一线,被誉为“民国第一清官”。他病危时对家人说:“我是不同流合污。我如同流合污不至如此,但我还能如此,是他们把我无法。”

(责任编辑 吴思)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始末』

● 李
晓
航

在1967年3月至8月间,北京出现了一个秘密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简称“五·一六”),其宗旨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指国务院)。”这个组织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中央《“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他们提出:“《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等口号,组织策划了一系列的反周活动,引起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度重视,最终导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这个清查运动在打击真正的“五·一六”的同时,也把许许多多无辜的干部、群众打成了“五·一六”,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一、“五·一六”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前身是“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它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明目张胆地炮打周恩来。这个组织共有八个方面军,设有总指挥部、作战部、情报部等一整套组织机构,其成员主要分布在北京十余所大专院校。其主要活动方式是秘密散发传单,趁夜深人静时,在交通要道、闹市区张贴反对周恩来的标语和大字报。

这个组织是在反击“二月逆流”的背景下产生的。1967年,“二月逆流”发生后,社会上掀起了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浪潮,同时也出现了一股“炮打周恩来”的思潮。3月22日至23日,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钢院学生、“革造公社”成员张 Jian 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攻击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以来和中央讲话口径不一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刘邓陶想复辟并不可怕,更阴险更可怕的是包庇刘邓陶复辟的人。”声称:“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分钟起就打算坐牢”等。这股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当即遭到一些群众组织的反对,张 Jian 旗受到当时钢院九一九红旗战斗队的揪斗。张 Jian 旗拒不认错,还发表公开声明,坚持炮打周总理的立场。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张 Jian 旗等人转入地下活动。

张 Jian 旗是北京钢铁学院炮打周恩来的急先锋。他的父亲是原林业部副部长、东北林业总局局长兼党委副书记,“文革”开始后被打成“黑帮”。他的母亲是原黑龙江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后被打成“坏干部”,受到揪斗。或许由于这样的家庭背景和遭遇,造成了张 Jian 旗极端的性格。

5月1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全国掀起了大批判的新高潮,在极“左”思潮的推动下,社会上进而出现了“再抓一小撮”、“《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革命

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等论调。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些学生打着贯彻《五·一六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此后,北京街头出现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与此同时,江青趁火打劫,她试图利用社会上的反周逆流进一步攻击周恩来。5月18日,她将南开大学红卫兵送来的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材料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周恩来为此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伍豪启事”纯系伪造。毛泽东阅后批示:“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5月29日,毛泽东针对最近掀起的攻击周恩来的浪潮,在一份来信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毛泽东的批示否定了反周逆流。康生看到

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中央文革派出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张建旗等人对中央文革的表态拒不理会。6月2日,他同“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中的几名反周分子经过一番串联、组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会,会上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把张建旗两个月前写的《给周总理的一封信》抄成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大字报称周恩来是“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搞资本主义复辟”。其同伙在钢院、商学院、体育场等地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23个为什么?》,说毛泽东又要掀起一个“炮打司令部”的高潮,“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他们串联具有反周倾向的人,加紧扩展反周组织,从事反周活动。

针对少数人对周恩来越来越猛烈的攻击,6月3日,陈伯达、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再次对“五·一六”发出警告:“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次日,中央文革成员的“六三”讲话传到钢院,张建旗等人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佯装退却,以守为攻,继续在暗中策划更大规模的反周



“二月逆流”发生地——中南海怀仁堂

活动。

6月14日,北外“六·一六兵团”的头目刘令凯与张建旗等人在北外成立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30日至7月2日,“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北外五楼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这个组织有一整套组织机构,上有总部,下有特务连、情报组等。还成立了所谓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农林口、财贸口、文教口、公交口、军事口、外事口、中学、全国通讯联络站等八个方面军,并推选了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个阶段的作战方案。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许多未公开发表的党史资料,能及时得到全国各方面的动态情报。

7月上旬,“五·一六”在财贸口和农林口开始所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周围散发传单,在水产部、农业部、林业部、农科院、气象局等地贴出《告农口革命战友书》等传单和标语。

7月29日,唐亦安、郭海燕等4名“五·一六”成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散发传单《20个为什么》,当场被抓,被扭送公安机关。“五·一六”立刻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24小时内把被抓的4人放出”。8月8日,被抓的4名“五·一六”成员经教育后被公安机关释放。但这4人声称“观点不变,还要干”!

8月9日,“五·一六”开展了一个所谓“八·九战役”,他们派出一大批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的题目有:《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等。这些传单和标语均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还向北京大专院校和湖南、湖北、广东、新疆等地邮寄传单,在城里挨家挨户塞传单。8月12日至15日,“五·一六”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三天“火线会议”。会后发表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政治部给各军负责同志的信(对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这封信声称“八·九战役引起了全北京、全中国的注视,两个司令部对八·九战役也都极

为关注。因此,八·九战役主流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影响是巨大的,作战是成功的。”针对中央文革对“五·一六”的表态,信中分析了中央文革当时表态的条件和环境,认为不过是一些“外交辞令”,“中央文革首长对我们这个大方向问题没有否定”,“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中央文革号召百万群众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多思,难道不是对周恩来之流最有力的回击吗?”“更重要的是:江青同志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怀疑有一只黑手,这只黑手不仅伸到革命小将那里去了,还来打我们的主意,他们肯定要失败,搞小将也是要失败的。’”“这样看来,中央文革是在指我们不应该依靠少数人的奋斗,而应该动员和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不应当以地下斗争为主,而应当以建立红色根据地为主。”

二、“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号召打垮“五·一六”

当“文革”进行到8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两件大事,导致批判锋芒从批判走资派暂时转向批判极“左”思潮。

第一件是《红旗》杂志第12期借纪念建军节之机,发表了《红旗》编委林杰执笔起草、关锋审定、陈伯达签发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针对武汉“七·二〇”事件,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并点明“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这篇社论在《红旗》发表的同时,7月30日由新华社播发,“八一”建军节那天刊载于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影响甚广。这期《红旗》杂志还转载了林立果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的名义发表在7月22日《解放军报》上的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位空军司令部的“红尖兵”在文中号召:“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把他们彻底粉碎。”《红旗》杂志这篇具有蛊惑性的社论发表

后,激起了各地造反派新一轮的夺权欲望,全国普遍刮起了“抓军内一小撮”的恶浪,使解放军受到猛烈冲击。从中央军委、解放军三总部到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军内大批领导人被当作“陈再道式的人物”受到揪斗。有的造反派公然在小报上刊出所谓“军内两个司令部”名单,把贺龙、叶剑英、徐向前等列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他们冲击军事机关,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截取援越军用物资,接连发生“温州事件”、“南京事件”、“常州事件”等恶性事件,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也不断发生大规模流血武斗。社论发表后一个月,仅湖北省军区被抢走的枪械就达八万支。

第二件是,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发表了直接针对周恩来的“八·七讲话”,煽动外交部的造反派姚登山夺外交大权。8月7日,王力公然反对周恩来“外交部的业务权是中央的,不能夺,只能监督”的指示,对姚登山等人说: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还说,红卫兵就不能办外交?在王力讲话的鼓噪下,外交部的造反派有恃无恐,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一直由周恩来掌握的外交部落入造反派手中。他们擅自向驻外使馆发命令,向外国驻华使馆提抗议、照会。又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围攻苏联驻华大使馆,制造了一系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

这两件事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令他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整党内走资派,是整“刘邓路线”。但8月份发生的这两件事却把矛头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动摇了斗争的大方向,扰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全国党政机关处于瘫痪和打倒刘邓未获全胜的情况下,如不遏制“揪军内一小撮”和反周活动,势必要出大乱子。毛泽东看了《红旗》第12期社论后批示:还我长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不同场合指出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他说:“无论如何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7月20日后提到抓军内一小撮,这是我们宣传机构搞错了的一句口号,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了。”8月26日,毛泽东下令把王、关、戚抓起来。

指出:他们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并对王力“八·七讲话”批了五个字:大、大、大毒草。指示:“不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并提,只提党内一小撮。把解放军搞垮了,还要不要政府?”8月30日,掌握舆论大权、曾不可一世的王力、关锋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被关进秦城监狱。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垮台,使中央文革遭受沉重打击。王力、关锋被抓后,外交部王海容等十人贴出大字报《王力八·七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指出“八·七讲话”的矛头是针对周总理、针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明目张胆地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大唱反调,将总理的军,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军。

王、关、戚的问题解决之后,在毛泽东看来,“五·一六”同王、关、戚一样,是一丘之貉,不听招呼,自行其是,是一股异己力量。“五·一六”在组织上虽然与王、关、戚没有直接联系,但二者针对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都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一大批老干部。“五·一六”兵团之所以毫无顾忌地提出打倒周恩来,显然与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纵容、支持不无关系。1967年2、3月间,戚本禹曾公开说:毛主席司令部只有五个人,这五个人是主席、林总、伯达、康生、江青。公然把周恩来排除在“毛主席司令部”之外。

显然如果让“五·一六”思潮继续蔓延,势必冲淡对“刘邓路线”的批判,动摇军权。因此,毛泽东向造反派发出号召: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垮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毛泽东后来在1970年5月11日会见黎笋时,谈到了打击“五·一六”的原因。他说:“……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

毛泽东发出打垮“五·一六”的号令后,中央文革不敢怠慢,立即开始行动。8月10日至11日,中央文革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造反派组织开会,指出“抓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并第一次提出打倒“五·一六”的口号。陈伯达对造反派们说:“还有一个叫‘五·一六’的秘密组织,不知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着周总理,

实际上对着中央,对着周总理也是对着中央。你们知道吧?能不能批判啊?(众说:打倒!)打倒!”

在中央文革的号召下,北京地区开始组织打击“五·一六”。8月14日,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了“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公交口、财贸口、外交口、高教口、中学口等分站。8月17日,“五·一六”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8月18日,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76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决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8月20日,“五·一六”的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师大“井冈山”揪出了“五·一六”的干将陈立。8月25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的“五·一六”成员九人,缴获五四手枪两支、子弹104发以及大批材料。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捣毁了“五·一六”的大本营——北外“六·一六红卫兵”,抄出大批材料。8月26日下午,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武汉“钢二司”等全国1400多个造反派组织的两万多人,在钢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个“五·一六”头目在大会上被揪斗。至此,“五·一六”全面崩溃,成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对象。

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分别讲话。康生在会上提出,“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的司令部,有的人不自觉地上了当,帮了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立即镇压,要逮捕起来。谢富治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他说:最近毛主席讲,学生应该联合团结起来对付反动组织“五·一六”。9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9月2日讯《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指出:“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9月5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她在分析形势后,指出目前要注意三个问题:一、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从极“左”、从右边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二、要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不要上这个



“文革”中张贴在北大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当 ;三、要拥护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 ,它是新生事物 ,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它。她说 :“ ‘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 ,你们要提高警惕。”9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组织收听江青“九·五”讲话录音。23日 ,经毛泽东批准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安徽“P派”与“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的“九五”指示》。

关于打击“五·一六”的政策 ,周恩来在1967年9月16日晚接见部分大专院校代表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第一 ,对“五·一六”不应扩大化。“五·一六”就是靠造谣 ,阴谋活动 ,除此之外 ,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批。第二 ,你们学校各组织真有这样的人 ,你们应划清界限 ,由本组织自己揪出坏头头 ,这样我们欢迎。第三 ,“五·一六”的头头揪出来了 ,不要因为有几个坏头头就认为群众都不好 ,把群众都推到对立面了。这是群众斗群众。第四 ,“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貌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 ,从内部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一个口吻 ,如果谈什么事都是一个口吻 ,那就一个讲好了。11月3日 ,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接见冶金部、煤炭部军代表等的讲话时 ,也同样强调了周恩来不要扩大化的意见。然而 ,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却出乎周恩来、李富春等的预料。

三、全国清查“五·一六”分子

1967年9月7日晚8时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次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 ,就打击“‘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问题加写了一段话 :“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 ,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 ,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挑拨离间 ,混水摸鱼 ,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 ,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

是两个 ,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 ;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章说 :“这个反革命组织 ,不敢公开见人 ,……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 ,写标语。”“对这类人物 ,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 ,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 ,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 ,看一看他们的历史 ,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现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这篇文章从批陶铸到批“五·一六” ,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要在全国彻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实际上 ,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 ,“五·一六”已被彻底摧毁。这篇文章的发表 ,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步骤 ,其锋芒所向 ,已不单单是一个小小的“五·一六” ,而是清理“五·一六”思潮和揪所谓幕后“反革命的黑手”。关于这一点 ,谢富治在9月10日接见中学代表时 ,明白无误地说 ,“五·一六兵团是反动组织 ,我看大街上有人喊 :打倒‘五·一六’ ,小小的组织也用不着游行。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 ,人数不超过50人 ,这50人中间很多是十几岁的娃娃 ,主要是有后台老板。”

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关于打击“五·一六”的指示大做文章 ,极力把清查“五·一六”运动推向全国 ,搞扩大化 ,以证明反周恩来的人很多 ,为他们以后的“倒周”制造影响并打下基础。江青说 ,这篇文章是颗重磅炸弹 ,文章出来后 ,要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在这场清查运动中 ,一切所谓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林彪、江青等人和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有所怀疑或持有反对情绪的人 ,都被称作“五·一六”分子 ,打入万劫不复之地。1968年 ,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 ,陈伯达任组长 ,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在全国开展了长达数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扩大化竟然扩大到了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身上。周恩来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二人被一位国务院机关的干部“咬”成“五·一六”分子。周恩来得知消息后 ,当然不信 ,说只凭一个人的口供 ,就给别人定性 ,不可靠。“老张(树迎)、小高(振普)在我这里工作多年 ,从他们的工作表现

说他俩是‘五·一六’我不信。”清查“五·一六”运动,不仅把反对林彪、江青的许多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冤屈了大批无辜,同时又演变为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出“新的指示”。林彪号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也大声疾呼,要彻底清查“五·一六”。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进一步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

3月27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根据这个通知精神,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县革委会纷纷发出文件,成立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层层举办专案人员学习班,要求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动群众,号召广大群众迅速掀起一个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检查、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打一场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人民战争。有的地方在清查过程中,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确定清查的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事件、重点人物,重点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这一清查运动成为派性斗争的继续,愈演愈烈。有的地方把“文革”中出现的问题,说成是由于“五·一六”的破坏,把一派群众组织干的错事当作“五·一六”反革命罪行来清查,将一些平日“有问题”的人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五·一六”分子成了一个“筐”,可以将任何有“问题”的人都往里装。

由于对什么是“五·一六”没有界定明确的标准,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江青等人规定,凡有三指向之一的便是“五·一六”分子,即把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包括林彪、江

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对三支两军的解放军个别人员,对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不满或有不同意见的人,统统打成“五·一六”分子,给清查的领导者以极大的随意性。有些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互相攻击,互指对方为“五·一六”分子。清查运动越清越大,“五·一六”分子越清越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被列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更为荒诞的是,竟然把解放军高级将领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混在一起,也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身为公安部部长、“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副组长的李震,也因此自杀身亡。

10月,毛泽东作出批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翌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专案联合小组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组员有13人。《决定》指出:在清查过程中“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此后,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更加“深化”。“九·一三”事件后,清查工作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要求继续清查。例如,1972年7月4日至8月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召开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重点学习了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等文件,接着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在会上强调:各地根据区党委的部署,在进行路线教育的同时,认真抓紧阶级斗争,打击利用林彪叛党叛国事件进行破坏活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继续抓紧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开展社会清队工作。这表明,清查“五·一六”的对象已不仅仅限于清查“五·一六”本身,清查工作远远超出了这个组织的范围,实际上成了打击异己分子的一种手段。这场清查运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才不了了之。

(责任编辑 吴思)

中东路事件：1929 年的中苏之战

● 王维远

1929 年,在我国东北发生一起历时半年、震惊全国、轰动世界的中东路事件。对于这一重要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

一、中东路的由来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中国,翌年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同意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但这一规定遭到对东北早已垂涎三尺的沙俄反对,于是俄国勾结德国、法国强迫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紧接着,俄国便寻找机会向清政府索取报酬。1895 年冬天,俄国迫使中国给予俄舰到胶州湾“过冬”的权利。1896 年夏,沙俄政府邀请清政府派使臣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李鸿章作为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率团前往。加冕典礼结束后,经过俄方的精心准备,李鸿章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举行会谈,并在当年 6 月 3 日签订了《御敌相互援助条约》,又称《中俄密约》。条约共 6 款,其主要内容有:清政府允许俄国从赤塔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可以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地区;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都可以用该铁路运输军队、粮食及军需品;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对俄国军舰开放;修筑铁路的款项,由俄国的华俄银行承办。6 月 4 日,维特亲自批准了由华俄银行对李鸿章给予 300 万卢布的行贿密件。7 月,中国政府批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9 月 8 日,清政府驻俄公使许景澄与俄国财政副大臣罗曼诺夫在德国柏林签订了《国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该章程共 12 款,主要内容有:成立东省铁路公司,清政府以库平银 500 万

两入股,该公司所占地段均属官地,不纳税;从铁路建成通车之日起,80 年内铁路所得利益归该公司专有,80 年后由中国政府收回。

根据以上规定,从 1897 年起开始修建西从满洲里起,中经哈尔滨,东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1898 年,俄国又强迫清政府同其签订了租借旅大条约,强占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水域,并取得了修筑中东路支线(从哈尔滨到大连)的特权。1900 年,中东铁路(当时称东清路)建成。1903 年,哈大铁路通车。纵横东北全长 2800 余公里的东省铁路的建成,使沙俄达到了把势力伸向中国东北的目的。

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为日本所嫉恨。东省铁路的建成更使日本气急败坏。于是 1904 年便发生了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取得了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使用权,满洲里至绥芬河、哈尔滨至长春的中东铁路仍控制在沙俄手中。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中东铁路仍为沙俄残余分子所把持。原中东路局长、白俄分子霍尔瓦特,在国际帝国主义支持下,宣布中东路及其附属地“独立”,并纠集远东地区的旧俄势力组织和扩充武装。与此同时,时刻企图独占东北的日本,于 1918 年 5 月与中国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签订共同防敌协定,想借出兵西伯利亚之机,利用和吞并中东路。但日本的阴谋为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所不允许。后经美国提议,中东路从 1918 年夏天开始,由中、俄、日、美、英、法、意等 7 国“共同监管”。但这种局面维持没多久,就随着西方国家干涉俄国革命失败而结束了。

1917 年革命后建立的苏俄政府,曾于 1919

年和1920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声称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作废,放弃俄国在华一切特权;关于中东路问题,提出经两国协商“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条约”。但由于当时北洋政府忙于内战,加之不承认苏俄政权,因而对这两次宣言未作答复,使中东路仍处于沙俄分子与中国的“共管”之下。

1923年,政权逐步巩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苏联政府,提出与中国北洋政府进行谈判。1924年5月31日,中苏双方达成建交协议,并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其主要内容是:苏联方面废除沙俄时代签订的一切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放弃一切租借地、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及庚子赔款等;中东路纯系商业性质,由两国共管。与此同时,两国还签订了《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就如何管理中东路,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包括:设立中东路最高议决机关理事会,理事长为中方人员,副理事长为俄方人员;铁路局是业务机关,设局长1人,由俄方担任,副局长2人,中俄各1人,正副局长由理事会委派,由各国政府核准;路局各处正副处长由理事会委派,如处长为俄人则副处长为华人,处长为华人则副处长为俄人;路局各级人员构成的原则是双方各半。由于中东铁路处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统治区域内,同年9月,苏联又与东北当局签订了《奉俄协定》,这一协定除说明要贯彻上述中俄协定的有关内容外,又规定把中东路收回的时间,从过去的80年缩短为60年。应当说,上述的两个协定,即《中俄协定》和《奉俄协定》,在当时符合中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是平等条约。

二、中东路事件的发生

1927年下半年,苏联政府在日本“满蒙”政策的刺激下,特别是慑于中国日益高涨的收回中东路主权的强烈呼声,为保持其在中东路的实际



1929年7月,蒋介石与张学良在北平北京饭店会晤,商谈收回中东路问题

利益不受侵害,准备把中东路转让给日本。同年10月中旬,中东铁路苏方副局长到大连,与日本南满会社社长山本条太郎进行秘密会谈,并签订了《中东路草约》。草约内容包括:日本令南满社办理中东路;日苏两国共同反对中国收回中东路;南满社准许苏联派兵保护中东路北段,但以5600人为限;中东路与乌苏里铁路优待日货运输;中东路先将松花江南岸让与日本南满社,一年内实行;日本在内蒙及北满铺设铁路,苏联应协助之,并由苏联政府派工程师会同日方人员规划一切;日苏在外蒙利益,两国以均等为原则,协商进行;西伯利亚、黑龙江之森林、煤、铁、油矿等,苏允日本开采,等等。苏日两国抛开中国,秘密制定危害中国主权的协定,这是一个极端蔑视中国,露骨出卖中国权益的恶劣表现。

《中东路草约》虽是秘密签订,但消息不胫而走。中国政府得知后,颇为惊讶,向日本询问此事。日方辩解说:“苏联所让者为属于俄方之权利。其属于中国方面之权利,依然存在,绝对不受日俄让渡之影响。”从以上可知,当时的中东铁路随时有被苏联转让给日本的危险。就在这种背景下,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于1929年夏先后派军警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并接收了中东路,从而引发了中国现代史和中苏关系中有名的中东路事件。

1929年5月27日,哈尔滨特区警务处长米

春霖接到密报,指称“苏联将在哈尔滨领事馆召开远东党员大会”。经特区行政长官批准,米氏率队搜查了领事馆,在地下室逮捕了39人,同时搜出并扣押了大批文件。被捕人员中,除有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库兹涅佐夫外,多数是中东路的重要职员和各联合会、局的经理或委员。一个半月后的7月10日,又发生了“收回中东路权”事件,东北当局将苏方局长、副局长等59人驱逐出境,并同时查封了苏方的有关单位。

东北当局为什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作出两件如此强硬的举措呢?按着他们自己的说法,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

第一,苏联利用中东路进行违背协定规定的政治活动,为中国方面所不允许。

1924年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中俄协定》第六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互相担任,在各该国境内,不准有为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种机关或团体之存在及举动,并允诺,彼此不为与对方国公共秩序、社会组织相反之宣传。”但东北当局认为,苏联方面在实践上未遵守诺言,而是不断在中东铁路宣传“共产”、“赤化”,而且说在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搜出的材料中,有“破坏中国统一……宣传赤化,助长内乱的证据”。对于7月10日事件,张学良于7月25日同美国记者鲍威尔这样说:“中国人民乃爱和平、重公道之人民,尤不愿用强权。此次之事,实缘俄人利用中东路为宣传赤化之根据地,东路许多重要俄职员,皆与赤化运动有关。两次发觉,证据确凿,中国当然不能允许,乃迭请理事会同意更换此等赤化有关之俄员,而俄方终不之理。乃取断然处置,仍以代理名义,委派继任之人,以明系属暂局。”

第二,在管理中东路过程中,苏方大权独揽,引起中国政府极大不满。

《中俄协定》第九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并声明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属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但在具体运行中,苏联方面通过各种手段实际上控制了中东铁路。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有些舆论说东北当局的

行为破坏了1924年的中俄协定。对此,张学良于1929年8月25日在对中外记者谈话中指出:“外人对东省此次举动,所多误解,认为系收回东路,破坏条约,实则吾人决无破坏1924年中俄协定、奉俄协定之意,因中国既经签字,决不愿破坏之”,“中国并无根本收回该路之意,所求是在免去此等运动赤化之俄员职务而已。且此次之事,中东路乃其极小问题,真正要点完全在俄人以中国作赤化根据,吾人不得不为自卫之处置。”

三、中苏大规模武装冲突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苏联外交当局于1929年7月13日表示强烈抗议,并提出立即召开会议处理中东路有关问题等3项建议。7月17日,东北当局发表通牒,内称“苏联的中东路各机关为其赤化中心,依《奉俄协定》之规则,我国于中东路应有收回之权力”,“本月10日关于行政方面之执行事项,若解散铁路职工会,封存路局地亩,实行正副局长会同签字权,平均俄华用人权,皆于中东路有直接关系者也……而我于执行者,亦只强迫其履行协定,而非无条件之没收也。”苏方对中方的答复十分不满,遂于18日发出第二次通牒,并声明同中国绝交。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决定,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开始在中苏边境集结军队。

8月6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为配合苏联阿穆尔河(黑龙江)舰队对中国军队作战,组建远东特别集团军,重新起用熟悉中国情况、曾担任国共合作时期广东政府军事顾问的布留赫尔(加伦将军)为集团军司令官,司令部设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8月13日,苏联兵舰两艘,陆战队员300人,飞机两架,侵入黑龙江省绥东县境。从此,中苏边境冲突不断发生。

8月15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动员东北军6万人,组成“防俄军”。以王树常为第一军军长,兼任东路总指挥;以胡毓坤为第二军军长,兼任西路总指挥;以周濂为预备军军长。8月16日张学良在接见美国《芝加哥日报》记者时宣称:“苏俄不顾国际信义,蹂躏非战公约,贸然遣兵,侵入我国境内。我们尊重非战条约,屡次

退让,以明开衅责任。俄方如再进逼,是甘为戎首,故已准备一切,当出全力,决一死战。”

中苏大规模武装冲突从1929年10月中旬开始,持续近两个月。战争分东西两线,两个战场。东线主要发生在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处的同江、富锦地区和黑龙江东部的密山地区;西线集中在内蒙古的满洲里和海拉尔地区。

大规模军事冲突首先从东线开始。在东线,苏军的主攻方向不在铁路上,而是要溯松花江西下,直达战略要地哈尔滨。东线主要有3次战役。

①三江口战役:三江口位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汇合处一带。10月12日早晨5时,苏联军舰8艘突向东北海军和三江口海军陆战队进攻,东北海军还击。激战1小时后,苏联飞机18架前来助战,向东北舰队投掷炸弹。战至中午,东北海军江平、江安、江泰、利绥、东乙号军舰和兵船中弹沉没,200余官兵殉职。苏联军舰被击沉3艘、击伤4艘,飞机被击落2架。

②同江战役:同江位于松花江与黑龙江汇合处。此次战役与三江口海战同时进行。10月12日苏军一面向三江口东北海军进攻,一面进袭同江县城。当三江口东北军舰被击沉后,苏军便集中火力进攻东北海军陆战队及陆军战线。参战的苏军不仅有飞机、军舰,还有步兵、骑兵,并附以机关枪和山炮。战斗中,东北军损失惨重,伤亡官兵500余人,海军陆战队队长李润青阵亡。

下午3时,东北军放弃同江县城,三江口江防亦随之不守。

③富锦战役:富锦位于松花江下游南岸。10月14日,东北军在收复同江的同时,把同江至富锦的河道封锁。为防止俄军侵入,又先后把6只拖船、2只商船和2艘军舰沉入江底。30日晨8时,苏军飞机10余架飞抵富锦上空,向东北军舰和陆上机关进行轰炸,东北军虽然作了还击,但损失严重,不得不实行退却。苏军趁东北军退却之机,破坏拦江防线,清除江中障碍。31日上午10时,苏军集中军舰7艘,飞机9架,步骑兵3000余人,各种炮80余门,机关枪200余挺,全力进攻富锦,经激战,于当日晚6时占据富锦。

就这样,经过三江口、同江、富锦3次战役,苏军连连得手,东北军节节败退。11月初,北方天寒地冻,江水结冰,苏联军舰退往哈巴罗夫斯克,其步兵、骑兵也从陆路返回,东线战事基本结束。

西线的主要战场在满洲里与扎赉诺尔一带。从1929年8月起,这里的冲突接连不断,发生大小战斗100余次,苏军侵入中国内地百余公里。进入11月,战事升级,主要有如下3次战役。

①扎赉诺尔战役:扎赉诺尔位于满洲里以东



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孙科到沈阳,鼓动张学良对苏开战。这是张学良(前排左)与孙科(前排右)及东北要人在帅府门前合影

的中东铁路线上,东北军第17旅在这里驻守。11月17日晨,苏军在远东集团军司令官布留赫尔指挥下,以一个师以上的兵力,大炮60门、飞机20余架,并配以坦克、装甲汽车等现代武器,大举进攻扎赉诺尔。与此同时,苏军以相当兵力包围满洲里,以少部分兵力进袭扎赉诺尔以东的嵯岗站,以阻断东北军的后援。东北军拼死抵御,与苏军激战两昼夜,损失惨重,遭致失败。此役,东北军伤亡2000余人,旅长韩光弟、团长林选青阵亡,团长张季英重伤后自杀,另一团长何双奇率余部1200余人突围退出。19日,苏军占领扎赉诺尔。

②满洲里战役:满洲里位于中东铁路最西端,是通往苏联和外蒙的必经之地。11月7日,苏军开始轰炸和围攻满洲里。东北军第15旅英勇还击,坚守阵地。扎赉诺尔战役打响后,第15旅企图突围东援第17旅,但未成功。不久,攻占扎赉诺尔的苏军转向西进,第15旅陷入重重包围之中。东北军拼死抗争,伤亡日增;在孤立无援、弹尽粮绝之时,向南突围,复遭苏军堵截,结果以失败告终。此役,副旅长魏长林阵亡,旅长梁忠甲以下8431人被俘。

③海拉尔战役:海拉尔位于扎赉诺尔以东的中东铁路线上,是内蒙古北部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苏军在取得扎赉诺尔和满洲里战役胜利后,曾威逼驻守在海拉尔一带的东北军步兵第1旅和骑兵第3旅放下武器,但遭到拒绝。于是,苏军特别组建了由装甲列车和搭乘军列、汽车的步兵构成的快速集群。11月23日,苏军向海拉尔发起总攻,东北军坚决抵抗,双方伤亡极重。当日,苏军占领了海拉尔以西的嵯岗站。苏军不断增援,并有飞机配合,东北军渐渐不支。25日,苏军占领海拉尔。

从1929年8月开始的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中经几次大规模战役,到11月下旬,以东北军的惨败而告结束。“防俄战争”的失败,苏军装备优良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与东北军自身存在的弱点也有直接关系。

第一,作为东北军最高指挥官的张学良,对敌我双方的兵力都有错误的估计。中东路铁路督办吕荣寰等人,以“俄国通”自居,曾向张学良提供情报:“苏联内部空虚,边防武装不堪一击,战

端一开,必然土崩瓦解”。对此,张学良信以为真。1929年8月中旬,中苏边境冲突开始发生,张学良不以为然,以为有了东北军这个“王牌”,对苏一切问题都可解决。当年8月19日他在给辽宁省政府的咨文中就流露出了这种思想:“苏俄不知自悟,反以我为无理,逞兵压境,拒绝调停。我东省为卫护国权,巩固边防计,不得不征集兵力,严密防御,以武力为后盾,待最后之解决。”(《张学良文集》上卷第203页)实践证明,东北军不是“后盾”,而是“软肋”,正是因为它的“每战必败”,搅乱了张学良的对苏全盘计划。对军事实力的错误估量,必然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一点,现代中国著名的外交家、张学良的好朋友顾维钧说了一句非常中肯的话:“他(指张学良——引者)只想到一个结局,就是在武装冲突中彻底胜利,而没有想到可能出现相反的结局。”(《蒋介石和张学良》第6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第二,东北军高级指挥员不负责任,消极对待;各部队之间互生芥蒂,缺乏支援。当战事初发时,吕荣寰向吉林省边防副司令长官张作相电请派兵增援东线,张复电竟说“军队没有开拔费”,直等到路局汇来10万元大洋后,张作相才作出抵抗姿态。王树常作为防俄军第一军军长,住在哈尔滨道外新世界大饭店,很少关心“抗俄”问题;而且第一军向东只能到达一面坡,再向前进怕与当地的吉林军发生磨擦。胡毓坤的第二军向西也只能到达海拉尔,以避免同黑龙江军产生矛盾。身为黑龙江省边防副司令长官的万福麟,妒贤嫉能,对在西线奋战的第15旅和第17旅,既不增援,也不补充弹药,作壁上观。

第三,国民党中央政府玩弄了东北军。中苏武装冲突初起前后,蒋介石出于反苏反共需要,曾答应全力援助张学良和东北军。1929年8月13日,南京政府派参谋部军事厅长刘光到东北前线视察国防。15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向蒋介石报告中苏交涉情形,表示坚决收回中东路管理权。16日,王正廷向新闻记者称,如苏兵再侵入,中国将采取强硬的态度。21日,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开会,讨论对苏应付方针及步骤。会议决定请中央资助张学良军费200万元,以后必要时再行补助。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决定组

建对苏总预备队,先集中在冀东滦州、榆关一带,待命出征,以何成睿为总预备队之总指挥。月底,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特派员郭同抵沈阳,与张学良商谈,张表示对苏交涉遵照中央意旨办理。中央政府表示的全力支持,坚定了张学良的抗俄决心。于是,他毅然决定组建“防俄军”,对苏一战。但实际上,张学良受骗了。在几个月的武装冲突中,南京政府只给过200万元资助,除此之外,没有一兵一卒的增援,没有一械一弹的补充。1929年,国民党内矛盾丛生、危机四伏,年初发生蒋桂战争,10月爆发蒋冯战争。最后,蒋介石虽然战胜了对手,但花费了巨额资金,消耗了大量国力,以致于造成国库空虚、经济停滞。面对如此形势和状况,蒋介石还有援助张学良的本钱吗?到头来,南京政府原先作出的“诺言”和“保证”,只能成为一张张的“空头支票”而已。

四、《伯力协定》的签订及中苏会谈的中断

中苏军事冲突结束后,出现一个和平谈判的新局面。1929年11月26日,张学良电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长李维诺夫,要求就中东路事件问题举行谈判。12月3日,双方在苏联境内的乌苏里斯克签订了《辽俄和平草约》,即《双城子草约》。其主要内容为:东北当局将中东路理事长吕荣寰撤职;苏方推荐中东路正副新局长,以代替叶穆善诺夫与艾斯蒙特,但后二者仍要充任中东路其它职务;双方都要遵守中俄、奉俄两协定。12月22日,《伯力协定》签订,其主要内容为:两国息争;俄兵退出满洲里一带,中方解散境内白俄军并驱逐其将领;中东铁路恢复到本年7月10日以前中苏共管状态;彼此释放被俘军民,重开俄、辽领事馆;苏方推荐鲁德、简尼索夫为中东路正副局长;定于1930年1月25日在苏联莫斯科举行中苏正式会议。

《伯力协定》签订后,中苏边境日趋安定,政治空气和缓,东北当局和苏联方面为执行这一协定作了积极工作。

1930年1月4日,张学良电南京政府外交部,报告释放俄侨经过,谓在上年12月31日释放俄侨1544人,并电告苏驻辽宁、哈尔滨领事馆

已恢复,中国驻赤塔代理领事亦回任,并请催促中国驻伯力、海参崴、海兰泡各领事速往复任。5日,中东路中方代表督办莫德惠、理事沈瑞麟抵哈尔滨就职。6日,中东路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开会,讨论依照伯力协定处置去年7月11日以后所用华员问题。并决定即将召开的中苏正式会议将以中东路善后、协定实施、恢复国交、改定商约等4项为中心议题,并建议双方中央政府派员参加。10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宣布,已释放华侨2322人,被俘的东北军第15旅旅长梁忠甲以下8000人亦获释回至满洲里。同日,海拉尔至哈尔滨之间通车,驻黑龙江中苏边境的中国辽、吉两省军队开回原地。13日,中东路由海参崴西开,由满洲里东开之客车均于本日抵哈尔滨。从此中苏边境安宁,铁路畅通,一场为时半年多的纷争基本结束。

《伯力协定》签订后,南京国民政府对中苏《双城子草约》和《伯力协定》与东北当局看法不一,持有疑义。1930年1月10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发表声明,认为伯力预备会议有超出中央规定范围部分,电张学良饬莫德惠来南京当面接洽,并指出中苏正式会议推迟1个月,改在2月25日召开。13日,铁道部长孙科在中央党部的报告中称,政府不承认蔡运所签订之《伯力协定》。南京政府的态度变化,引起苏联方面的强烈不满,并发表声明,认为《伯力协定》不容推翻,中苏会议不能变换地点及迁延。

在苏联政府的强烈坚持之下,南京政府对《伯力协定》逐渐采取和缓态度。2月8日,南京政府外交部发表对苏宣言,准备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正式会议,专门讨论中东路善后问题。至于有关两国通商及其它一般问题,苏联政府可另派代表来华,国民政府愿与之协商。12月15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和国民政府先后议决并下令,特派莫德惠为中苏会议全权代表,解决中东路善后问题。

后来,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加之中国国内情况的复杂和多变,中苏会议直到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的1930年10月才得以召开。但双方在中东路管理权限、中国赎路等问题上分歧较大,迫使会议时断时续,毫无进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迅即占领东北。随着张学良军

队撤退关内,东北沦陷,关于中东路的中苏会议已无法进行,被迫停止。

五、中东路后期的曲折经历和彻底回归

1932年初日军占领了整个东三省。对于日本的侵略行径和中国人民的反日战争,苏联政府当时分别给予了谴责和同情。苏联当局一再声明,“绝对否定军事占领政策”、“尊重他国的主权与独立”、“尊重与中国签订的国际条约”。伏罗希洛夫元帅甚至警告日本说:“日本侵犯中东路权利时,苏联在相当范围内不得不采取防止手段。”1932年,苏联还恢复了因中东路事件而中断的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苏联的上述立场并未坚持多久。1931年底,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公然对日本侵华问题表示“采取严正不干涉的政策”。

1932年3月,日本卵翼下的“满洲国”成立。不久,在日本和伪满的压力下,苏联政府表示,确认满洲国政府对中东路的主权,苏联政府和满洲国政府共同经营中东铁路。从此,中东铁路由中苏共管变成了苏“满”共管,苏联实际上承认了“满洲国”。中东路苏“满”共管后,由于日本不断运送军队、军火,日、“满”方面经常制造事端,致使中东铁路收入锐减。面临这种不景气的未来,加之日、“满”的胁迫,苏联政府于1933年5月初正式向日本提出出售中东路。这种出卖中国主权的行径,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中国政府分别于5月9日、5月14日、6月25日连续三次发表声明,表示抗议。苏联政府置中国立场于不顾,从1933年6月下旬起同“满洲国”进行售路谈判。谈判伊始,苏方索价2亿5千万金卢布(每卢布值1.40美元),伪满给价5千万日元(每日元值0.23美元)。由于双方出价差距悬殊,加之日本内部对收买中东铁路存在分歧,并在中东铁路制造事端,逮捕苏方人员,使苏、“满”谈判两次中断。后经日本调停,双方反复讨价还价之后,于1935年3月下旬,苏、“满”签订了《满洲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关于将北满铁路(中东铁路)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权力让渡给满洲国的协定》和《最

后议定书》。根据上述规定,苏联政府以1亿4千万日元的价格,把中东铁路上的一切权力让渡给“满洲国政府”。

1943年底,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开始商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的“交换条件”。英国首相邱吉尔曾提出,因涉及中国问题应让中国领导人参加,但遭到斯大林断然拒绝。1945年2月,上述三国首脑会议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召开,苏方仍不准中国领导人参加。在这次会议上,苏联除提出外蒙“独立”、租借旅顺军港、使用大连商港外,还想重新占有和使用中国东北的中长铁路(包括原来的中东路和南满路)。在苏联的坚持下,加之美、英两国为牺牲中国利益换取苏联出兵东北,减少美国损失,雅尔塔会议最终签订了反映上述内容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协定》,即《雅尔塔协定》。这是世界强国为进行肮脏交易,严重损害我国权益的典型事例。因这个协定涉及中国主权问题,同年6至8月,中苏两国举行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代表团成员有蒋经国等。苏联代表团有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关于中东铁路,苏联方面一开始就提出该路应由中苏共同所有、共同使用,而且苏联应先成为所有者,以苏联为主进行管理,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必须均由苏联人负责”。在苏联强硬态度下,中国作出了让步。苏联已于1935年把中国的中东铁路“出售”给了日本扶植下的“满洲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这条铁路理应完全归还中国。但苏联政府竟然不顾这一历史事实,无视中国主权,以胜利者的姿态,凭借大国的地位和实力,把中东路和南满路从日、“满”手中夺回,重新攫为己有。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条约规定,苏联政府把管理中长铁路的权力和该路的设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过了两年多,1952年12月31日手续办理完毕,从此中东路和南满路(即中长路)彻底实现了“回归”祖国。

(责任编辑 吴思)

北洋政府代表拜会列宁

● 张奕曾

理不可；有代表来可以谈谈，这有益于两国之间的关系，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让他们快来吧！列宁破例亲笔给苏维埃外交部写了条子：可以让中国代表团现在就来。

中国代表团终于在1920年9月5日到达莫斯科。苏方给代表团以非常友好的待遇，为他们安排了房子，派了联络员和服务员等，还拨了汽车以供随时使用。苏外交部在同张代表会谈时热切希望同中国建立邦交，早日同中国订立友好协定，并要求立即同张代表进行谈判。张代表将苏方的愿望详细电告了政府，可是北京来电却指示他：切勿谈判，立即离俄回国。不仅如此，还通过驻伦敦公使正式通知苏俄驻英商务代表完全否认曾授权代表一事，说张将军是以私人身份到莫斯科去的，并无资格代表政府进行任何谈判。实际原因是列强各国已听到代表团赴苏俄一事，对北洋政府发了火。尽管如此，苏方没有改变对代表团的极友好态度，劝张代表不要急于启程回国，可以在莫斯科参观，还可以去彼得格勒看看。10月31日苏维埃人民外交委员（部长）设宴为张代表饯行。这

次宴会是苏外交部首次为外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的，是一次完全照欧洲传统形式安排的正式宴会。在离莫斯科之前，张代表和几位随员拜会了列宁。列宁同张代表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1月初，中国政府代表团由莫斯科乘自己的专列到了彼得格勒。在那里参观几天后，于11月中旬启程回国。因为当时铁路交通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张代表一行到12月中旬才到达中国边境的满洲里站。张代表结束了对苏俄新旧两首都的访问，并圆满地完成了同苏政府进行初步会谈的任务，同时将苏外交部10月2日写给中国外交部的一封信带回中国。这封信就是后来在国内被称为“第二次对华宣言”的文件。

（责任编辑 吴思）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曾多次表示，要废除帝俄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在华特权，并准备在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中国建立新的关系。为使中国人民了解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华政策，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先后两次发表了对华宣言。

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后，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赞扬。在人民的压力下，1920年5月，以徐世昌为总统的北洋政府派出了以张斯将军为首的中国军事外交代表团，这是十月革命后首次派到苏俄的中国代表团。慑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威胁，北洋政府未赋予张代表进行正式谈判的使命，只是希望他看看苏俄的一般情况，如有可能，也可以非正式地同苏政府人员谈一谈，听听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当时，北洋政府对外只宣称张代表此行是前往远东共和国首都上乌金斯克（现在的乌兰乌德），是为了救济当地的华侨，事先也没有向苏政府打招呼。按照中国政府的意思，张代表到达上乌金斯克后，应当由他自己想办法同苏政府联系，取得去莫斯科的同意。

代表团乘的是哈尔滨直达莫斯科的中东铁路专列，随同张代表的除了几位秘书、随员外，还有整整一个排的武装卫队。到上乌金斯克，张代表即向苏方表示了要去莫斯科的愿望。可是由于没有接到中方政府的任何通知，给中国外交部去电报又没有得到回电，苏方没法答应这个要求。为此，当时在苏俄任“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的刘泽荣（又名刘绍周，曾列席共产国际一大和二次，并三次见到列宁）特意找到列宁。据刘泽荣回忆，列宁正忙于共产国际二次。在办公室列宁非常亲切地接见了。列宁说，中国外交部显然有所顾虑，我们不必要求过严，非照正式手续办

政治人物读书,都是为着某种需要。或许可以说,跟常人相比,他们的阅读带有更大的目的性和选择性。

蒋介石平生有阅读的习惯。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囚禁中的蒋介石,待惊魄稍定,除了诵读《圣经》外,还“阅墨子自遣”。

张学良深知蒋的阅读习惯,曾批评他读书范围太窄,思想太旧。据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一书,12月14日下午,蒋介石移居高宅后,张学良与蒋有一番对话。蒋先问张送他回京事,张说“此事殊不简单”。张说了一通“不简单”的理由之后,毫不客气地批评蒋“太专制”。并说:

“余党委员长之思想实太古太旧”。“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蒋介石不同意张学良的说法,辩解道:“尔是以马克思资本论与共产主义等书为新书乎?……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蒋早年确曾涉猎马克思的著作。不但如此,他还在1925年写过《中俄联合之意义》这样思想激进的文章。

张学良说蒋介石“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不为无因。蒋介石对“韩非子、墨子一类书”的确情有独钟。但他的读书范围又不同于这一类。1931年印行,署名“蒋中正”的《自反录》一书,第一集卷二收有《选读各书目录》一篇。该书目大致能反映蒋介石青年和中年时期阅读的情况。这篇目录,开列图书43种(类),其中包括《韩非子》。附记写道:“右书手自选定,以资悉心研究,兹附抄于此。”说明蒋读这些书,都不是随便翻翻,而是要“悉心研究”的。目录中尤可注意的是以下三大类:一是儒家典籍、先秦诸子及其他文史书籍,有:《五经》、《四子书》、《孔子家语》、《左传》、《战国策》、《六韬》、《孙子》、《吴子》、《管子》、《庄子》、《韩非子》、《离骚》、《史记》、《资治通鉴》、《清史辑览》。二是军事书籍,除前面提到的《六韬》、《孙子》外,还有:《普法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史》、《欧战史》、《巴尔克战术》、“各种军事学”、《战时正义》。三是名人文集、全集,有:《诸葛武侯集》、《岳忠武集》、《文文山集》、《戚毅毅丛书》、《曾国藩全集》、《胡林翼全集》、《左宗棠全集》、《骆秉章全集》、《李鸿章全集》。

在儒家典籍中,蒋介石特别看重《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宋代以后的理学家都将《大学》视作治国

的纲领。蒋介石持同样观点。他在《大学中庸新义》一书中这样论到《大学》:“我们知道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大学一书,把个人的内在修省以及向外发扬的道理,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政治上一切基本的原理都不外此。”在同书中,他还谈到治国者要以《中庸》为指导:“政治上一切法律制度,和政治者的行动态度,皆要合乎礼,就是合乎宜。否则就有过犹不及,如此就要乱了,就不成其为政治了。”不过儒家的治国之道到了蒋介石那里,就被改造了:儒家的“仁政”,被改造成现代专制。而且,他服膺法家,可能甚于儒家。

蒋介石“手自选定”的上述书目中,军事书籍以及跟军事直接有关的书籍占了三分之一。他最推崇的兵书是《孙子》,另外还有戚继光、曾国藩、胡林翼的书。他在《精神讲话》(1929年1月12日)中说:“我们中国很多宝贵的古书,都是治兵的重要书籍……尤其以孙子十三篇为中国治军最要紧的法则。”又说:“关于教兵练兵,大家有几部书必定要看,除了总理的书一定要看以外,第一是戚继光的练兵实记,第二是曾国藩胡林翼的书要看的多,这三种书凑合研究起来,便晓得我们中国人的心理。便晓得要怎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中国的精兵。”蒋阅读的书籍中,军事类书籍占了相当大部分,这跟他重视军事实力、迷信军事实力有关。蒋介石在同一篇讲话中还说:“立国最要紧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没有旁的,立国最要紧的条件,就是军队。”“建设国家最大最要紧的,就是军事,可以说除了军事之外便没有什么事情什么工作。”他不但信奉“马上打天下”,而且信奉“马上治天下”。在《论今日党政军与社会组织之惟一要素》(1928年8月8日)中,提出“三化”,即“军队党化”、“行政机关军队化”、“社会军队化”。“三化”之说,可能是蒋的独创,是其独裁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名人的文集、全集中,蒋介石对晚清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骆秉章等人的全集爱不释手,津津乐道。这些人都是镇压太平天国的能臣,清朝“中兴”的功臣。蒋介石为了跟中共的军队作战,需要研究曾国藩等人“剿灭”太平军的经验。蒋醉心于曾、左、胡、李、骆的全集,大概都是这个缘故。

(责任编辑 吴 思)

蒋介石读什么书

王春南

西南联大和《茶馆小调》

● 王景山

我第一次坐茶馆是在四川。那是抗战初期，随家逃难到重庆，在郊外化龙桥住校读复旦中学。家住市内，每逢周六下午回家，必到嘉陵江边的公路上等进城的车，车未到时，就在路旁的茶馆小坐。虽说是茶馆，其实很简陋，也就是竹杆子搭起个茅草篷而已，多半是戴斗笠穿草鞋的挑夫、小贩、抬滑杆的，在这里喝口水，歇歇脚。抗战中期到贵阳马鞍山读国立十四中高中，周日外出，每在水口寺位于水上的茶馆里逗留，看清澈见底的南明河水徐徐流过，岸边巨大的水车缓缓转动，常常流连忘返。

至于和茶馆结不解缘，是抗日战争后期，我在昆明上联大时候的事，三年之中总有近一半的课外时间是在茶馆中度过的。联大名气之大，教授水平之高，那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只是校舍条件实在太差，茅茨土阶且不说，40学生同居一室的宿舍，摆满了摩肩继踵的上下铺木头床，椅子、凳子、书架，一概无处安置。上了大学，多少总有那么几本书，没处放，幸而我睡上铺，一尺方圆的粗大房梁，便正好做了我放书的地方。然而不幸的是，为读外文系忍痛购买的一本二手货《简明牛津字典》，却也因此丢失了。总之，宿舍不是读书处，图书馆又是座位有限，必须欲占从速。于是莘莘学子便不得不向校外发展，寻找活动场所，开辟第二课堂，于是大学区的茶馆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矣。

1943年我入学时，昆明大西门内外，青云街、文林街一带，茶馆已经林立了。窗明几净，宽阔敞亮，晚间电灯、汽灯大放光明者有之；窄矮暗淡，深夜灯火如豆者亦有之。规格不同，价格有异。上午一般比较清闲，下午开始上座，晚上则是“鼎盛”之时。茶客自然主要是大学生了，不少茶馆几乎是清一色的联大学生。男同学，穿长衫的，是北

大传统；穿西服的，是清华风气；穿夹克的，是南开时尚；衣着多半破旧。到旧货摊上，廉价买一身美式装备的，后来也不乏其人。女同学们呢，好像多是旗袍一袭，倒也朴素大方。茶馆里一坐，干什么的都有：或读书，或看报，或演习题，或做文章，打桥牌的，谈恋爱的，会客人的，聊大天的，以至独坐发呆的，闭目养神的，自言自语的，面对面，背靠背，各行其是，互不干涉。新校舍民主墙上还时时可以看到某校友会、某同乡会、某系级迎新会、某社团讨论会，某日某时在某茶馆召开的海报。一位联大同学最近告诉我：他当年课余兼差，是给美国新闻处的一位美国朋友教中文，而授课地点也就在茶馆里。当时茶馆之为用，真可说是大矣哉。

当年联大的学生，多来自沦陷区，离乡背井，举目无亲，靠着微薄的贷金，每餐吃着泥沙俱下的“八宝饭”，聊以维持弦歌不辍。一般说来，进了茶馆一杯清茶而外，再要一碟花生米或松子，就算阔绰。至于阮囊羞涩，一杯“玻璃”（白开水的美称）消永昼的，也大有人在。至于在茶馆里坐多久，好像是没有限制的。一杯茶喝了一下午，晚饭时间到了，嘱咐老板娘，茶留着，饭后还要来接着喝，老板娘也会欣然同意，从来没有甩闲话、给脸子看的事。一次旧历除夕，我和几位无家可归的好友，有赵少伟，好像还有尹洛吧，曾经在一家茶馆里怀乡念亲、慷慨悲歌坐了一夜，却也得到了胖老板娘的理解、谅解甚至同情。

旧时茶馆的功能虽然多种多样，但有一条禁律：“莫谈国事”。凡我坐过的茶馆，无不可以看到煌煌然“莫谈国事”的四字招帖。重庆化龙桥茅草篷小“茶馆”里有，贵阳南明河畔木板搭的水上茶馆里有，昆明文林街一带的大小茶馆里当然也有。从老舍著名话剧《茶馆》，还可以得知清

末、民初的茶馆里同样是明令“莫谈国事”。原来旧社会不管何时何地,茶馆里都是不能或不许谈“国事”的。

不过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不那么驯服了,对“莫谈国事”的禁条极为反感,便大唱其《茶馆小调》。50年过去了,歌词还大致记得是:

晚风吹来天气燥啊,东街的茶馆真热闹!楼上楼下,客满座啊,茶房!开水!叫声高。杯子碟儿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响啊,瓜子壳儿辟里啪啦、辟里啪啦满地抛。有的谈天有的吵,有的苦恼有的笑,有的谈国事,有的就发牢骚!只有那茶馆的老板胆子小,走上前来,细声细语说得妙,细声细语说得妙:“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国事的意见,千万少发表!谈起了国事容易发牢骚啊,引起了麻烦,你我都糟糕!说不定,一个命令你的差事就撤掉,我这小小的茶馆,贴上大封条。撤了你的差来不要紧,还要请你坐监牢。最好是啊,今天天气哈哈……喝完了茶来回家,去睡一个闷头觉,睡一个闷头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满座大笑,老板说话太蹊跷!闷头觉,睡够了,越睡越糊涂啊,越睡越苦恼!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的谈清楚,把那些剥削我们、压迫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通通除掉!

这首《茶馆小调》从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可以说是唱遍了全国。但这首歌的创作经过,却鲜为人知。又是前面提到的那位联大同学,向我提供了曹珉同志的《情思缕缕念费克》一文,读后才知道《茶馆小调》不但是费克谱曲,连樊赓稣作的歌词也是经过他补充的。

费克和曹珉是夫妻,他们和樊赓稣同为当年新中国剧社的成员。1944年秋桂林大疏散,他们随同剧社于1945年来到昆明。那时争取民主的运动正在这里日益高涨起来,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群众的镇压也在逐步加剧,到处有特务、暗探活动。曹珉在文中回忆说:“我们在演出工作的余暇,总要结伴去景虹街背后的一家小茶馆,因为近便,有事叫起人来也不耽误。时间一长,我们发现茶馆原是一个人们高谈阔论,摆龙门阵的地方。有时大家虽然也谈着各种问题,时不时有一两句关于物价如何如何,谁谁昨天被抓走了等话飘了过来,不过声音都是压低了的。要是

由于激动而声音高亢起来,马上就有另一个作手势来制止。看来,人们心里有话,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敢说。”

据曹珉回忆:在茶馆里费克很少说话。他呆呆地望着周围的茶客,香烟一支连一支地吸,把自己埋在烟雾中。“有一天,他突然打破沉默,开口说:‘鬼天气,叫人像在蒸笼里一样闷得难受!早点下雨,把这一切统统冲刷掉才好!’我明白他这是双关语,就提醒他一句:‘轻点,有狗!’他似乎并没有理会我的话,接着说:‘不能再混了,我们应该写点东西!樊赓稣,你的文学根底不错,写点歌词吧,我想写曲子。’樊赓稣连连点头说:‘早就想写点什么了,心里实在憋得不行!但是千头万绪,从哪里下笔呢?’费克用手指着墙上的一张大红纸说:‘那里!’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大家早已习以为常的四个大字‘莫谈国事’。樊赓稣沉吟了半晌说:‘对,就以茶馆为背景,借题发挥一下。我试试吧。’”

一个新的歌曲就这样酝酿起来了。隔了两天,樊赓稣拿来了《茶馆小调》的歌词。费克接过稿纸时手有些抖,他此时的心情太激动了,因为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使他寝不安枕,食不甘味,现在可以动笔了,他怎不激动?

据曹珉回忆:樊赓稣的歌词初稿是写到“回家去睡一个闷头觉!”作为结束。费克在两天之内,“见缝插针”的挤出时间,便把曲子谱了出来。他这次作曲,大胆吸取了传统的民间说唱音乐的格调,使全曲的旋律起伏自如,富于变化,充满人民的机智、诙谐和嘲讽情调。找了一些同志试唱,大家认为词曲都不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民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不满,但是仍觉犹未尽,结尾应当高亢一些。听了这些中肯的意见,费克频频点头,他连吸了两支烟,突然来了激情,在歌的最后加写了“哈哈哈哈哈,满座大笑”充满战斗豪情的一段。

费克写完后,便征询樊赓稣的意见,只见他眉头紧锁,沉吟不语。费克又说:“加上这几句,恐怕凶多吉少吧,你看行不行?”樊赓稣手在桌上重重一拍:“行,为什么不行?有了这样几句,整个歌才有了高潮,才能真正唱出人民心中积蓄已久的最强烈的心声!就这样,你谱曲吧,即使流血牺牲,我们也要这样拿出去!”又过了一天,费克把

增加的几句谱写了出来。于是大功告成,一首充满战斗激情的新歌诞生了。

据曹珉同志回忆,《茶馆小调》首演是在西南联大举办的纪念高尔基的晚会上,新中国剧社应邀参加了这次晚会。晚会最后一个节目,就是新中国剧社的大合唱《茶馆小调》。“到《茶馆小调》唱毕,全场的情绪达到最高潮,人们都坐不住了,先是拼命鼓掌、欢呼,后来又喊口号、唱歌,形成了震撼天地的怒潮。”据联大校史第四编“大事记”:1945年5月18日“文艺社举行高尔基逝世九周年晚会”。那么《茶馆小调》的首演就应是在那一次的晚会上了。

从《茶馆小调》在联大晚会上一露面,昆明各大、中学纷纷来人向新中国剧社讨取歌谱,或请剧社派人去教唱。黎章民在回忆联大高声唱歌咏队的文章中曾经说到:1945年夏他们参加一次到建水劳军的活动,在那里教战士唱歌,其中就有《茶馆小调》。一时间,《茶馆小调》成了家喻户晓、大人小孩个个爱唱的歌子。它从昆明唱到重庆,《新华日报》把它介绍到延安,又从那里唱遍了全国。但也因此,费克在昆明几乎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

据曹珉回忆:解放以后,在广州全国创作会议期间,当时的文化部长齐燕铭把费克介绍给周总理说:“这就是费克同志,《茶馆小调》的作曲者。”周总理听后立刻热情地握着费克的手说:“好,《茶馆小调》曲子很好,我也唱过。很好,群众很喜欢。希望你今后创作出更多的好歌来给大家唱!”费克在周总理的鼓励下,更是努力工作,一连写出了几百首群众演唱歌曲和电影插曲。可是“文革”发生,“四人帮”不仅夺去了费克手中的笔,还夺走了他正当有为之年的生命,竟完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未能完成的“任务”。

《茶馆小调》多年不唱了,对现在的青少年怕是完全陌生的吧,更不要说这首歌子的创作背景、创作经过以及当年传唱时激动人心的情况了。其实唱唱也不妨,以史为鉴嘛!

解放后,长住北京,好像再没坐过茶馆,外地的茶馆听说也越来越少了。人民既已当家作主,“莫谈国事”的禁忌,理当成为过去。可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也还总有那么一些领导同志,是比较喜欢“集中”,而不太喜欢“民主”的,因此也

就不那么喜欢老百姓议论“国事”。这也并不奇怪,咱们早就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训,连大智大勇如诸葛丞相者,在听到部下就西城防务问题表示关怀时,也要发布指示说:“众兵丁休得要纷纷议论,国家事用不着尔等关心”!语见谭派名剧《空城计》。我对诸葛先生一向是钦佩而且尊敬的,只对此一事实实在不敢恭维。汉室虽为刘氏天下,但所谓“国家事”亦即“国事”却多是关系千家万户以至全国人民的事,各级领导操办好了,老百姓跟着享点福,闹糟了,老百姓总是首先倒霉,怎能说是“用不着尔等关心”呢?

旧社会不许老百姓谈国事、发牢骚,否则就会惹来麻烦,所以是旧社会,不说了。新社会老百姓是主人,谈国事也好,发牢骚也好,都是他们的权利,各级领导包括如仍健在的诸葛亮同志在内,都只有洗耳恭听的义务,有则改之、无则嘉勉,这应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

1998年初,当我看到北京《团结报》副刊《茶馆》新设栏目,一改旧社会的“莫谈国事”为新社会的“也谈国事”时,想到半世纪前在四川、贵阳、昆明等地茶馆里的见闻,便不由得写了一篇短文在上面发表,题目就叫《“也谈国事”,对头!》。(责任编辑 吴思)

来信摘登

贵刊2003年第1期刊出拙作《中国包产到户首创者王定的遭遇》十分感谢。

我将此文寄给王定同志的老伴叶葵仙同志,她阅后十分激动!她的儿子从挪威打电话给我说,他准备将全文刻成碑,立在他父亲的坟侧,作为永久之纪念!

叶同志再三叮嘱我,对你刊表示谢意!她并提请贵刊更正文中的误植3处:

1、26页左栏第3行第5个字应为“两”,即“两江师范”。

2、26页左栏第9行最末一个字,应为“县”,即“副县长”,而非“副师长”。

3、26页右栏第3行第2个字“榔”应为“柳”,即“柳江县”,广西没有“榔江县”。这是我原稿将“柳”写成另一种笔法“ ”所致。

另外,27页左栏第6行第8个字“蚊”应为“ ”,即“蚂”,这是我们两广对“青蛙”的俗称。 卢蒙坚

我了解的白桦和公刘

● 涂光群

20世纪50年代初期,云南野战军部队出现了两位才华出众、在全国有影响的青年新作家、诗人,他们就是白桦和公刘。

白桦,河南信阳人。我有位好友、已逝小说家苏群(蔡明川),曾是白桦和他的孪生兄弟叶楠当年在信阳师范的同学。白桦原名陈佑华,叶楠则称佐华。师范是免费学校,估计两兄弟应是比较贫寒人家的子弟,这可能是促使两兄弟在学校里思想倾向革命的一个因素。白桦于1947年参加中原的人民解放军部队。

公刘这个笔名,使人想起《诗经》“大雅”公刘篇,它赞颂的是远古部族领袖公刘领导群众创业安居的史绩。取这个笔名的人,至少表明他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兴趣。公刘果然姓刘,上学时名“仁勇”,名字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仁勇”三字来。

我的同时代人、未来诗人公刘,和我一样,童年的成长环境,有抗日战争背景,有抗日歌曲的熏陶。由于日本鬼子进攻,父亲、母亲和十来岁男孩的他,从祖居省会南昌,逃难到了赣南的赣州。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他失学在家。这时他的人生际遇有了新的契机。他是个聪敏、灵动的孩子,喜欢唱抗战歌曲,尤喜当众表演。过剩的精力无处宣泄,恰好有一支抗敌宣传队张贴了告示要开办抗战歌咏班,它写道:欢迎各界男女同胞踊跃参加,年龄不限,职业不拘。小刘仁勇当下大感兴趣。

1993年6月公刘重返阔别多年的赣州,回忆自己这段童年情景时写道:“没有征得大人同意,便飞也似地跑去报了名。我自幼热爱音乐,嗓子又好,视唱(即不用先哼会曲谱,张嘴便能直接按谱唱词)能力强更是我的过人之处。小学时代,

年年断不了登台表演,从《葡萄仙子》到《渔光曲》到《大刀进行曲》。抗战爆发后学会的新歌更是不计其数,而且无时无刻不挂在嘴边。如今有了个大唱特唱的正经去处,何况还可以学到更新的歌曲,何乐而不为呢?”那个国、共合作,全民抗日时代,试问一个年纪不满11岁,准备进初中念书的孩子,能够判断“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抗敌宣传队”开办的歌咏班,是魔鬼、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而且是老蒋儿子蒋经国当头儿的,小孩子万万掺和不得的,“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深渊、陷阱吗?不用说,小刘仁勇想不到、做不到。公刘做梦也想不到:学业之外的、抗敌宣传队歌咏班非正式小歌唱队员刘仁勇,只因此,在歌咏班的表演中,遇见了观看表演的蒋经国秘书徐君虎,由徐君虎的引见而邂逅了时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副处长、后又任赣州专员的蒋经国。蒋因刘仁勇热烈的抗日情绪,歌唱和演说的才能而对这个小男孩生出好感,遂嘱咐徐秘书资助这个失学小孩和另一同样情形的小孩进入中学读书。这是发生在1938年秋、冬和1939年夏天的事。

半年后,12岁的刘仁勇考进在吉安山区创办的对来自沦陷区学子免收学杂费及食宿费的国立十三中学,从此和蒋经国先生渐行渐远。1939年下半年徐君虎因与蒋专员意见不合而离去(徐1949年留在了大陆),中介人的离开,中学生刘仁勇随着见闻、知识增长,人大心也渐大,有了自尊自爱观念,使他决心断绝了和小蒋那些人的联系。1993年我曾去赣州实地采访,当地一位文化人告诉了我公刘童年时与小蒋邂逅的那段故事。之后读到公刘关于这个事情的自述,觉得公刘讲得更加澄澈透明,对事实一点不作掩盖,

见出他人品的正直。后来公刘进入高中,面对日益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他的思想渐趋左倾,成为学生自治会头儿之一、带头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活跃分子。进入大学,他因参加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游行示威,撰写“罢课宣言”而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榜首。从此他彻底摒弃国民党反动政权,选择并走上了一条新路。为躲避搜捕,1948年4月,他流亡香港,以公刘笔名给左翼报刊写稿,初展锋芒,其中有数篇是直接抨击蒋经国的时论。1949年公刘参军,随解放大军进入云南。他和白桦很快成为昆明军区文化部领头人冯牧的部下。在冯牧带领下,他们不畏艰险,几度深入云南边陲,收获了诗歌、小说。

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期,在《人民文学》这份全国作协的创作刊物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中,白桦和公刘因其作品的影响,因其文学才华,而分外引人注目。无名作者白桦,在《人民文学》创刊初期,即向其投稿,曾引起小说编辑秦兆阳注意。1953年初,他的一篇短篇小说新作,被当年实际负责《人民文学》编辑工作的文学评论家陈涌、萧殷选中、推出,发在1953年第3期的头条显著位置,这就是《山间铃响马帮来》,白桦一举成名天下知。后来作者很快将其改编成电影拍摄放映,作者和作品的影响更加扩大。而白桦不愧是写作快手和多面手。他既写小说、影剧剧本,还写诗歌、散文。50年代中期他在《人民日报》发过一篇散文《洛阳灯火》,我至今留有印象,那实在是一篇即景生情、情景交融,不可多得的抒情散文佳作。

公刘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呈现了他的创作高潮。对于《人民文学》的编者(1955年——1956年主持编政的是秦兆阳),那是可喜的收获季节,诗歌、小说作者新人不断涌现,佳作迭出。而公刘,恰像一位写作弄潮儿,站在一波又一波涌出的新人新作的浪尖上,1954年即被中国作协发展为会员。《人民文学》以显著地位发表黄铁等同志参与,由公刘执笔整理的根据云南民间神话改编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民间文学专家们公认这是一篇改编成功的佳作。后来公刘又将《阿诗玛》这一动人爱情神话改编成电影,由上影资深导演汤晓丹执导拍成彩色故事片后,《阿诗玛》在全国更是家喻户晓,影响扩散到国外。

公
刘

从1954年(当年编辑部负责人是从西南军区调来的葛洛)至1956年,《人民文学》还好几次推出公刘新作组诗,如《西盟的早晨》、《中原》等等,有一回一次就推出他的短诗九首,这对新作家真是礼遇有加,但公刘的诗担当得起。我想其中几首当年脍炙人口的佳作,老读者不会没有印象。如《五月一日的夜晚》、《八达岭上放歌》、《中原》、《夜半车过黄河》诸篇,例如《五月一日的夜晚》那首——

天安门前,焰火像一千只孔雀开屏
空中是朵朵云烟,地上是人海灯山
数不尽的衣衫发辫
被歌声吹得团团旋转……

整个世界站在阳台上观看
中国在笑,中国在舞,中国在狂欢
羡慕吧,生活多么好,多么令人爱恋
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

1955.5.6 追记 北京

当年这首诗发出后,文艺界内外叫好的人很多,都说公刘的确有才华,平易、生动的诗的语言,表达了众多革命者的心声;这样富有内涵,声情并茂的短诗,不是平庸作家写得出来的。我是小说、散文编辑,但是爱看诗,拿公刘的诗与某些

革命资历稍老的诗人同时发在该刊的作品相比较,我不能不认为公刘这代年轻诗人,可能将是胜出的一代。公刘曾穿着整洁军装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作客,我当年观感,公刘属内向——内秀的人,乍见编辑部的人,他脸红红的,似有几分朴讷。

谁也想像不到,白桦和公刘这两个早熟的,受共产党革命思想培育,人民共和国造就的众人瞩目的一代青年作家,后来几十年的命运竟是非常坎坷,这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创作。

公刘童年跟蒋经国在抗日战争大环境短暂邂逅的那段历史,既难说是“失足”,也难算“错误”、“罪行”,并且他在参加人民解放军后写的入党自传里已向组织做过坦诚的、“触及灵魂”的交代。而在社会上他已是最有名望的部队诗人之一,他用赞歌来表达他对中南海、对我们军队和人民的热爱,如前文所说。可是在1955年继反胡风运动后开展的全国肃反运动中,公刘不仅难逃劫数,且是重点对象了。在这一过程中,如公刘所叙述:“我不是徐君虎(留在大陆的蒋经国前秘书)先生的干儿子(当然更不是蒋经国的),即使在

‘肃反’最绝望,我两次自杀未遂的时刻,我被昼夜逼供,只得胡说自己是‘国特’,是‘托派’,我也没承认是徐的干儿子。但是这又有什么用!结论中还是非定为‘干儿子’不可!”徐光耀那篇《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披露,当年审查公刘那态势,真可谓一往无前,一不做二不休。肃反整倒人,难以成功。到了1956年还不得不开“向肃反中被误伤的同志赔情大会”,这自然是颇不情愿的,这就又改换“诱敌深入”的办法,一再动员别人发言,又是点名又还使用“激将法”,要公刘一定发言。公刘谈了两条意见,讲了中国历史上的“瓜蔓抄”,讲了要人道主义(据我所知,公刘被隔离审查时,他刚同新婚妻子成婚)。反右时公刘虽远在敦煌采访,立即被电召回京,向党“猖狂进攻”的罪案因他讲的那两条意见,当然“顺理成章”成立。这回公刘的“特务”(有人绘声绘影写作发表了一篇小说)、“蒋经国干儿子”的莫须有罪案,再也难以逃脱,且被剥夺发言权,有口难辩。甚至“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已为公刘拨乱反正、恢复名誉之后,所谓“蒋经国干儿子”、“蒋匪干孙”的阴影还被极少数人摇之舞之(有的还掌握着某种权力),招摇过市,时不时地仍然像梦魇一般挥之不去,沉重压在诗人公刘头上。

现在我们再回到白桦。

1957年那场运动,白桦像当年相当一些有才华的青年作家那样,难逃厄运,被戴上一顶右派帽子。在鸣放初期,他去昆明鼓励鸣放,结果云南方面坚持要将他划右派。从此他沉寂了20多年。

大约是“四人帮”垮台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中央电视台举办春节联欢晚会,将近结束时,欢庆胜利的人群,纷纷走上舞台跳交谊舞,在翩翩起舞的旋流中,我发现作家白桦也在其列,多年不见了,虽然头发白了,但风姿依旧,精神未改。

不久之后,大约1977年四五月间,有人告诉我,白桦已复出,他从南边过来,现住王府井附近某某招待所。这多年,他积累了不少素材,手头有作品,你们赶紧去看看他。那时我负责《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方面的工作,于是很快我和一位小说编辑去看了白桦,他的新作话剧《今夜



白 桦

星光灿烂》好像即将由北京一家剧院演出。白桦对我们讲，他有一篇写贺龙的短篇过几天就完稿，问我们要不要。我们当然求之不得，因为6月9日是贺龙元帅逝世八周年，我们正在筹办怀念贺龙的一组稿件。几天后，白桦如约交稿，这是他多年以后交给《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题目是《地上的神仙》，是关于贺龙将军在洪湖苏区的一个传奇故事，发表于当年第6期。白桦仍保留了他诗人写小说的浪漫情调。

这时候的白桦，又到了他写作的快速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市创刊不久，推出了一些新人佳作、风头正健的《十月》文学杂志，发表了他新作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这个作品写的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历程，无非是建国初期能够发挥自己专长的欣悦期，和其后政治运动连绵，知识分子遭整的苦难期，尤其“文革”更达到登峰造极……这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亲身遭遇，白桦、公刘他们，不也是这样吗！当然从作品也可看出，白桦有时过于急切地想配合某种政治时尚，心是好的，但效果未必好。那时有个刊物率先写了分析个人迷信危害作用的文章，遭“凡是派”人士禁止发行，这自然不对。但白桦在《苦恋》电影剧本里将个人迷信问题，也象征性地插上一笔，与情节游离，似嫌生硬。这个剧本发表时似未引起公众注意。1981年剧本已由长影富有活力的年轻导演彭宁精心拍成影片。在内部审看时，有的人有些意见。这些意见到了党中央主席胡耀邦那里，耀邦主张将意见梳理成若干条进行修改，并说请文化部电影方面有经验的老领导夏衍和陈荒煤帮助作者和年轻导演修改。消息传到邓小平同志那里，他支持对电影持否定态度的那种意见。五月间这种看法公开见诸报端，给《苦恋》和被拍成电影改名叫《太阳和人》的影片，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帽子。随后邓小平发表讲话，不仅谈了《苦恋》及电影《太阳和人》的问题，还点名批评了文艺界两三个作者的讲话和作品，认为他们有的人也是“放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大超过了右派的水平”。《苦恋》和《太阳和人》则被禁止发行放映。还批评“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的领导，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于是党中央主席胡耀邦赶紧执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并向文

艺界传达这一指示。《太阳和人》从此不再放映，当然也从没公演过。没有看过电影的多数国人看了报纸的批评不晓得这部电影到底如何。但是文艺界有些人看过电影，我是其中一个。我认为电影拍摄得很美，也还有真实动人的成分，那就是知识分子的心态——爱国的执着和遭受错整时的内心苦楚。这部电影不能面世，真是有点可惜。文艺界看过影片、持我这样看法的人不少。至于电影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不是如批评者所讲的“新社会不如旧社会，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看过电影的人心中有数。事实的真相，不是凭一两篇批评文章就能推倒的。对《苦恋》和《太阳和人》的断然否定是难以服众的。此一公案还待历史鉴定。

我说说这件事情的余波。《苦恋》和《太阳和人》的作者白桦，为此而不得解脱。虽说他很快在《十月》杂志1982年第二期发表了检讨文章，题为《关于“苦恋”的通信——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1983年某月我去武汉办事，顺道想去看看白桦，遂由一位知道他的住处、原在部队的作家领我去。那是一处花园式招待所，我们先在白桦住的房内，后来白桦说：走，到后边的花园走走。到了花园，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我觉得关在屋里说话有点沉闷。我懂得他的意思，感觉他心情相当压抑。他对我说：我还要继续写作，但部队我恐怕得离开，找个合适的地方单位，只要能让我专心写作就行。

白桦后来去了上海作协，近十多年，他出版的新著不少。在自由心态下，我希望他能写出好看耐看的作品，让后代了解那过去的年代。

（责任编辑 吴 思）

作 者 更 正

我的文章《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中的照片说明有误（见贵刊今年第9期23页）：中应是萧泽宽，右应是廖伯康。

谨此更正，并向当事人及其家属和读者致歉。

何 蜀

我在英国的“高干”邻居

● 李 岚

我家的小区里，住着一位贝尔法斯特市的市政厅委员，大概就相当于我们的市委领导吧。我一直不知道这回事，直到有一天一群淘气的孩子玩足球，踩坏了我家花园的小灌木丛。

邻居来通知我，市政厅委员史密斯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如何对付这些顽童。原来遭难的不止我们一家。一家邻居正在后花园吃烧烤，一只足球从天而降，正好砸在炉子上；一家邻居的前窗玻璃被打碎，还有一家邻居被喧闹的声音扰得不能安眠。

晚上7点左右，我们陆续来到史密斯家，他还没有回来。他身材微胖、满脸和善的妻子招呼大家在客厅坐下。这时，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小女孩跑进来。她看上去很瘦弱，两只大眼睛镶在下巴尖尖的小脸上，显得很不调。她兴奋地和每个人说话，不断重复，意思却模糊不清。

我多少替史密斯有点惋惜。任着一个不错的官职，女儿却好像有点发育问题。正这么想着，又一个女孩跑进来。她大约十三四岁的样子，带着一个深度眼镜，梳着两条长辫子。她差不多是连蹦带跳地跑进来的，一进来就逐个询问每个人的姓名和住址，眼睛盯住人不放，眼神发直，说话时甚至还要拉住每个人的手。

我开始同情史密斯了。两个女儿都有发育问题，遗憾就不说了，面子上也不好看。这时，又一个孩子进来了。这是个男孩，大约八九岁。准确地说，他是爬进来的，双腿几乎用不上力，全靠双臂和前胸支撑着身体向前移动，十分吃力。他话语不多，很内向。

我差不多觉得史密斯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一连三个孩子都是残疾，这恐怕太少了。正在这时，史密斯回来了。他的小女儿一头扑上前去，搂住他的腿。像所有疼爱女儿的父亲一样，史密斯弯下腰，抱起她，把她的小脸贴在自己的脸上，然后坐下来，把她放在自己的膝上。

开会了。本想好好参与讨论的，脑子却一直不能集中。史密斯夫妇看上去好好的，怎么一连生了三个孩子都是残疾？史密斯的小女儿在父亲的膝上一刻不停，一会儿

站起来搂住他的脖颈，一会儿坐下来把头贴在他的胸前，史密斯疼爱地由着她……

有一搭无一搭地，听到史密斯说，他准备为大家联系警察局，协助维护小区的秩序。没过几天，果然约了一位警察来，又召集大家去他家，向警察反映情况。我到得早了，只有史密斯的夫人和孩子们在家。

一进门，史密斯的小女儿就拉住我的手，说：“快来看，我的新房间！”

我吃惊地发现：几天以前还是小客厅的房间，已经变成了一间布置漂亮舒适的卧室。桌子前粉红色的墙上，挂着几个镜框，都是小女儿的相片。一般英国人的卧室都在楼上，史密斯夫妇把楼下的房间改成卧室，一定是为了让小女儿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看着小女儿满脸兴奋和快乐，我不得心里感慨，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无意中，我发现墙上，还挂着几张史密斯夫妇的相片。看我有些留意，史密斯夫人走上前来，一张一张地介绍。最后，我的目光停留在一张大合影上。相片上，除了史密斯夫妇，还有很多年轻人。

“这是我们的六个孩子，他们都长大出去了。”史密斯夫人指着相片对我说。

我惊呆了。“这三个孩子是我们自愿收养的。”史密斯夫人接着说。

收养的？含辛茹苦，养大了自己的六个孩子；不安享清静悠闲的生活，却收养了三个残疾儿？我看着史密斯夫人双眼周围一道道细细的鱼尾纹，不由得肃然起敬了。史密斯夫人全然不觉，和我絮絮叨叨拉上了家常。

“那些孩子在我家门前踢球，吓得我小女儿不敢出去玩儿。还有旁边这家邻居，总把车停在我们门前，挡了我儿子坐轮椅出去的路。跟他们说了好多回，现在总算好了。对了，这是我大女儿的作业，她得了好几个‘优’。”

她给我看一个作业本，上面的字迹虽然有些歪歪扭扭，却是一笔一笔认真写出来的。单词很简单，诸如“bed”（床）、“we”（我们）、“eye”（眼睛）。如果不是

史密斯夫人告诉我,我绝不相信这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做的作业。史密斯夫人却充满骄傲,脸上布满笑容。我真佩服甚至羡慕她的这份开心,如此透彻,如此真切。

史密斯带着警察来了。临散会的时候,他嘱咐大家有什么事就给警察局打电话。“我们下星期要带着孩子们去度假。”他解释说。

我想象不出这是什么样的度假,但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很愉快。从沙发上起身时,我注意到史密斯家的壁炉台上,摆了好几张三个孩子的合影,相片上,他们紧紧偎在一起,快乐地笑着。这笑脸,灿烂美丽,比任何语言的解释都更明白地告诉我,什么是英国的市政厅委员。

(责任编辑 吴 思)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18.00	4.00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徐庆全	24.00	4.00
斯大林(上中下册)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78.00	7.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3.80	4.00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1966-1978)	杨胜群 田松年	27.00	4.00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汝瑰 黄玉章	68.00	7.00
邓小平时代(上下册)	杨继绳	32.00	4.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门 祝东力	17.00	4.00
刘少奇之路:(全四卷)	胡长水 林蕴晖等	69.80	7.00
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	严 秀	12.50	3.00
沧桑十年——为了悲剧不重演	马识途	33.00	4.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4.00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刘杰辉 张国华	25.00	4.00
中国改革开放史	朵生春	66.00	7.00
航天情——永远的眷恋	彭洁清	16.00	4.00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羨林	24.00	4.00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羨林	25.00	4.00
枝蔓丛丛的回忆	季羨林	26.00	4.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李锐其人	宋晓梦	28.00	4.00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凌志军 马立诚	22.80	4.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凌志军 马立诚	23.80	4.00
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	凌志军	25.00	4.00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命运	吴 江	20.00	4.00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下册)	唐德刚 王书君	69.00	6.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4.00
毕竟是书生	周一良	13.00	3.00
虽九死其犹未悔	叶笃义	15.00	3.00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章含之	30.00	4.00
影剧之王田汉——			
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	张耀杰	25.00	4.00
戏剧大师曹禺——			
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	张耀杰	20.00	4.00
我陪胡风坐牢	梅 志	19.80	4.00
白色花劫——“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大纪实	林 希	25.00	4.00
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	张 帆	25.00	4.00
断桅杨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	丁兆甲	26.00	4.00
中国人物年鉴	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	158.00	6.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苏共亡党十年祭》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解体?谁是苏共的掘墓人?俄国的改革与中国的改革有什么不同?本书在历史追述中回答了上述问题。由于苏联和苏共对中国和中共的巨大影响,作者的问题和答案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本书成为人们自我审视的一面镜子。

《斯大林》本书由苏联新闻社出版社1989年出版,作者曾任苏联国防部军事研究所所长。在洋洋上百万字、1470页的巨著里,作者以详实的史料,勾画出一个革命者转化为独裁者的历史,考察了这个人留下的带血痕的时代。这是一个谎言、残暴、冷酷、梦想、巨大的悲剧和巨大的成就交织在一起的时代。书中充满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而这一切记录都源于扎实可靠的原始档案。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从皇帝官僚到土匪和小民,每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利害考量,发展出独特的生存策略。本书以明清和民国历史为本,剖析了各阶层的获利模式和反抗策略,揭示出买命和卖命的逻辑,挖出了各种规则背后的终极规则。行文生动平易,读来让人后悔:我怎么没看透呢?

《李锐其人》李锐著作颇丰,是国内外公认的研究毛泽东的权威之一,人们读过李锐的著作,对这样一位敢于直言的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充满敬佩,本书详细的叙述了李锐从给毛泽东当秘书、参加庐山会议到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以及平反后在中组部工作和再论三峡的坎坷经历。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造神与造圣

——精神现象零拾之七

● 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蒙昧时代,人们造神,是因为无知与恐惧。

文明时代造神,是为了一定集团的利益与需要——《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造神是为了“天下服”。为什么会“服”?《礼记》有云:“万众以畏,万民以服。”害怕了,所以就“服”了。钱钟书先生在引了这两句话之后说:这是“古人政理之要言也。”实在眼光犀利。

钱先生的渊博,不可及。在引述中国的种种之外,又引证了外国的种种,那想法,同中国地异而心同,只是说得比中国人更直白、更赤裸。比如,相传奥古斯德大帝便说:“有神则资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设其为有。”著《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也说:为君者不必信教,而不可不貌似笃信。造神的人自己是并不相信这神的。这一点,中国虽有人也看了出来,总不肯这样明白点破,让人意会而已。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神失去了存在的学理依据——至少在知识层中,但神道设教的法子并没有丢,只不过从造神改成了造圣。造圣,其实也是老法子。在古代是作为造神的补充,在近代则作为造神的替代。人一旦成了“圣”,也就与神差不多了。比如孔子是文圣,关羽则是武圣,一样也是要人膜拜,要人祭祀的。不过,神有神力,令人畏惧,圣原是人,无足畏也。造圣之后,如何使“万众以畏,万民以服”呢?那就要借助人间的权力。谁要“非圣”,就要受到权力的制裁。孔融死于非圣,嵇康死于非圣,后来的李贽也死于非圣。砍的头多了,也就“万民以服”了。所以,能够造圣的人,必定是手握权力的人。造圣,用今天的话来说,不过是权力运作的手段而已。

“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很多人以为是打倒孔夫子,其实是打倒孔圣人。孔子生前,“道不行”,没做



几天官,靠教几个学生度日。他对弟子并没有什么控制的手段,不满意,也不过发发脾气,骂骂人,是个不坏的老头儿,赞成不赞成他的主张,是另一回事。他成为“五四”潮流的出气筒,是因为被权势者捧成“圣人”,大树特树,成了他们推行治道的工具。这一点,已经死了的孔子是无法任其咎的。

鲁迅也被人捧成过“圣人”,大树特树。在保卫他的名义下不少人挨过整,吃过苦头。其实鲁迅何尝要人保卫?他在文学上与学术上的地位,自有他的著作在。我的师辈,许多是鲁迅同时代人,他们在鲁迅生前和死后,尊敬有之,但并没有诚惶诚恐的态度。后来的大树特树,名曰树鲁,不知树的谁人。今天有人拿鲁迅做出气筒,鲁迅也是无法任其咎的。

权势者可能觉得把死人捧作圣人,还不够便捷,于是索性自己走上圣坛。中国专制主义社会时期,皇上也被称作“圣人”。皇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是中国本源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想从圣人那里得到更多利益的大臣们,大树特树圣人的威权。没想到皇权与神权一旦统一,他们原先可以凭借天意来限制皇权的一点点手段也失去了。接下去便是君王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时代。当初大捧圣人的官僚,自己也一个个成了神坛上的祭品。诗曰:

造神容易送神难,合一天人不好缠。

不见当初封圣者,披枷带锁祭神前。

炎黄春秋

2003/10 (总第 139 期)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执行主编 :吴思 庄建平 李晨
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 :底先华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陈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书长 :徐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编 :100045
电话 :68522852 (办公室)
68534879 (编辑室)
68532048 (发行部)
传真 :68532569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J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 (E-mail) 地址 :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 :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 :4.80 元